新建設

第四卷 第五期

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 王亞南

學習「實踐論」與改進革命工作的方法 潘梓年

了解「實踐論」的條件 金岳霖

美、日帝國主義是中蘇人民的死敵 羅榮渠

周代不是奴隸社會 王毓銓

關於奴隸與農奴的糾葛 郭沫若

從「義田」看蘇南農村的封建勢力 潘光旦・全慰天

資產階級租稅轉嫁理論批判 趙靖

阿Q是一個農民的典型嗎？ 蔡儀

真摯和高貴的藝術 鍾敬文

辯證唯物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武器 蘇・楊興順著 李何譯

統計學的對象及其科學基礎（書評） 鐵華・劉新

歷史的歪曲（書評） 金燦然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專著

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王亞南（一）

學習「實踐論」

學習「實踐論」與改進革命工作的方法……潘梓年（五）
了解「實踐論」的條件……金岳霖（八）

美、日帝國主義是中蘇人民的死敵……羅榮渠（一一）
周代不是奴隸社會……王毓銓（一七）
關於奴隸與農奴的糾葛……郭沫若（二一）
從「義田」看蘇南農村的封建勢力……潘光旦・全慰天（二七）
資產階級租稅轉嫁理論批判……趙　靖（三三）
阿Q是一個農民的典型嗎？……蔡　儀（三八）
眞摯和高貴的藝術……鍾敬文（四〇）

學術討論

舊意識的沉澱和死亡……謝逸華（四三）
關於後天獲得性和人的階級性……陳安湖（四四）
關於「意識狀態試論」的檢討……黃藥眠（四五）
論希臘時代藝術與資本主義時代藝術……王英白（四六）
關於「希臘時代藝術爲什麼比資本主義時代進步」……常任俠（四七）

譯文

辯證唯物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武器……蘇·楊興順著 李何譯（四八）
共產主義原理（下）……恩格斯原著 吳恩裕譯（五一）

學術問答

為什麼我們說武訓是為封建階級的文化服務的？對於歷史上的人物和事變，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評論它們？（李　達答）……（五七）
墨子生長在怎樣的時代？墨子的學說包括了那些主要的內容？對於墨學我們應該抱怎樣的態度？（梁存厚答）……（五八）
為什麼在自覺意志支配與領導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會存在着客觀的經濟法則？（蔣學模答）……（五九）

書評

論統計學的對象及其科學基礎——評勾適生著「統計學原理」……鐵華·劉新（六〇）
歷史的歪曲——評吳方平著「豪門梁冀」……金燦然（六四）

言論文摘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陳伯達（六六）
反對數理邏輯中的唯心主義……В·П·屠戈利諾夫 Л·Е·適斯特洛夫（六八）
黨與文藝……荃麟（六九）

學術簡訊

國內期刊重要學術論文索引（一九五一年一—六月）……（七〇）

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

王亞南

一

中國共產黨，也正如同世界其他各國的布爾什維克政黨一樣，是依照着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行事的，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作爲其行動指南的。在這種意義上，作爲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往往又稱爲馬克思主義政黨。也就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關聯，已經是非常明白的了。

但我在這裡所要說明的，與其說是着重在這三十年的一個世代中，中國共產黨怎樣依據馬克思主義或馬列主義、而在革命事業上獲得了輝煌的勝利和發展，毋寧說是着重在中國共產黨在其取得勝利果實和無比壯大起來的革命實踐過程中，怎樣依着它的特殊鬥爭策略和經驗、豐富了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前是非常關懷到我們這個古舊國家，特別是關懷到我們這個古舊國家在當時所萌發的革命運動（主要指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但儘管馬、恩這樣關懷我們，並不時談論到我們，直到俄國十月革命的一九一七年，我們始終沒有人談到，甚至沒有人知道馬、恩或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通過俄國十月革命的巨大影響下傳播到中國來的。這是一個極好的開端。

在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大體是經由英、法、德諸國和經由俄國兩個途徑。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傳統，在馬、恩與列寧斯大林之間，曾被第二國際或各國右翼工黨論客們惡意歪曲或肆行隱蔽了一個時期。在十九世紀最後一二十年乃至二十世紀初頭，各國統治階級很聰明地以國會議席的「甜頭」，讓他們的右翼工黨領袖們，大做其和平改革或溫和改良的美夢。在這種誘惑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或革命內容，都被他們閹割去了，而一些摻了假的、變了質的、括刮去了血肉的馬克思主義的教義，就由統治階級給予的便利，大大地販運推銷起來；好像馬克思主義並不是爲了工人階級的解放，倒反而是爲了便利那些右翼工黨政客們，替統治階級欺騙愚弄工人階級的。所以，經由這一途徑向外傳播的馬克思主義，就需要更多的血與淚，筆與槍，才能洗刷其惡劣影響的。中國輸入或接受馬克思主義，幸而遲了一著，幸而是經由另一途徑。

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亦曾遇到所謂民意派、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派、經濟派、孟雪維克以至托派、布哈林派……的歪曲，但正確地把握着馬克思主義革命傳統的列寧、斯大林，却不僅在理論上、在思想鬥爭上，而尤其重要的是在革命實踐上、澈底乾淨地把它們清除了，把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明確顯示出來了。所以，中國由蘇聯輸入的馬克思主義，就不是閹割去了革命內容的那一類專供有閒階級「鑑賞」「裝飾」的東西，而是特別適合無產階級的眞理；並且連帶輸入的，還有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怎樣在俄國特殊國情下應用的道理；還有，一切反馬克思主義或歪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必須在革命實踐過程中才能好好予以清算的道理。

三

偉大的十月革命後不久，馬克思主義的眞理，就伴隨着這震撼着全世界的大事件，傳播到中國了；劃時期的「五四」運動是在這種革命實踐與理論的影響下發生的。就在「五四」運動還在由古老的北京向着全國擴展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了。所以，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始，就是「以俄爲師」、以列寧爲師，堅持着馬克思主義的眞理，而極少受到西歐各國右翼工黨政客們的改良主義的歪曲理論的糾纏。但共產黨在本質上是一個行動的黨，怎樣把馬克思主義的眞理，像實現在俄國一樣的實現於中國，這是他們的中心課題。可是馬克思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或策略，大體是就西歐各國產業發展情況作出的結論。那對於產業比較不發達的俄國，已經需要在應用上有所創

建，而對於產業更不發達，因而更嚴重的，甚至可以說是更致命的受着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束縛的中國，就更不能不在革命實踐中，創造出新的章法了。

自然，蘇聯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給予了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以無比的鼓勵和信心，特別是蘇聯革命導師列寧斯大林以馬克思主義眞理，結合俄國國情所創建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和新經濟策略，更給予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者以極關重要的革命實踐的啓示，但如同馬、恩所提起的革命鬥爭綱領，不能機械地按圖索驥似的適用於俄國的特殊革命環境一樣，蘇聯革命導師們的天才創見，也無法照樣適用到有中國這樣特殊歷史條件的國家。

所以，在結局，正如同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應用和發展，曾經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一樣，它在中國的應用和發展，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或更多的代價的。

四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卽使一般的是在向前發展，但却曾經歷了不少的失敗和頓挫。那些痛苦經驗，極明顯地表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眞理就勝，否則就要遭到挫敗。

但是，如前面所說，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既不能刻板地硬套在發展情況不同的國家，那末，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眞理是什麼意思呢？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大體可以說是包括在一個立場、一個觀點、一個方法中。這三者緊密結成一體，缺一就行不通，就不能算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眞理，就要遭到挫折。

共產黨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在任何情況下，把穩無產階級立場，那是理所當然的。但如其不從唯物的觀點，仔細考察社會各階級成分以及無產階級與其他社會階級間的關係和地位，把特定時期、特定階段的革命對象和革命動力的敵我界線明確地加以辨識，那就很容易爲了單純强調無產階級利益，反使無產階級利益受到損害。不僅如此，卽使階級立場站得穩，而各階級間的敵我界線又分得清，如其不能辯證地把握客觀情勢發展在各社會階級關係和地位上所必然要引起的變化，而隨時機動地變更鬥爭的策略，那也很不容易達成維護無產階級乃至一般勞動人民利益的目的。

所以，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眞理，首先必須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然後再從實際具體情況及其變化狀態中，確定要採取怎樣機動的鬥爭方式和策略，才最有利於無產階級乃至一般勤勞大衆。然而，這看似非常簡易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的把握，不但不能期之於共產黨外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也不易期於黨內的一般同志，而必須寄其希望於天才的英明的領袖。作爲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無論在那個國家的發展和成功，都和它的領袖者的卓越領導區分不開，那原因，無非就是由於背誦馬克思主義的條文，儘管非常容易，要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眞理，把它靈活運用到實際鬥爭狀況中去，那是極其困難的。

五

中國共產黨是直到誕生後的第十年卽一九三〇年，才由各地革命武裝力量在井崗山的會師，而確立下毛主席的政治領導地位的，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的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中，黨內一般公認毛主席的決定，永遠是正確的，因而確立了他的最高領導地位。此後通過抗日戰爭期內的廣泛民族統一戰線運動，同時也深刻經驗到了封建官僚買辦統治的反復無恥的變節和露骨的反動，毛主席於一九四〇年公佈了他的作爲革命基本理論和鬥爭實踐指南的「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基本精神，在一九四九年還更明確更具體地表現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和作爲當前建國基本大法的「共同綱領」中。把新民主主義看作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必須經歷的橋樑或階段，那是以極堅定的立場，堅持馬克思主義眞理，同時在鬥爭實踐中，徹底認清了中國社會特質和中國革命特點的必然結果。可是，困難的問題，與其說是在如何發現這一新民主主義眞理，倒毋寧說是在如何見到就做到地去奉行或實現這一眞理。就共產黨人的徹底的不妥協的本質來說，要他們執行一種非常需要耐性、需要「軟工」的團結各社會階層各民主黨派的統一戰線工作，原是非常困難的；但在毛主席的堅決而英明的領導下，新民主主義這一指導原理，早經成爲全黨同志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準則。所以，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解放的成功，不僅在毛主席英明地發現了「中國革命之路」的眞理，尤在他果敢地領導全黨同志們實踐了這一眞理。

非常明顯的，共產黨是一個革命行動的黨。一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或學說，都是爲了指導行動的。單是說說完事，那就無法証明它是一個眞理。

我們現在且來看看，通過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馬克思主義的眞理，究竟是怎樣被發展着的。

六

我在前面已經明確地指出了：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教條，它的基本原則，如毛主席不時指示我們的，就在於一個立場、一個觀點、一個方法。凡屬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以正確的唯物觀點，確定他們在實踐鬥爭中的方向的見解如策略，總結地一般化起來，就成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大體是就十九世紀中葉前後的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的社會狀況，展開他們的階級鬥爭理論。二十世紀十年代、二十年代的俄國無產階級，同世紀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中國無產階級，是分別處在非常不同的社會狀况和社會階級關係中，它們分別需要一種適合於它們鬥爭情况的經驗和見解。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眞理，它就必然要求各國各地無產階級或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能够計對着它們各別不同的情况，定出各別不同的鬥爭運動的策略。所以，列寧斯大林通過俄國社會特殊情况及其對外的特殊關係所作出的許多理論上的革命建設實踐上的創見和策略，曾對馬克思主義眞理作了極大的充實和發展。同樣的，中國人民領袖——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應用到中國特別社會情况下，所作出的許多天才創見和決定，也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眞理的充實和發展。

與其他一切布爾喬亞的學說思想不同，馬克思主義的活生生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取决於議論紛紛的講壇和論壇，而是取决於社會實際鬥爭的舞台。怕行動，迴避行動的所在，就沒有眞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曲解或停頓。馬克思主義是由各國共產黨的革命鬥爭行動而永生的，是由他們的革命運動經驗和理論豐富着發展着的。

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成功，中國共產黨的壯大與發展，那與毛主席的發揚馬克思主義精神、堅持馬克思主義眞理的卓越領導是分不開的。

由於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哲學寶庫中，添進了「實踐論」這一法寶；由於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科學寶庫中，添進了「新民主主義論」這一法寶。然而更關重要的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及毛主席的領導，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已在我們這樣廣大的國土上的每一個角落裡，高高掛起了，毛澤東思想在那裡發生影響，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就很快要在那裡高懸起來了。

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都以極大的熱忱，注意新中國，研究中國的毛澤東思想，並試圖把毛澤東思想作爲其解放運動的指南的時候，我們更有理由相信，中國人民革命的成功，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實無異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實踐，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蘇「火星」雜誌發表論文
紀念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

風行全蘇以至國外的「火星」雜誌，以多頁篇幅刊載紀念中共三十週年的文章，在「英勇鬥爭的三十年」的社論中，叙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走向勝利，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該社論指出：依靠蘇聯的革命經驗，以列寧、斯大林忠實學生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把中國人民引到了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

又該雜誌登載了毛主席許多像片，包括一九二五年在廣州時代的毛主席，湖南湘潭毛主席的故鄉，一九三九年毛主席和農民談話，一九五一年五一檢閱時的毛主席，以及毛主席與勞動英雄合照，毛主席接見僑族代表等照片多幅。

蘇聯「經濟問題」雜誌評論
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戰綫上的勝利

最近出版的蘇聯「經濟問題」雜誌第六期，發表了阿斯塔費耶夫所著，題爲「爲消滅經濟落後，爲國家工業化而鬥爭的中國共產黨」的論文，長達萬餘言。論文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在各個戰綫——軍事、政治和經濟戰綫上有歷史意義的勝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該論文根據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等同志的著作、和中國人民政協共同綱領、根據中國經濟情况的分析、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經濟政策和業已獲得的經濟戰綫上的勝利。論文結語說到：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短短二年內，在恢復和建設工業上所達到的巨大成就，有力地証明了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中國工業化綱領，將在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援助下順利實現。

學習「實踐論」與改進革命工作的方法

潘梓年

「實踐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方法論。認識論是告訴我們怎樣才能對外面的許多現象與事實有正確的認識，爲的是什麼？爲的是要我們懂得客觀事物，不只是爲了要能把它解釋清楚，更重要的是爲了要能改造它。不只是爲了要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爲了要改造世界。我們所做的工作，都是改造世界的工作，因此，認識正確就是爲了要把世界改造好，也就是把工作做好。所以，「實踐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也是革命工作的方法論。我們學習「實踐論」，一方面學習如何正確的認識，一方面也是爲了把工作做好。爲了做好工作，我們就要用「實踐論」作爲武器來檢查我們過去的工作，使今後的工作提高一步。所以「實踐論」的重新發表，對當前的中國革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已經推翻了反動統治，今後要來建設一個新社會。這個工作比過去要複雜得多，細緻得多。爲了做好這個新的工作，我們就必須好好學習，好好準備。過去推翻反動統治，我們也做了各方面的工作，當時領導上是統一的，但下面各部份工作是各自分開的，彼此影響不大。現在全國統一了，相互間的關係一天天密切起來了，我們的工作做好做壞，影響重大。一個地方一個部門的工作做壞了，就要影響其他地方其他部門。所以，建設新國家的工作，比推翻舊統治要難得多。毛主席「實踐論」的發表，就是要我們大家好好學習，要大家把工作做好，它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它關係到我們今後的整個建設。我們的工作做得好，那就使我們的建設能儘快的完成。否則，便要使我們的建設遲誤多少年。「實踐論」把我們過去工作中失敗與成功的經驗作了一個科學的總結。我們革命奮鬥了幾十年，到底我們過去的工作做得怎樣？一般工作同志並不怎樣清楚，現在「實踐論」總結了這些經驗，好的壞的，都成爲我們今後工作很好的資本，很好的武器。所以，毛主席「實踐論」的發表，在中國革命史上有着很重大的意義；把過去作一個結束，對今後指出應怎樣開端。「實踐論」在這方面的重要意義，是我們首先要認識的。大家都應當一方面認識「實踐論」的重要性，一方面就要經過學習「實踐論」來檢查自己過去的工作，各人都做了一個工作總結，各人都對自己今後工作的道路和方法來做一番研究。

要學好「實踐論」，必須要弄清楚兩個重要的問題：首先要掌握「實踐論」的階級性，又叫社會性。我們工作，我們改造社會，是爲的誰？我們做一件事情，首先要明白它的目的。好比蓋一幢房子，首先要弄清楚是爲什麼人蓋的。要怎樣才合適，我們要改造社會，也要弄清楚是爲什麼人改造，爲資本家、爲封建地主、還是爲別的人？我們說我們是爲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來改造世界的。爲什麼？因爲工人階級是世界上最前進最現代化的生產者，我們改造社會是爲了人類的幸福；而最能使人類幸福的，就是最前進最現代化的機器生產、電氣化生產。所以，工人階級的利益，就代表了整個人類的利益。工人階級的利益，並不排斥其他勞動人民的利益，而是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利益一致的。如果我們要中國工業化，這對工人階級好，對農民、對小資產階級、對民族資產階級也都好。換句話說，我們工作做得好壞，就要看是否合乎工人階級的利益。我們的認識論是工人階級的認識論，而不是別的階級的認識論。俗話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你說你的道理，他說他的道理，而我則不偏不倚。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話。這就是沒有階級立場，我們要指出這是不對的。這個世界要不要改？不能說要改也不要改。如果說要改，怎樣改？我們要有一個明確的回答。現在，我們已經確定了要按工人階級的利益要求改。沒有階級立場，區別是非就沒有標準。我們的立場，是無產階級的立場，我們的標準，是無產階級的利益，也就是全人類的利益。其次，我們說一切工作都是改造世界的工作，但總起來說，我們的工作只有兩種：一種是生產鬥爭的工作，即生產我們生活資料的工作。這個工作是很艱苦的，例如現在漲水了，有地方要鬧水災，妨礙我們生產，我們就要進行鬥爭。在農業生產上有許多鬥爭，在工業生產上

更多，諸如原料不够、管理不好、機器出毛病等等。另外一種是階級鬥爭的工作，又叫做政治鬥爭的工作。這方面的鬥爭，就是有些人要破壞我們的生產，如特務破壞礦廠交通以至於害人，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破壞我們的和平建設，土地改革中地主破壞生產，妨礙我們發展生產，對他們，我們就要進行鬥爭，排除這些障礙。我們的各種工作都不外這二種。在各種鬥爭中，我們站在什麼立場呢？滿足什麼人的要求呢？例如工人要求改善工作條件，要求改善福利，而資本家不答應，就要鬥爭，那麼我們在這個鬥爭中站在那一邊呢？滿足那一邊的利益呢？這就需要我們確定階級立場。否則，便分不出進步與反動，好的和壞的了。所以，我們首先要掌握毛主席「實踐論」中對階級性的分析這一點。

階級立場確定了，是否就能解決問題了呢？還沒有。階級立場確定以後，還要確定我們的工作方法。爲誰改造世界是明確了，解決了，但如何改造呢？這就要講求方法。在講到方法的問題時，有兩個問題先要講一講：一個是唯物的問題，另一個是辯證的問題，正確的方法就是唯物的、辯證的。在毛主席的「實踐論」中的第二個特點，便是强調實踐的重要，强調認識對實踐的依賴性。我們的認識，是從實踐中來的，沒有實踐，便沒有認識。爲什麼？就是因爲我們的方法要是唯物的、是辯證的。所謂唯物的，這個「物」是指的客觀情況、客觀條件。客觀條件很多，什麼是最基本的呢？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指出最基本的條件是生產，也就是勞動。作爲一個社會來講，社會的物質基礎就是勞動，就是勞動人民，工人農民。說勞動人民，指的是他們的生產能力和他們的覺悟程度，及其組織情況。因爲技術、覺悟和組織是力量大小的基本標準，生產鬥爭、階級鬥爭，都要靠自己有組織的隊伍。譬如我們說和平民主的力量大大超過帝國主義的力量，這是依據什麼才這樣說的呢？它是指世界上廣大人民要求和平反對戰爭的政治覺悟日漸提高，不但有了覺悟，而且有了各種組織，如和大、青聯、婦聯等等，一天天在擴大與鞏固。這也就是我們所說政治形勢的良好。說這種形勢好，是對什麼人好？對帝國主義是一點也不好，而對人民說來是好的。所以，我們說唯物就是指社會上的人，就是他們的生產條件與政治條件。我們的認識要是唯物的，就是指首先要認識這些條件，毛主席在「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一文中，首先就指出，中國農業生產佔百分之九十，工業生產只佔百分之十這一基本特點。我們在考慮我們的工作的時候，首先就要考慮這個基本條件，這就叫做唯物。什麼叫辯證呢？毛主席在「實踐論」中說得很清楚：所謂辯證，主要就是要根據歷史發展的階段來看問題，依據歷史發展情況來決定我們的工作如何做。關於這一點，最需要我們好好地研究。所謂辯證的認識問題，首先就是我們認識一個問題是要一步一步來認識與提高的，不可能一下子就什麼都認識到了。其次我們的工作是發展的，跟着工作的發展產生了一些新的情況，我們的認識也就跟着新的情況有所發展，並根據新的認識來改進我們的工作。也就是說：我們的認識和工作要不斷地改變發展，要反對保守性，昨天是對的，今天可能不對了，因爲情況改變了。

拿土地改革來看：我們中南區的土改，是在去年十月間開始的，當時有許多人要求所謂「和平土改」，理由之一是說南方地主比北方開明，因此不要强調鬥爭。另一理由是說過去共產黨沒有取得政權，現在我們取得政權了，地主分化了，軟下去了，不敢反抗了，而農民强大起來了，因此不需要鬥爭，一紙命令就行。第三個理由是說羣衆知識很低，發動起來會搞亂的。因此不要鬥爭而要和平分田，這種認識到底對不對？從政策原則上講，可以肯定地說是不對的。但是，如果我們只是口頭上講一講道理，辯論辯論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必須找幾個地方試一試，試的結果才發現和平土改不對。發現地主有所謂「五字訣」：「抗」、「拖」、「賴」、「鑽」、「嚷」，當時地主有三種情況：一小部份地主一開始就不敢抵抗，大部份地主開始抵抗，經過了壓力打擊才放棄抵抗，另一小部份則始終堅決抵抗。在農民方面呢？勝利了，大局已定，農民願意起來分田。但農民還沒有衝破封建的束縛，怕地主反抗，他們說「不怕老蔣怕小蔣」，還怕政府寬大無邊，他們說「我們打老虎，政府放老虎」。還有些封建地域觀念、宗族觀念，對同姓同宗的不願意鬥爭，他們說「賣命不賣姓」，「好人護三村」。還有人怕眼前餓飯，他們說「無米難過土改關」，怕鬥爭便沒有飯吃，他們說「翻得起心，翻不起身」，這一些說明什麼呢？說明農民願意土改，但還有許多顧慮，摸不清土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此，還不敢起來土改。這說明要農民眞正起來土改，必須經過實踐，從實踐中摸清土改的「底」。經過一個階段的試驗，我們才認識到對地主是要鬥爭的，對農民則要撑他們的腰，壯他們的胆，而且要經過一系列的鬥爭。這樣，就打垮了「和平分田」的謬論，並且認識了發動羣衆的必要。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農民已經發動起來了，是否能掌握中央的政策呢？有人認爲要能掌握政策，就不要發動羣衆，發動了羣衆，便不能掌握政策。經過實踐，我們就得到了經驗：我們放手發動羣衆，要放的是什麼人的手？我們要放羣衆的手，要把政策掌握在羣衆手中。

我們放手，是「放反封建之手，而不是放反資本之手；放廣大貧僱農之手，而不是放少數流氓分子之手；放合法鬥爭之手，而不是放亂打亂殺之手。」這樣，一方面羣衆發動了，一方面政策也掌握了。這些，都是經過了實際的試驗才得出來的經驗，想一開始就完全弄清楚這些，是不可能的。反過來，政策掌握了，羣衆發動起來以後，是否就不會發生偏差了呢？還可能有偏差的，那麼怎麼辦呢？有人說，「糾正偏差便又會把已經放了的手束縛起來，」但經過實踐，我們得到這樣的經驗：那就是：「手必須放，偏必須糾」。這些工作方法，不是一開始便有的，必須經過實踐才能得到的。這叫做「從前進中學習怎樣的前進」。這便是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所說的我們的認識過程必須是從實踐中來，加以提高，再到實踐中去。所以，我們參加土改或者看過土改的人，就知道土改是一個很艱苦很複雜的過程，必須要經常注意研究，才能很好地進行。這就是辯證的發展的認識過程，同時也就是辯證的、發展的工作過程。大家還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過去認爲上面幹部好，中間幹部少，下面幹部糟。實際上沒有下面的幹部，這些道理是摸不清的。沒有他們便無法弄清土改中的一切問題。事實證明：下面的幹部在土改中是了不起的。我們所總結的經驗，也就是從他們那裡得到的。這樣，大家對下面幹部的態度也改變了。而這種認識也是通過了工作過程而得到的。這種認識，就叫做辯證的認識。這也教訓了我們，任何工作都不能希望一開始就可以搞得很好，都必須經過實際去做，在工作中進行檢查、研究、總結，得出經驗，我們的工作就可以一天天提高和發展。

如何運用「實踐論」來檢查我們的工作，研究我們的工作，改進我們的工作呢？上面我們講的唯物的辯證的工作方法，總起來說，就是羣衆路線的工作方法。我們說唯物的工作方法，這個「物」，就是指的羣衆。我們的工作方法，就是從羣衆中來，而不是某人憑空想出來的。方法有了，還要到羣衆中去再考驗，經過再考驗，再發展，再提高，再回到羣衆中去，這樣不斷反覆的一來一去，這就是發展，就是辯証。

其次的一個問題，是感性知識與理性知識。什麼是感性知識與理性知識？「實踐論」中告訴我們：感性知識是片斷的零碎的知識，這種知識只是看到了現象，還沒有看到本質。理性知識就是我們認識了事物的本質，認識了事物彼此之間的聯系。一句話：找到了事物的發展規律。拿土改來說：開始我們只看到許多個別的現象，同時在實踐中我們又發現了許多問題、許多矛盾。經過研究以後，我們認識提高了，看到了它們之間的聯系，找到了一些解決矛盾解決問題的方法，找到了一些工作方法，工作提高了，我們弄清了土改的發展規律。這就是理性的知識。

要掌握這樣的規律，學習這樣的規律，對於我們文教工作來說，也是一樣。我們所做的文教工作，大概可分三種：一種是行政工作，一種是業務工作，如辦一個學校或者文化館等，更多更具體的一種，是教學，寫作，做實驗，治療，等等。行政工作的羣衆路綫，應該怎樣做法？我們的羣衆是誰？我們的羣衆就是做業務工作的那許多人。這些人，就是我們的羣衆，就是我們的「物」。我們要去了解他們的情況，總結他們的經驗。把好的經驗推廣出去，把壞的經驗加以糾正。例如：做教育行政工作的人，其責任不在於自己去辦好一個學校，而是在於幫助許多人辦好許多學校。如果不設法幫助大家，而以自己辦好一個學校爲能事，那就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工作方法了。做業務工作的，就是需要了解自己工作範圍中的經驗，那些好的，那些壞的，加以研究。如果做一個學校的校長，他的任務就是做好領導工作，吸收學校中的各種經驗，依靠大家來辦好學校。做教學工作，也要走羣衆路綫，也要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他就要研究那一種教材教起來更有用。那些教材是我們當前建設中所必須的？教法上那一種是好的？必須到羣衆中去了解，也就是必須聽取學生的意見。了解當前青年的接受能力和困難（問題），根據他們的意見與問題來改進教學方法。所以，我們的工作也必須是唯物的、辯証的觀點，唯物的就是要走羣衆路綫，辯証的就是要隨時研究，逐步改進，逐步提高，逐步發展，不要希望一下子就能完全做好。只要我們去做，並且虛心地學習，總結經驗，就可以不斷地提高。

再從另一方面來講一講唯物辯証的方法。有時候，我們自己把一個道理弄清楚了，但自己以外的其他羣衆，還不懂得這個道理，那時候，事情還是做不通，一定要把我們自己懂得的道理，使羣衆都能懂得，事情才能辦得下去。馬列主義的眞理是：「理論必須掌握了羣衆，才能發生物質的力量」，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我們在進行某一件工作時，必須進行宣傳教育，使大家思想一致，才能做得通。所謂條件成熟，前面已經說過，其中包括羣衆的覺悟程度。所以我們要強調民主作風，這也是唯物的一方面。假使我們有了很好的經驗，但羣衆不能接受這個經驗的話，必須一步一步慢慢來，不要急，否則便不合於發展的規律。這也就是辯証的。我們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一個人，而要看成是整個社會中的一分子。

（下轉第11頁）

了解「實踐論」的條件

——自我批評之一——

金岳霖

在中國新哲學研究會裡討論「實踐論」的時候，我曾經很簡單地表示過：要了解「實踐論」，我們得有先決條件，而這先決條件中的主要條件，是解放後的社會實踐。當時話說得非常簡單，現在稍微申引一下。我是一個原來搞舊哲學的人，我這一說法，也是針對於原來搞舊哲學的人而說的。

揩了舊哲學的包袱去了解「實踐論」是辦不到的。原來搞舊哲學的人，總或多或少地揹了舊哲學的包袱。這個包袱只有扔掉一法，對於它，我們不能有別的打算，例如減輕一點或減少一點。如果我們站在舊的哲學範圍之內，想方設法以求合乎世界觀，例如部分的修改或部分的放棄，我們一定要失敗的。我們只有正視新的客觀的世界，讓社會的實踐供給我們以一些基本的積極的思想，然後舊的思想習慣才能去掉。本文所提出的看法，也許個人成分特別地多，但是我相信：這看法還是有它的一般性的。

我個人從前的生活是與社會脫節的生活，思想當然也是和社會脫節的思想。就我個人說，從前的哲學，只是一種概念的圖案，治哲學好像是在擺一種概念的七巧圖。如果從前有人說，我只是在遊戲而已，我決不會承認，因爲我早已跑到形而上的體系中，已經接受了它的方法和它的標準。我從前常說哲學不在發現眞理，而在安排已經發現了的眞理。這就是說：它的任務是把基本的概念整理出來，調和起來，把基本概念之間的空白用唯心的、形式主義的、沒有實踐可能的概念去塡補起來，使所有的基本概念成爲一套形而上的思想體系。別人的經驗我不敢說，我個人從前差不多只在這種體系上用功夫。這樣的體系，一方面最好範圍廣大，另一方面最好結構精密。範圍愈廣大，遺留在外的基本概念愈少，不能以形而上的方式去應付的問題也就愈來愈少。結構愈精密，壁壘也就愈森嚴，使得有此體系的人在主觀上排除與此體系不同的思想的能力也就愈大。這樣的體系當然是空中樓閣，但是它的確有門有戶，有堂有室，有交通道路。我們現在不必問外面的人是否容易進去，我們只問在裡面的人是否容易出來。顯而易見，如果一個人在這樣的體系中活了幾十年，他是不容易出來的。在反動的時代，我們可以躲在這樣的體系裡間接地幫助反動，在進步的時代，這樣的體系當然會阻止我們的進步。

十多年前，我是反對辯証唯物論的。當時有布哈林講辯證唯物論的書。在那本書裡，作者反對形式邏輯。我就抓住了這一點，把辯証唯物論拒絕了。那本書也許不好。然而辯証唯物論之有革命性或進步性，我不能够不知道。布哈林用語言與理論這樣的工具去反對形式邏輯，這是辦不到的事，因爲這些工具的使用，已經承認了形式邏輯。我何必爲不必担憂的事去担憂呢？我何以只見那本書反對形式邏輯而不注意到辯証唯物的革命性或進步性呢？現在看來，從前的自覺的說法是表面上的事而已。骨子裡的原因是階級意識和服務於此意識的形而上的思想體系從中作祟。我不是一個自覺地要維持階級利益或知識份子的優越感的人，可是不自覺地間接地我仍然是要保存階級利益或知識分子的優越感的人。我用形而上的思想體系的方式把價值顚倒起來，把無關緊要的概念看成重要的東西，把革命看成不重要的事體。這樣一來，自己的理論恰恰可以滿足自己當時守舊的態度。思想是有黨性的。我當時的思想當然也有。可是，我那時候的確不知道我的思想掩護了我的行爲，使我心甘情願地躲在象牙塔裡。我在那個象牙塔裡看事實，所謂『事實』也就成爲在形而上思想範罩之下的『事實』了。這豈不是唯心嗎？是的，這是十足的唯心。但是，在形式上，我的哲學並不唯心，這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從前是一個所謂實在論者。在主觀上，在概念的安排上，我的思想的確有相當多，似乎也可以說相當堅強的，唯物成分。在文章裡，在講堂上，在哲學討論會上，我的確堅持了非承認有獨立於我們的意識而存在的外物不可。我的確認爲不承認這一思想，哲學就說不通。解放後，我曾以此自慰。可是考驗不久就來了。在政治課的報告上，我曾報告過唯物論，我發現從前的唯物成分

根本不相干；大家所要的，根本不是那樣的東西。從前的唯物成分，根本不是辯証唯物論的唯物觀點。那種唯物成分只是形而上體系中的一個出發點，一個項目，在概念圖案中我雖然着重它，然而在生活中我並沒有因此就唯物或實事求是。這個唯物成分並沒有減少我的主觀主義，在解放的時候，也沒有使我很快地接受新思想。它本身是唯心的，它在形而上的思想體系中雖然答覆了唯心的形而上的假問題，然而就實際說，就社會的實踐說，它不是人們所需要的唯物觀點。它是字面上的唯物，它是唯物的幌子使唯心的人可以繼續的唯心下去。解放前二十多年來的寡頭專政與獨夫專政難道我沒有意識到嗎？難道對於那樣的東西我連一點感性認識都沒有嗎？感性認識我的確是有的，但是它只陷我於悲觀與玩世。如果我眞的有唯物觀點，我爲甚麼沒有進入理性的認識呢？我既沒有進入理性的認識，我那引以自慰的唯物成分根本就不是指導行動的唯物觀點。總而言之，整個的形而上的體系是和現時世界脫節的思想，它有沒有唯物成分不相干，它有沒有辯證成分也不相干，唯心的辯証不辯証，形而上的唯物不唯物。

以上是我個人在解放前的思想情況。這情況不見得太特別。在這裡，我說得非常之簡單，但是，我盼望讀者能够抓住這種思想情況，想一想一個人在這種思想情況之下會不會，能不能够，了解「實踐論」。假如在解放之前有人拿着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實踐論」，要我研究，我一定會歪曲「實踐論」，我一定會根據形而上的方式把它批評得不像樣。我會以知識裡手自居用諷刺的口吻說認識問題不是幾千字所能解決的，我會說認識的主要問題，在「實踐論」裡沒有提出，我會毫無疑問地說認識與階級鬥爭不相干……。假如在那時候有人反駁我，說我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說話，我也許會盛氣凌人地否認。事實上有一位先生說我是客觀唯心論者，我當時曾覺得啼笑皆非，因爲我自認在哲學上我和唯心論鬥爭了二十多年，我怎麼會成爲唯心論者呢？那時候我不知道實在論的那種唯物成分根本不相干。如果在解放前我看見了「實踐論」，我決不會接受它，更不會以實踐的標準去了解它。

以上所說的那個想像的情形是很自然的，因爲一個形而上的思想體系，一方面是近乎自足的體系，麻鵲雖小，五臟齊全。單用抽象的思想去批評它，它可以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另一方面，這樣的形而上的思想體系，又是一個僵化了的體系，它沒有內在因素可以使它發展成爲合乎進步世界的新哲學。原來搞舊哲學的人的思想上的包袱，是非常之重的，要我們閉門思過，那個過是思不出來的。我們的思想改造和任何人的思想改造一樣，我們只能够跟着客觀的環境的改變而有所改造。我們決不能因爲從前曾經搞過哲學，遂以爲我們就能够很容易從舊哲學轉移到新哲學。事實上，我們的思想包袱重些，我們的努力要大些才行。

北京的解放帶來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我們起先只是觀察而已。這個世界經得起觀察，耳聞目見的奇蹟非常之多，現在也不必一一提到。大致說來，解放軍的紀律，無論在鄉村或城市，都使我們不得不愛護解放軍，共產黨的領導使我們不得不心服，政府的作風使我們不得不擁護。觀察一些時候之後，我們自己慢慢的忙起來了。我們參加了從前所沒有的工作，跟着從前所不認識的人學習從前所沒有的工作作風。我們參加政治課，作講員，作班教員，和同學一起搞思想，讓青年人的活潑的尙且沒有凝固的思想滲入我們的自己的思想中來，在城裡開會，在學校裡開會，搞土改，辦行政，參加全國性的運動：例如抗美援朝，定愛國公約，鎭壓反革命，以及最近的捐獻飛機大砲等等。實踐的方面不多，但是實踐的本質已經改了，它是舊社會裡所得不到的實踐。總而言之，客觀的環境把我們從個人生活中慢慢地拖出來，遂到半集體的生活中去。在這個改變中，書本中所看見的字句，如勞動觀點，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階級意識，理論與實際的配合……等的具體的內容都在自己的工作中成爲實在的東西。出現得愈多，它們的實在性也就愈大。我們的經驗還是太少，也許少得可憐，但是這些經驗已經使一些進步的積極的思想生根。新的思想生根就是舊的形而上的習慣已經開始被我們放棄。這個捨舊取新的轉變，不是憑空的靈感所產生的，不是直覺所頓悟出來的，它是客觀環境中的社會實踐的結果。沒有這樣的社會實踐，我們不會自動地從形而上的體系中跑出來的。我們不從舊的哲學中跑出來，新的哲學是無從接受的。

我們這一跑，是行動上的跑，這就是說它是實踐上的跑。客觀的環境所供給我們的社會實踐使我們在行動上跑到行而上思想體系範圍之外，我們的思想跟着也衝出形而上思想體系的包圍。衝出這個包圍之後，回頭來看形而上的體系，我們會發現形而上就是不科學。這個認識正如「實踐論」所說是從實踐中來的。我們的工作是摸索，但是不是暗中的摸索，它是有領導的，所以也是有理論基礎的，雖然它不是暗中摸索，然而它仍是摸索，這就是說，它不是遵守成規的工作，而是發現適合於情況的辦法的工作。在這樣的工作過程中，我們慢慢接受了新哲學。這個接受也正如「實踐論」所說是從實踐中來的。

放棄舊哲學和接受新哲學，是思想改造中的兩端，原來搞舊哲學的人，也

會在這兩端中間停留些時候，搖擺些時候，甚至於來回跑些時候。這個情形想來是一般的情形，可是原因並不見得一樣。我們可能有一個特別的原因，我們會感覺到舊哲學雞肋磨人，一方面食之無肉，另一方面又棄之有味。戀舊是非常自然的事，我們不能抽象地說它是好事或壞事。問題是如何使對舊哲學的戀舊成爲好事。我覺得我們可以把舊哲學家對於哲學體系的信仰的眷戀轉變爲對於歷史上的寶貴材料的眷戀。在下段我要簡單地提出這一看法。對與不對我不敢說，但是它既是思想改造過程中的問題，我們來討論它並求得解決，也有關於「實踐論」的了解。

辯證唯物論固然要從觀點立場與方法來討論，但從原來搞舊哲學的人着想，也許我們可以集中到新哲學是科學不是形而上的體系這一點來看問題。舊的哲學的形而上的成分確有多少的不同，但是一般地說，都是形而上的、反科學的。抓住這一點，我們就可以體會到無論那一個哲學體系是否有唯物成分，或辯證成分，我們都不能夠把那個體系和辯證唯物論相提並論。我們抓住了這一點，加上我們對於階級立場的初步了解，我們也會在哲學上一邊倒，我們會否定舊哲學的體系。可是，否定舊哲學的體系，不是否定舊哲學的一切。反過來，我們可以說，否定了舊哲學體系之後，它才可能成爲有用的東西。顯而易見，評判了整個的體系之後，我們才能吸收一部分的內容。一所不合用的沒有歷史價值的房子，我們只能把它拆了，才能利用它原來的木料，它原來的磚，它原來的窗子……等。這些東西如果擺在原來的房子裡，也就跟着原來房子的不合用而不合用，拆了之後，它們才可能適合新的用處。哲學有同樣的情形。毛主席、劉副主席的文章裡常常有孔孟的話，他們絕不是接受孔孟的哲學，只是在否定了孔孟的哲學之後，引用孔孟所供給的材料而已。我們否定了舊的形而上的體系之後，才能把原來的哲學轉變爲歷史上表現前進因素或後退因素的材料。有的無用了，有的仍然有用。有的材料是寶貴的遺產。對於這樣的遺產，我們應該眷戀。

無論如何，解放後的社會實踐，在我們的改造過程中供給了我們以了解「實踐論」的必要條件。沒有這些條件的話，我們不會了解「實踐論」。我們分以下三點來討論。（一）假如我們保留了形而上的思想包袱，我們根本不會同「實踐論」碰頭。我們會把認識孤立起來，會發生一串人們在實踐中所不會發生不能發生的問題，例如認識究竟可能與否？如果它不可能，日常生活中的所謂「認識」又是如何的事體呢？如果它是可能的，它又如何可能呢？我們會把認識論看成討論認識之所以爲認識的問題，而不會討論它的發生與發展。這是一個看認識問題的總方式，這個方式就是形而上的方式，它與「實踐論」的方式會格格不相入。不根本放棄不正確的方式，是沒有法子接受正確的方式的。所謂根本的放棄，不只是尋常的放棄而已，它是以新的覺悟爲根據的放棄。這個新的覺悟，就是我們覺悟到形而上的思想體系是反科學的、不正確的、要不得的。沒有這個覺悟做基礎。所謂放棄可以只是冬天裡放棄夏衣，夏天裡放棄冬衣而已。可是，這個覺悟只能從實踐中得來，沒有幫助我們建立這個覺悟的實踐，我們無從抓住「實踐論」的整個理論，枝節問題不必說了。

（二）假如我們保留形而上的思想包袱，我們會以抽象的方式看問題。「實踐論」是一篇哲學文章，它是具有一般性的。可是雖然如此，它仍然生動、簡單、扼要。其所以如此者，因爲這篇文章的分析仍是具體分析。假如我們用抽象的方式去研究這篇文章，我們會把具體的事體例如階級鬥爭，從它的具體的內容，具體的條件，具體的聯繫中抽出來，讓它成爲一與實際無關的概念，我們也許會想方設法，給階級鬥爭以各種不同的定義，把每一定義的含義羅列出來。羅列愈多，離題愈遠，我們會感覺到「不懂」。這只是就階級鬥爭這一件事說而已。假如我們把這個方式用到其它的事情上去，我們雖有研究「實踐論」的形式，然而不會和「實踐論」有任何的接觸。我們用抽象的方式去研究「實踐論」，我們實在只是要把它拖到形而上的體系裡面去而已。我們既然不能把它拖進去，我們當然不能『懂』「實踐論」。只有放棄這個方式，才有了解「實踐論」的可能。

（三）以上是從思想方式着想，用這樣的方式去看問題，對於問題的看法，當然會差以千里。「實踐論」開始就肯定認識對生產與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這是「實踐論」的主要思想之一。這一句話，馬上就把實踐斷定爲認識的來源、階級鬥爭對於認識何等重要，可是，假如我們仍然保留形而上思想體系的包袱，我們如何能懂得階級鬥爭與認識的關係呢？形而上的思想體系雖然在骨子裡和任何別的思想一樣，它雖然同樣代表階級性，同樣有黨性，同樣參加階級鬥爭，然而有形而上包袱的人決不會公開地承認形而上體系的本身就代表階級，決不會承認它本身就參加了階級鬥爭。我個人承認這一點是相當晚的事。我們從前既不承認哲學的任務之一是改造世界，決不會承認改造世界的動力之一的階級鬥爭在哲學中的重要地位，既不承認這個鬥爭在哲學中的重要地位，當然不會承認革命在哲學中的重要地位。假如我們一直保留着形而上思想體系

的包袱，我們那裡能夠了解認識與革命的關係呢？不了解這個關係，怎樣能說了解「實踐論」呢？「實踐論」是中國革命經驗的科學總結，是指導革命走向勝利的大道理，這一點抓不住，別的當然不必談了。辯證唯物論是要改造世界的哲學，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也是要改造世界的認識論。不接受辯證唯物論是無法了解「實踐論」的，不根本放棄形而上的思想是不會眞正接受辯證唯物論的。辯證唯物論，只能在解放後社會實踐中去接受，不能關起門來想在書本上去接受，書本上的知識當然是重要的，（在這一點，我個人就犯了偏差，我沒有唸多少新書，）可是開開門到新的社會裡去實踐更是重要。

以上（一）（二）（三）只是說，沒有解放後的社會實踐，我們就不能了解「實踐論」。這不是說，有了這樣的實踐，我們就可以深刻地了解「實踐論」。初步了解是可以得到的，深刻的了解，還是要繼續地努力才行，在現在談了解，當然不是從前的形而上的了解，字面上的了解，概念式的了解，或根據概念而作出許多推論的了解。「實踐論」的認識既是知行統一了的認識，它所講了解也是知行統一了的了解。眞正的了解「實踐論」，要我們能夠把「實踐論」的道理，成爲我們行動的指南。這就是說，要我們能夠掌握「實踐論」。掌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個人就沒有能夠把「實踐論」作爲行動的指南，我可以把關於武訓傳的討論來作例。

武訓傳的討論的展開，就是重新學習「實踐論」的機會。在這個討論展開之前，我個人就沒有聯繫到「實踐論」，我那時依然是保持思想上的惰性，舊的不連貫的感想，我依然保存着，我沒有自動地研究，沒有按着新的觀點去整理我的感想。這就是說，我停留在感性認識的階段，沒有提高我的認識到理性階段。這難道算是充分地了解了「實踐論」嗎？「實踐論」上說『感性與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在我寫文章的時候，我可以把我對武訓的感想認識提高一些，可是這個提高了些的認識和原來的感性認識沒有統一而成很自然的思想。難道這是充分地了解了「實踐論」嗎？在武訓傳的討論開始展開的時候，我還以爲這問題是一個「小」問題。它怎麼「小」呢？是不是我仍然有形而上的標準從中作祟呢？在討論展開了好久之後，正確的思想不斷地在報紙上肯定下來了。我是否有人云亦云的趨勢呢？要是我只是人云亦云，難道還能說我充分地了解了「實踐論」嗎？武訓傳的討論已經進行好久了，但是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一個全盤的精密的，感性與理性統一了的，而又正確的看法。這就是說，我還不能掌握「實踐論」，作爲我的學習的指南。

綜合以上所說，沒有解放後的社會實踐，沒有在這個實踐中的思想改造，我們是無法了解「實踐論」的。可是有了這點點子實踐，我們仍然不能充分地了解「實踐論」。學習「實踐論」，要用「實踐論」裡所說的道理去學習。我們非『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覆』地去學習不可。同時，舊哲學包袱重的人要特別留心到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在循環往覆中，我們要不斷地改造。我去年認爲假我十年，我可以學好馬列主義的哲學。現在看來，還是不夠，因爲這個哲學是行動的指南，而行動的指南是讓理論與實踐脫節了幾十年，或十幾年的人所最難學到的。但是涓涓之水可成江河。只要我們能夠把一點一滴的體會聚集貫串起來，我們終會有搞通的一日。

（上接第7頁） 不但自己要好，而且要大家都好，才能做好我們的工作。我們常說我們幹部能力差，工作做不好，是什麼道理呢？就在於我們的幹部還沒有掌握唯物辯証的觀點，所以，我們要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

「實踐論」告訴我們的，是一個總的方法，希望從「實踐論」中找到一切工作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必須學習運用「實踐論」的方法來檢查我們的工作，改進我們的工作。在學習運用這種方法的時候，可能一下子打不通，那我們可以研究一下別的問題。例如：我們剛才講過的土改問題，以及鎭壓反革命的問題，或者財政經濟問題等等，這些研究，都可以幫助我們打通思想。例如：研究一下財政問題，去年二、三月我們强調統一，要求嚴格集中，那對過去來講是一個變化，到今年二月又要劃分三級制，統一領導，分層負責，這是什麼道理？我們說，這就是辯証的發展的。去年條件同今年不同，如果去年不統一，物價便不能平穩，而今年，我們的事業發展了，各種條件不同了，我們的做法就必須有所改變。鎭壓反革命工作也是一樣。鎭壓與寬大相結合，開始我們側重在寬大的一面，現在我們要側重到鎭壓的一面來。都是根據當時的客觀情況和條件來決定的。執行政策的方法，是需要因時因地而變化的。不了解客觀情況，不根據客觀條件，就不是唯物的。客觀情況變了，我們的工作方法不變就不是辯証的，也就不是唯物的。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美、日帝國主義是中蘇兩國人民的死敵

羅榮渠

美國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蘇兩國人民的死敵。美、日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人民的同時，一貫地進行了破壞中蘇兩國人民友好的可恥的勾當，這些可恥的勾當，和它們在中國所欠下的血債一樣，是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的，讓我們來揭露它們的罪狀：

一 美、日勾結，破壞中蘇建立邦交的最初的罪行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利用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在歐戰中忙於自己事務，無暇清理亞洲殖民地的空隙，加緊擴張了它在中國的勢力。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日本得到了一個侵略中國和西伯利亞的好機會。日本和它在中國的走狗段祺瑞的賣國政府相勾結，訂立了所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其目的是在以『共同防敵』之名，攫取控制中國的軍事機構和東北的許多特權；並且慫恿段祺瑞政府共同出兵西伯利亞，扼殺年青的蘇維埃政權。當時段祺瑞為了貪污日本的借款，便欣然聽從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提議，並根據『中國軍隊入日本軍司令指揮之下……』（註一）的協定，派了一個混成團在日本大谷將軍的指揮下，隨着日本侵略軍侵入了蘇聯的遠東領土，（與此同時，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也都先後出兵侵佔西伯利亞）。這是日本侵略中國與反蘇陰謀相結合的最早的罪行。

但帝國主義干涉俄國革命的陰謀，不久就被蘇聯人民擊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新俄建立不久（一九一九年），即向中國人民及當時的南北政府發出宣言，聲稱要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並表示願意和中國建立眞正的平等的外交關係。但是，當時在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北京政府，只知道竊國肥己和屠殺人民，不但對這個宣言置之不理，反而支持着北京舊俄使館及中國境內的白俄份子進行反蘇活動。一年後，一九二〇年十月，蘇聯又發出了第二次對華宣言。這個宣言毫無掩飾地指出了帝國主義阻撓中蘇兩國人民友好的陰謀：『我們知道，俄中兩國人民的敵人亟圖阻撓我們的友好和親近，他們認識到這兩個偉大民族的友好和互助將使中國強盛，將使任何外國人不能再像今天一樣地奴役和掠奪中國人民。』（註二）宣言中重申了第一次宣言所提的放棄帝俄一切特權及平等互惠的外交原則，建議與我國政府談判建立外交關係。但在日本、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的干涉下，談判始終無法舉行。

然而，北京政府拖延中蘇外交談判的陰謀，終於受到了全國人民和輿論的指責。為了欺騙人民，北京政府曾經派了一個使團到蘇聯遠東共和國去試行商洽。在這個使團中有三個帝國主義份子充作顧問，（其中之一即美國的福爾格森（Фиргссон），其餘二人，一為英人、一為法人），他們的任務是去調查遠東共和國的經濟情況（註三）。這個使團到遠東共和國走了一趟，對於兩國邦交的建立並沒有作出甚麼成績來。但是，在這個時期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却大大地增漲着。蘇聯代表優林、越飛、加拉罕等人曾先後來到了北京，受到我國人民的熱烈歡迎。這些中國人民之友的到來，使得當時進行阻礙中蘇談判的帝國主義使團們（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大為惶恐。一個美國在華的教會負責人霍德金（Годкин）說道：『使你感到驚異的是布爾什維克思想在中國青年當中傳播之廣！』（註四）於是，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Шурман）就伺機大肆造謠，誹謗蘇聯。一九二二年九月，北京政府在人民的強大壓力下已經準備開始和越飛進行談判，可是，由於以美國代表為首的外國使團發表一通反蘇言論，就把當時我國的外交部嚇唬住了。談判又告擱淺。

但是，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阻撓中蘇邦交的陰謀，最後還是失敗了。儘管加拉罕一到北京就受到各帝國主義新聞報紙的猛烈攻擊，然而當時北京的學生、人民羣衆却熱烈地擁護他，並且一再催促政府與加氏談判。北京政府因為執拗不過人民的意願，終於和加氏開始談判建立國交和締結平等互惠的中蘇條約等

問題。在談判進行當中，美、日、法等帝國主義仍不死心，繼續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議，積極進行破壞活動。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北京政府代表王正廷與加拉罕談妥了中俄協定的草約，雙方並在草約上簽了字。但在這個談判即將大功告成的時候，美帝國主義又來進行最後的破壞了。美國一方面在暗使法國出頭干涉，在前此兩日（十二日），由法國出面向北京政府發出一個嚴重的抗議；一方面聯合日本於十四日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註五）。於是北京政府在帝國主義的唆使下，厚顏無恥地推翻了草約的簽字，談判就告破裂，中蘇關係一時十分惡化。所以，這次談判的破裂完全是美、日等帝國主義一手製造的大陰謀。

這次談判停頓了兩個月，最後在中蘇雙方的秘密協商下宣告成功。美、日帝國主義破壞的陰謀失敗了，但它並不就此罷休。日本在中蘇協定（即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公佈後，向北京政府提出聲明，保留美國召集的華盛頓會議中關於中東路的決議，以此來對抗中蘇協定。同時以代理領袖公使舒爾曼（美使）為首的北京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使團聯合起來進行新的阻撓，拒絕蘇聯第一任駐華大使加拉罕接收帝俄使館；上海各地俄國領事館的殘餘白黨，也在各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起來進行搗亂。蘇聯政府對這種無理的阻撓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後帝國主義使團終以持理不足而向蘇聯作了讓步。但在請求加拉罕接收使館的照會的附件中，聲言『美國使館之行動並不含有美政府承認蘇聯之意』（註六）。加拉罕對於這種侮辱感到無法忍受而退回了照會附件。使館問題的解決遂因為帝國主義的阻撓而拖遲了一個時期。

二　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張作霖勾結，破壞中蘇邦交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期，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又伺機進行阻撓大革命和破壞聯蘇聯共的政策。日、英帝國主義一手製造了五卅慘案，直接屠殺了我國青年工人及學生；同時又放出一支毒箭，說五卅運動是蘇聯主使的。當時它們找到一張加拉罕在北京大學所攝的相片，在報紙上刊出並加以按語：『加拉罕大使之氈帽係由學生敬代持之，足見其親熱之程度』（註七）。想以此構成蘇聯指使中國革命的罪證。這時，美、日帝國主義已在反革命的隊伍中找到了它們的忠實走狗蔣介石，開始暗中佈置了出賣革命的血腥暴行。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蔣介石製造了反蘇反共的『中山艦事件』。一九二七年六月，蔣介石僞造所謂發現第三國際『破壞』國民黨的陰謀，解除了幫助中國革命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的職務；同年十二月，蔣介石反動政府和蘇聯斷絕了外交關係。中蘇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在美、日帝國主義唆使下，被人民公敵蔣介石斷絕了達五年之久（北京政府則繼續對蘇保持着不友好的關係）。

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勾結蔣介石圖謀出賣革命，一方面又勾結東北的軍閥張作霖進行反蘇陰謀，以掃除它侵略東北的阻礙。在日、美、荷等帝國主義的指使下，張作霖竟然違反國際公法，派兵搜查了蘇聯的北京使館。蘇聯政府對北京政府受帝國主義策動的這個反蘇暴行提出了嚴重的抗議，並直斥『不負責任的外國帝國主義集團在挑撥蘇聯進行戰爭』，又指斥『北京內閣變成了外國帝國主義集團所導演的把戲的工具』（註八）。隨即撤回了使館人員，到這個時候，中蘇邦交事實上已告中斷。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仍不以為足，繼續挑撥中蘇友誼，授意張作霖以防止『赤化』之名，用武力奪取中東鐵路。關於這次反蘇陰謀的真相，『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上寫道：『一九二九年夏，帝國主義在挑起中蘇衝突事件，唆使中國軍閥強佔中東路（中東路是屬於蘇聯的），指使中國白軍侵犯我國遠東邊界。但中國軍閥所舉行的襲擊在很短期間就被消滅下去，被紅軍擊敗的軍閥們只好退却，於是這次衝突就由我國同滿州當局訂立和平協定而結束』（註九）。

三　日本帝國主義離間中蘇邦交，從『九一八』到『七七』

日本帝國主義挑撥中蘇友誼，坐收漁人之利的毒辣詭計不能實現，最後只好明目張胆地出兵侵略我國，其矛頭則指向蘇聯。臭名遠揚的田中奏摺中早已宣稱：『欲得北滿之富源，勢必以干戈與俄國周旋於蒙古之野，此乃王道應有之事。故遲早必須與赤俄一戰』（註十）。『九一八事變』是田中奏摺的第一步驟。佔領東北的企圖，一方面可以東北為基地南向征服全中國，一方面可以此為基地北上侵略蘇聯。『九一八』事件爆發以後，日本為了要使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信任它是『防禦第三國際，保衛資本主義的東洋警憲』，即向全世界宣稱它的侵略行動是為了阻止『赤化勢力的南侵』，以博得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和援助。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反蘇陰謀相結合的一個顯明的例證。美帝國主義當時對於日本侵害其『門戶開放』政策的專橫手段是不滿意的，但是它打着另一個如意算盤，即希望日本與蘇聯發生衝突，讓日本去充當進攻蘇聯的國際反蘇陣營的急先鋒，再利用日蘇戰爭來削弱日本的力量，從而攫取中國。日本侵佔東北之後繼續南下侵略中國，對於北向侵略蘇聯則按兵不動。只是日本反

動報紙，大肆進行反蘇宣傳，誣衊蘇聯以武器、飛機和教官資助中國軍隊。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日政府向蘇聯提出照會，抗議蘇聯對東北中國軍隊的援助；一方面又以甜言蜜語，誘騙蘇聯，保證不在東北侵害蘇聯利益。但事實上，日本佔領哈爾濱之後，即組織訓練班訓練大批反蘇間諜，並把這些間諜派到蘇聯，企圖打入軍事、工業、運輸及電力站等機構以進行破壞及刺探情報的陰謀。『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不斷製造所謂『邊境問題』向蘇聯尋釁，對蘇聯作試探性的進攻。據統計，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到一九三六年爲止，日本所製造的蘇『滿』邊境武裝衝突達二千四百次之多，平均每天有一次衝突，而這些糾紛大部都未獲得解決。（註十一）但是由於蘇聯紅軍的强大，使侵略者認爲是『最爲寒心的一件事』，因而未敢輕擧妄動。

日寇見直接侵略蘇聯既不可能，就轉過來和蘇聯表示假意親善。但是『九一八』事變以後，蘇聯即已認識到日本侵略勢力的擴張對於遠東和平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就開始和中國政府商議恢復國交和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當這個消息被日本反動集團探悉，就急忙施用各種方法加以破壞。日本駐蘇大使廣田馬上建議與蘇聯訂立一個互不侵犯條約，在松岡洋右赴歐經過蘇聯時，還曾與加拉罕進行談判，想以締結日蘇條約的方式來切斷中蘇關係。但是蘇聯識破了這個可恥的陰謀。爲了防止日本的破壞，中蘇兩國復交問題的談判急轉直下，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復交談判成功，中蘇兩國正式恢復邦交。斷絕了五年的中蘇邦交，在中國民族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生死關頭又恢復了起來。

蘆溝橋事變以前，美國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與日本外交當局交換了反蘇問題的意見，當時日本的答復是『俄國人是夢想者，永遠不必予以重視』（註十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本和德國兩大法西斯强盜締結了防共協定（反共產國際協定），次年十一月，意大利法西斯也參加了協定，結成爲東西呼應的國際侵略陣線和反蘇集團。從此以後，日本更無忌憚地要來實現它那滅亡中國的迷夢了。在「七七」事變以前，蘇聯駐我國大使鮑格莫洛夫曾向我國建議，願意加强中蘇邦交和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但是當時反蘇反共反人民的蔣介石反動派不顧接受，特別是親日派大漢奸汪精衛反對最烈。中蘇邦交的進一步鞏固，仍不能實現，敵人就抓住了我國外交上孤立無援的空隙，毫無忌憚地殺了進來（註十三）。

四　美帝國主義幫助日本侵略中國，進攻蘇聯

『七七』事變以後，日寇又把反蘇的旗幟大張起來。侵華禍首近衛文麿宣稱：『日本政府官員已一致認爲有增强反共軸心的必要』。事實上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一箭雙雕的策略：以反蘇爲號召，一方面可以求得其他帝國主義的諒解和援助，達到侵略中國的目的；一方面又可以反蘇戰爭來誘降像汪精衛之流的大漢奸，以破壞我國抗日戰線；同時也是向蔣介石爲首的四大家族表示日本是他們『剿共』的『友邦』。據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泰晤士報』所載，廣田表示如果中國政府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則日本可以對華讓步（註一四）。但因爲當時全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和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的路線，壓倒了蔣介石的妥協投降的賣國路線，才使得日、蔣的買賣沒有能做成功。

『七七』事變後不及兩月，蘇聯就和我國簽定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是抗日戰爭開始以後首先援助我國的友邦，同時也是當時唯一主持正義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國家。據一家外國報紙的記載，蘇聯在抗日戰爭中給予我國的貸款爲四億五千萬美元，而美國和英國的貸款總共才祇一億零二百萬美元，蘇聯的貸款比美國多六倍，比英國多十七倍，比英美兩國的總值多四倍半。而蘇聯志願援華空軍戰士所付出的代價和犧牲還未計算在內（註十五）。又據另一材料，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份裡，美國售給中國的軍火總值僅爲二十萬美元，而同月內售給日本的則達九十萬美元之多（註十六），這就是美國對中國人民的所謂『傳統友誼』!?連美國反動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也說：『如果它們（指美國和英國）能對日本禁運，比一百倍的現款援華還要好。』

日本對於蘇聯援華的偉大義擧當然很感頭痛。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日本又施其破壞中蘇友好的慣技，厚顏無恥地向蘇聯提出了抗議。但是，蘇聯堅持正義，不爲所動，自抗日戰爭開始以來，不但不賣軍火給日本，就連向來賣給日本的石油也都停止了供給。

日本於一九三八年在張高峰，一九三九年在諾門坎先後採取了侵略蘇聯的行動，東條英機高唱所謂『對華對蘇同時作戰論』。但結果遭到了蘇聯紅軍的沉重的反擊。

一九四〇年九月，日、德、意三大侵略强盜重振旗鼓，訂立了三角强盜同盟。這時，日寇受到我廣大解放區戰場的牽制和威脅，吞併中國的妄圖不能實現，就打算南進掠奪南洋殖民地，又再一次造謠離間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早在同年的三月，美國合衆社就幫助日本造謠，從巴黎傳來『東京權威方面消息』稱，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正在進行，日方的條件有蘇聯停止援助中國

政府等（註十七）。到了十月謠言更盛，甚至說日使建川已與斯大林晤談，商議劃定遠東勢力範圍，包括蘇聯同意停止援華一節。日、美帝國主義想以這些謠言攻勢來制止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但是這並沒有嚇倒蘇聯，蘇聯塔斯社於十一月十五日奉命駁斥了美國合衆社的可恥的謠言。蘇聯駐日大使梅丹寧於十二月四日義正辭嚴地答覆日政府稱：『蘇聯對華政策依然如故，決不變更』。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美關係破裂，美國不得不採取蘇聯對日的政策，即聯合蘇聯來打垮日本。但是美國的手段比日本還要惡毒，它希望蘇聯出兵對日作戰的目的，並不是要消滅日本帝國主義，而是要借蘇聯紅軍的威力來打擊一下日本，減輕自己在攻佔日本本土中的阻力和損失；同時可以日蘇戰爭來削弱蘇聯的力量，而自己竊取勝利的果實，以控制日本和獨霸中國。當時，美國『外交政策消息』上的一篇『我們的對華政策適合於太平洋戰爭嗎？』一文中露骨地表示：『美國民衆不知道蘇聯是否將用軍隊對日作戰，但這種幫助將一定受到美國朝野的歡迎，盼望蘇聯對日作戰，而又不要他們對於作戰區發生影響，這顯然是要求莫斯科做我們不要求我們自己做的事情。』（註十八）美帝想是踏兩只船，結果却大出所料，蘇聯一出兵援助我國對日作戰，立刻擊潰了日寇精銳的關東軍，澈底粉碎了遠東最强大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武力，迫使了日本無條件投降。

五　美帝國主義幫助蔣介石反蘇反人民的罪行及其失敗

毛主席說：『蔣介石反動集團在一九四六年發動全國規模的反人民的國內戰爭的時候，他們之所以敢於冒險，不但依靠他們自己的優勢的軍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們認爲是異常强大的、擧世無敵的、手裡拿着原子彈的美帝國主義，一方面，能够像流水一樣地供給他們以軍事上與財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狂妄地設想所謂「美蘇必戰」，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美帝國主義一方面，它之所以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幫助李承晚侵略北朝鮮，扶持日本帝國主義，這一切罪行不止在於奴役亞洲人民，把全亞洲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同時也在於建立起未來反蘇戰爭的軍事基地；同時，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全部陰謀，只是它的世界規模的反蘇陰謀的一環。

在全世界各地煽動新戰爭陰謀的美帝國主義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給蔣介石反動政府發出了一個反蘇照會，蔣介石就立刻忠實地執行了主子的命令而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反蘇、反共、反民主運動。國民黨反動派動員了全部御用報紙，大肆叫罵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簽訂）爲『賣國條約』（很奇怪！這個『賣國』條約却是國民黨政府自願同蘇聯訂立的！）；唆使特務學生策動反蘇大遊行；叫嚣『廢除中蘇條約』。美蔣合作導演這幕醜劇的目的，祇是企圖借此給中共一個打擊，作爲發動更大規模的屠殺人民的內戰的一個前奏。但是這個大陰謀不久就被人民識破了。

儘管國民黨反動派利用『中央社』散佈反蘇的謠言，但蔣匪軍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發動內戰的最初一年中，就被解放軍殲滅了一百二十萬人。蔣匪軍在陝西、山西、河北、東北等地都開始連吃敗仗。爲了維持自己在美國債主眼中的威信，反動派又急忙找尋所謂『客觀原因』。中央社與美聯社狼狽爲奸，造謠說蘇聯擬定作戰計劃並指揮着東北人民解放軍作戰；又說甚麼日本戰俘三萬人及由蘇聯人與日俘駕駛之坦克八十輛參加中共作戰（謠言載於美國駐日軍政當局機關報『花旗報』）。一九四七年五月，蔣匪駐美大使顧維鈞從美國拍回一個電報，要蔣介石在杜魯門赴加拿大演說對華政策以前，趕快發動一次反蘇運動，以換取美國援華貸欵。於是『中央社』大放厥辭，造謠說『蘇聯接濟中共』，又製造所謂『新疆北塔山事件』（註十九）。在這時，僞裝親蘇的美帝國主義走狗孫科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孫科於六月二十日接見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說蘇聯配合中共軍隊作戰。繼又幾度發表談話，向他的美國主子搖尾乞憐道：『中國若失東北，即對美國爲威脅，對世界和平亦爲威脅。美國應有所表示。』最後，還帶着撒嬌的神態說，美國反響如果冷淡，則蔣介石匪幫政府『將重新考慮態度』。孫科的反蘇大砲放出以後，連他的美國主子也感到可笑。當時蘇聯眞理報曾這樣無情地揭穿了這個反蘇陰謀的眞象：『這一切是十分明顯地表示出中國反動派煽動反蘇之詭計，是他們盡量設法要獲得證明，能說服美國放債者們，相信中國需要金錢，因爲由蘇聯發起外國的侵略似乎是給他們以威脅的。……還有一另外的原因，他們現在急欲用國外的煽動而引起人民的注意，以便不注意國內惡劣的情況。』（註二十）

美帝國主義奴役中國人民的血腥勾當及其所扶持的蔣介石匪幫，到一九四八年已經面臨崩潰了。但美、蔣仍然想作垂死掙扎，繼續擴大內戰，加緊反蘇反共反人民。同年年初，反動派政治掮客莫德惠以僞國大外交審查委員會主席資格發表反蘇聲明，謂『中蘇條約已失去意義』。同時『中央社』又一連串地製的題造行謂權旅大所問政來欺騙人民、混淆國際視聽。然而，想以這些『努

力一來挽救內戰的失敗，是無濟於事的。八月中旬，反動派為聯合國際法西斯反蘇戰線以準備在新戰爭中投機起見，特別派了親日派大漢奸張羣赴日，以謀建立一個反共產主義集團，由日本、中國、朝鮮三國的反動派在美國的幕後操縱下結成同盟，再拉攏緬甸，印尼的反動派加入，結成遠東的反蘇大包圍圈。事實上這個同盟的真正組織者乃是美國。並且這並不是甚麼中國對日政策，而是美國對華政策，這也不是國民黨成立的遠東同盟計劃，而是美國建立的類似西歐聯盟的計劃。但這些內外反動派還沒有來得及發動新的反蘇戰爭，就已經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趕出中國大陸了。

六　中蘇友好無敵於天下

一切帝國主義，不論美帝國主義或日本帝國主義的破壞中蘇友好的陰謀，最後都失敗了，以反蘇反共反人民起家而先後賣身投靠日、美帝國主義的蔣介石匪幫的一切陰謀也失敗了，並且被偉大的中國人民趕出了中國大陸。這是一切反對蘇聯、挑撥新戰爭、破壞世界和平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必然的下場。

日本帝國主義要想征服中國，離間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征服蘇聯，征服全世界，不惜以一切卑鄙無恥的手段來破壞中蘇邦交，以遂其侵略的目的。但是中蘇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是攻不破的，蘇聯對中國人民的忘我的友助也是任何破壞所不能阻撓的。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美國帝國主義隨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妄圖獨佔中國和發動反蘇侵略戰爭，並妄圖阻止中蘇人民的團結友好，對中蘇兩國的友好予以歪曲和污蔑，但是中蘇兩大民族七萬萬人口的大團結是牢不可破的，中蘇友好是無敵於天下的。這也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蘇兩國簽訂了劃時代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粉碎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阻撓中蘇友好的重重陰謀的中國人民，和偉大的蘇聯人民結成了最親密的，牢不可破的同盟。這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件大事震憾了世界帝國主義集團。當中蘇談判正在莫斯科舉行的時候，美帝國主義還想作最後的破壞。艾奇遜早在一月十二日就揑造說『蘇聯正在將中國北部地區實行合併』，合衆社竟公開宣稱『艾奇遜希望最後能離間北京與莫斯科』。另一方面美帝國主義還想抬出『門戶開放』的爛招牌來欺騙中國人民。但是美帝國主義的一切無恥陰謀仍然像過去一樣被澈底地粉碎了。

偉大的中國人民在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長期鬥爭中贏得了輝煌的勝利，在這個鬥爭中，中國人民和蘇聯人民結下了深厚的不朽的友誼，並且最終結成了無敵於天下的同盟，這是中蘇兩國人民共同的勝利。這個同盟鞏固了中國人民的勝利，鞏固了中蘇兩國人民深厚的不朽的友誼，並且也鞏固了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陣營。由於中蘇兩大民族兄弟同盟的存在，不但能擊潰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侵略陰謀，同時也能擊潰一切國際法西斯的反蘇陰謀！

附註：

(一) 華企雲：滿洲與蒙古，頁九九。
(二) В. П. Саввин: Взаимо Отношения и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стр.129
(三) 同上：стр.98
(四) Н. Рубинштейн: К истории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ои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51, И. 1,
(五) 學界代表興論的宣言，東方雜誌，二十一卷第九號。
(六) 俄大使問題與俄使館問題，東方雜誌二十一卷第十六號。
(七) 劉大年：美國侵華史，頁八三。
(八) В. П. Саввин 書，頁一四四——一四五。
(九)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頁三六三。
(十) 張友漁：「九一八」以來的日蘇關係，中蘇文化七卷三期。
(十一) 王中樞：張鼓峯事件爲瞰，頁二。
(十二) 劉大年：美國侵華史，頁一〇三。
(十三) 張西曼：歷史回憶，頁四二——四三。
(十四) 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ТОМ Ⅲ. стр. 594
(十五) 抗日戰爭中蘇聯給予中國的援助，新華日報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
(十六) 羊豫：中國抗戰與蘇聯，頁四四。
(十七) 張友漁：二十六年來的日蘇關係（國光出版社），頁九十。
(十八) 戴魏光：蘇聯參戰與日本接受波斯坦宣言，正義，第五期。
(十九) 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頁一五五。
(二十) 羊兵編：戰後蘇聯和平外交政策，頁一八九。

周代不是奴隸社會

王毓銓

一 問題

在我國古代史的研究上，當前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沒有問題的問題，一個是有問題的問題。大多數學者認爲商代是個奴隸社會，好像是沒有問題的了，其實未嘗不多少還有點問題，至少證據還不够。對於周代社會，有人說是個奴隸社會，有人說是個封建社會（農奴制度）㊀。表面上看來，意見不同，有問題，然而在實質上，這兩種說法所指的內容是沒有基本上的差異的；不同的地方怕只是個名詞。

主張周代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的理由不外是，一、周代的農業生產者耕種着貴族們的土地，向他們交納力役地租或實物地租（特別是晚周）；二、生產者遭受着超經濟的剝削；三、他們有自己的家庭財產和生產工具；四，他們附屬於土地，隨土地而轉移，因此也可以被賞賜或當作禮物贈送。

自然，對於這個說法，直接了當確鑿而不可疑的證據還沒有。但是，讀過周頌，大小雅，和國風裡關於農事或農民生活的詩的，留心過周代金文裡賜地賜人的記載的，考慮過孟子裡周代「徹田」的說法的，自然可以意味到上面所舉出的那四項特徵。然而，用幾乎同樣的材料，有的人就可以達到不同的結論。在周代封建論者看來「庶人」是農奴，而奴隸社會論者，特別是郭沫若先生，就肯定說他們是「奴隸」。同是豳風東山那四章詩，在我們看來好像是一個農奴（或自由民）從軍還鄉圖，而郭先生卻以爲那詩裡所描寫的是個「奴隸」㊁。看法不同，的確是很顯著的。

但是這個不同是屬於基本性的嗎？未必是。因此我們且不可把它過分地擴大了。爲什麼呢？因爲郭沫若先生雖然以爲周代的農業生產者是奴隸，但在他看來這些奴隸並不是通常所說的那典型的古代希臘或古代羅馬式的奴隸，而是一種特殊形態的奴隸。用他的話來說，一種「有充分的身體自由」的奴隸㊂。他把那些「有充分的身體自由」的奴隸比作古代斯巴達的「黑勞士」㊃。

這話就有意思了。把周代的「奴隸」不看作是正常的奴隸而比作斯巴達的「黑勞士」，就暴露了周代奴隸社會論者的弱點，同時也暴露了周代奴隸社會說和周代封建社會說的實質上的同一。爲說明這件事，我們首先必須把斯巴達的「黑勞士」弄清楚。

二 『黑勞士』

郭先生所說的「黑勞士」原是個希臘字。現在英法文寫作Helots，德文寫作Helote。俄文的寫法大概也是大同小異，變化只在語尾。沒有一個地方能寫作Helos，因此也不能讀作「黑勞士」。但郭先生的譯音，兼有黎民黔首勞動生產者的意味，所以不妨硬採取了它，以求一致。

這個名詞的來源，直到現在還是不能確定。我們只知道它原來是古代拉康尼亞國（Laconia）㊄被統治的生產者的一個名稱㊅。可巧在拉康尼亞有個城市叫黑婁司 Helos，因此一般老史學家以爲那個名詞是從這個城名演變來的。依照那般老史學家的意見，「黑勞士」就原是黑婁司城的居民。這個解釋有人說是絕不可靠㊆，但有人說也有對的可能㊇。就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屬於「黑勞士」的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斯巴達人未佔領拉康尼亞以前那個城市國家裡的生產者（類似農奴），一部分是斯巴達人征服了邁森尼亞國（Messenia）以後在邁森尼亞的不自由的生產者㊈。斯巴達人征服拉康尼亞大概在紀元前第十一世紀初年，征服邁森尼亞在紀元前第七世紀的下半期。古司塔夫・基爾波提是一位有名的古代雅典和斯巴達的政治制度史學家。據他估計，「黑勞士」的數目是相當多的，雖然確定的數目不知道。他說他們的地位是在自由民與奴隸之間㊉。斯巴達人征服拉康尼亞和邁森尼亞以後，把這兩國的居民變成了他們的臣屬。斯巴達的國王把這兩國的土地分給了斯巴達人（特別是那些貴族們）

同時也把那些被征服的居民——「黑勞士」——分給了那些土地所有者去給他們耕種土地，好使斯巴達人完全脫離生產專從事統治和軍事工作。從古代斯巴達社會的生產關係上看來，我們可以看出「黑勞士」有下列這幾個特點[十一]：

第一，「黑勞士」是斯巴達用武力征服了的人。他們是斯巴達國家的臣民，而不屬於直接役使他們的斯巴達人和貴族。

第二，他們居住在他們主人的土地上，為他們的主人耕種土地。但他們的主人沒有權力使他們脫離土地出賣他們，也沒有權力解放他們。

第三，「黑勞士」每年須向他們所服役的主人交納一定的年租。一個中級莊園的年租是八十二 Medimnoi（量名）的麥子，等於全部生產物的一半。此外並須貢獻一定數量的油和酒（有人說是酒和水果）。但他們的主人不得加租。

第四，除年租和貢獻以外，剩餘下來的生產物屬於「黑勞士」他們自已。因此，「黑勞士」可能保有財產。

第五，對國家——斯巴達人統治階級的國家，「黑勞士」有當兵的義務。服役有功，可被解放為自由民。

在這種生產關係上出現的「黑勞士」是不是奴隸呢？這是值得我們考慮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資產階級的學者曾研究過這個問題的，都把他們看作是農奴（Serfs）。如十九世紀末年德國史學家基爾波提（A. Gilbert），和當代英國希臘史專家畢瑞（J. B. Burg）。用唯物史觀的方法專門研究希臘或斯巴達的著作，我還沒有看到一本[十二]。蘇聯史學家所作的世界史教科書常是把「黑勞士」叫作奴隸。約翰·莫里司（John Mauric）是一位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史學家，在一九四八年他發表了一篇文章，題叫「奴隸與農奴」（Slaves and Serfs），他認為「黑勞士」是「一種農奴制而不是奴隸制」。[十三]唯物史觀的學者和資產階級學者的看法不同是可以理解的，為什麼同樣用唯物史觀的方法研究歷史的學者的說法又不同呢？（編者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應該是一致的。）

三　怎樣分別奴隸和農奴？

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對於分別奴隸和農奴，必須找出一個科學的標準。這個標準，從廣義上說，是，什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在十批判書裡，郭沫若先生給封建社會下了這麼一個定義：[十四]

現代的封建社會是由奴隸社會蛻化出來的階段。生產者已經不再是奴隸，而是被解放了的工農，重要生產工具，以農業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歸為私有，而有剝削者的地主階層出現，在工商方面則是脫離了官家的豢養，而成立了行幫企業。建立在這階層上面的國家是靠着地主和工商業者所獻納的稅收所維持着的。這是我們現代所說的封建社會。

郭先生的這個定義不十分正確，好像是有所為而定的。由於歷史上各種不同的因素，世界上有些民族的封建社會不是從一個單純的奴隸社會蛻化出來的。土地私有早就是希臘羅馬奴隸社會的財產所有形態，也不是封建社會的特徵。希臘羅馬的工商業半多是私營的，不一定就是官家的豢養。而且行幫企業羅馬帝國時代就有這種組織，不一定要等到中世紀。在封建社會裡地主工商業者雖然在經濟上對封建國家也有所「獻納」，但這部分獻納在總獻納的百分比上，數目恐怕並不甚大；封建國家的基本收入怕直接地或間接地還是從一般農民身上剝來的。稅收之外還有無償的徭役，這也是封建國家存在不可缺的條件，至少在中國封建時代是如此。我們絕對不能因為郭先生說封建社會裡的生產者是「工農」，便以為他重「工」不重「農」，或者是「工農」並重，但「工農」之上不加任何形容詞，怕容易使人誤會。

總而言之，郭先生對「我們現代所說的封建社會」的解釋怕不很明確，也不很中肯，因此我們還得到別處去尋求劃分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奴隸或農奴、的標準。這個標準可以用馬克思和斯大林的話把它建立起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裡說[十五]：

在（封建）力役裡，工作者為自已的勞動，和他為他的主人的強制勞動，在地點和時間上是分開的，非常分明。在奴隸勞動裡，即使是奴隸為補上他自已生存資料價值的那部分工作日，因此事實上他只為他自己而工作，也呈現着是為他的主人的勞動。奴隸的一切勞動都呈現着是無償的勞動。

照馬克思的話說來，封建力役制度下的農奴所不同於奴隸的，是在奴隸的一切勞動是為的他的主人。而農奴為自已和為他主人的勞動無論在時間或地點上都是分開的。如果使這話更具體些，便是，奴隸全為主人所有，他的一切勞動（甚至是為維持自已生活的那一部分）是為他的主人，而自已所受的只是牲

畜的待遇。農奴呢？依馬克思所熟悉的西歐情形來說，農奴耕種地主給他的土地，他得以力役地租形式去耕種地主的花園。這樣，爲自己爲地主那兩種勞動便分開了。把馬克思的話引申一下，以實物地租來實現農奴對地主的義務的形式之下，農奴爲自己的勞動和爲他主人的勞動也是可以分開的。

在馬列主義的文獻裡，分別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奴隸和農奴，最明晰最扼要最中肯的，要推斯大林的話了。斯大林在他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裡說：

在奴隸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奴隸主佔有生產資料和佔有生產工作者，生產工作者便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奴隸。

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封建主佔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佔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封建主雖已不能屠殺，但仍可以買賣的農奴。

依據馬克思和斯大林的話來觀察「黑勞士」，我們對於這種不自由的勞動生產者就可以得出下邊這幾個結論。

第一、「黑勞士」不是奴隸，因爲他爲自己的勞動和爲他主人的勞動是可以分開的。他拿出他的勞動生產物的一半獻給他的主人作地租，留下其他一半作爲自己勞動再生產的資料。自然，封建的超經濟的剝削，「黑勞士」也是不能倖免的，所以他們也得隨年租交納一定數量的油和酒獻給他們的主人。

第二、「黑勞士」交納的年租，主人不能隨意增加（斯巴達政府是否可令增加，無記載）。因爲這個緣故，非爾波提以爲「黑勞士」對斯巴達人的隸屬是建立在「一定的原則」之上的[十六]而格倫尼支則以爲「黑勞士」的情況呈現着「斯巴達人和被征服的一個國家間締結了一個盟約的一些痕跡」[十七]。證據便是「黑勞士」對主人的隸屬關係和獻納義務，而這些義務有限制，而且不是可以隨便增加的。

第三、「黑勞士」雖然附屬於土地之上爲他們的主人服役，但他們的主人無權出賣他們。換句話說，直接役使「黑勞士」的斯巴達人不能完全佔有他們：「黑勞士」不是奴隸，不是牲畜。

有人或者要問，「黑勞士」不是直接役使他們的斯巴達人的私奴隸，那他們是不是斯巴達國家的奴隸呢？不是有人說西周時代那些被征服的殷民就變成了周人國家的奴隸了嗎？

這個問題可以回答，也好像用不着回答。可以回答處是：我們分析某一社會裡的生產者的性質的時候，一定要根據他們在那個社會的具體生產關係裡所佔的地位。享有土地的斯巴達人，對於「黑勞士」的役使和剝削是現實的，而那種役使和剝削又是那麼具體。這個具體的現實，便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我們以爲這個問題好像用不着回答處是：一個征服者對一個被征服國家的人民是操着生殺予奪之權的。即使法令上或盟約上沒有這種規定，而事實上還是可以這樣作的。斯巴達政府對亡了國的「黑勞士」自然可以加以罪名，任意殺戮，甚至解放了的「黑勞士」不是也還遭受了殺戮的嗎？在中國，在封建時代，甚至在半封建時代，專制的皇帝和蔣介石，地方的豪紳和惡霸地主，不是也可以找個理由或沒有理由，便殺人的嗎？「黑勞士」從淪爲斯巴達人的臣屬那一天起，就懷恨斯巴達人。因此一有機會，便羣起反抗。斯巴達的統治者因此也憂恐不安，時時提防。到後來還組織了一種特務警察，專門來對付他們。

四　周代生產者是一種農奴

話說到這裡，我們該回轉到本題上來了。

郭沫若先生學識淵博，對唯物史觀的方法修養很深，這是人人都承認的。因此他雖然主張周代（更嚴格地說，西周）是個奴隸社會。但並不像別人硬把周代的社會比作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他更深一層地瞭解了周代社會的具體情況，發現了周代的（殷代的也如此吧？）「奴隸」是「有充分的身體自由」的；好像斯巴達的「黑勞士」。我們完全同意郭先生這一比喻，而且我們認爲這個比喻還相當妥當。所不同的，就是解釋；我們看來，斯巴達的「黑勞士」和周代的生產者，都是農役的一種。他們兩者有下列相同的地方：

（一）兩者都是被征服的民族，被壓迫被剝削向統治者服役而從事農業或其他部門的生產事務。（西周時代的主要生產者，還是舊時殷人統治之下的那些不自由的生產者。）

（二）兩者都是連同土地而被分配出去的，因此也牢固在土地之上。

（三）「黑勞士」所交納的是實物地租，而西周生產者所交納的是力役地租（晚周實物地租也普遍化了）。兩者形式雖不同，但生產者爲自己的勞動和爲主人的勞動都是可以分開的。（西周力役地租表現在「徹田」，「公田」「私田」的制度上。）

（四）兩者都遭受着超經濟的剝削（周代的超經濟剝削散見於國風詩裡）。

（五）斯巴達人不能殺死或出賣「黑勞士」，西周王家貴族可以轉讓生產者，隨便殺死之事還沒有證據（從事農業生產者農奴不可和家內奴隸或手工作坊裡的奴隸相混，奴隸自可隨便殺死。）

（六）「黑勞士」和「庶民」都不屬於直接役使他們的貴族們，而是屬於國家的。

因此，我們說，「黑勞士」是斯巴達式的農奴，周代的「黎民」，「庶民」，「隸農」，是中國式的農奴。

五　幾點說明

郭沫若先生說，「農業生產奴隸和手工業的生產奴隸或商業奴隸，性質不盡同……注重手工業和商業的雅典，奴隸是無身體自由的，而注意農業的斯巴達，他的農耕者黑勞士……便有充分的身體自由」。(十八)這說法，我們不十分贊同。奴隸自是奴隸，「性質」是相同的。不信，可拿前邊所引馬克思和斯大林的話去測量。雅典和斯巴達的生產者不同，是因爲雅典的是奴隸，而斯巴達的是農奴，沒有旁的原因。如果說農業奴隸有充分的身體自由，請看典型的羅馬的奴隸。羅馬的奴隸絕大多數從事農耕，白天在田裡工作有的還帶着鍊子，夜裡鎖在牢獄式的地下室裡。皮鞭抽打，一如牲畜。比起雅典的奴隸，他們更沒有自由。

「黑勞士」這種形態的生產者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值得大家鄭重考慮。不只周代的生產者和他們相似，就是和他們同時的塞撒里(Thessaly 在斯巴達東北)的生產者，和古代米索波坦米亞、波斯的生產者，古代埃及的生產者，都大致相同，有的甚至一樣。馬克思所說的「東方的」，「貢獻」制的剝削形式，就是指的這些生產者。他們是一種農奴。

我們雖然說周代的生產者是農奴，周代是個封建社會，這不是說我們否認或小視了那時奴隸成分的存在。相反地，我們也認爲那時有大量奴隸，但他們不是主要生產者，因此，在決定西周的社會性質上，也起不了主要的作用。

一九五〇·六·一〇

附註：

(一)此外還有周代氏族社會說，古典的希臘奴隸社會說，意見非常錯誤，在這裡就不提了。

(二)古代社會研究，一九五〇年，一六六—七頁。

(三)十批判書，一九五〇年，三九頁。

(四)全上。

(五)那個地域現在還叫拉康尼亞，在今希臘派婁剖尼司半島的東部。

(六)基爾波提Gustav Gillert: The Constitutional Antiquties of Sparta and Athens, London, 1895, P. 300（此書原爲德文）

(七)基爾波提就如此說法。全上。

(八)格倫尼支（H. J. Greenidge）就如此說。見其所著A Handbook of Greek Constitutional History, London, 1896, P.83—84。

(九)邁森尼亞和拉康尼亞境界相連，而在後者的西邊。

(十)前引基爾波提，三〇—三一頁。

(一一)看前引基爾波提，三〇—三二頁，前引格倫尼支，三八—八四頁，和畢瑞（J. B. Bury）所著希臘史（A Histosy of Greece），現代叢書（Modern Library）本，一二四頁。

(一二)湯姆生（George Lhomson)的古代希臘社會研究（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於一九四九年在倫敦出版。這部書是用唯物史觀的方法寫的。但這書所討論的只限史前的希臘，和我們討論的題目無關。

(一三)現代季刊（Modern Quarterly），三卷（一九四七—四八），四九頁。

(一四)一九五〇年，一五頁。

(一五)馬克思這幾句話是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九章裡。我所用的是英文現代叢書本，五九一頁。譯文生硬，自己也不滿意。

(一六)前引書，三〇頁。

(一七)前引書，八五頁。

(一八)十批判書，三八—三九頁。

關於奴隸與農奴的糾葛

郭沫若

一　『黑勞士』可以屠殺

王毓銓先生的『周代不是奴隸社會』，主要是在駁斥我的說法。他似乎還不曾看到我的『關於周代社會的商討』。但王先生這篇文章對我是有好處的，多謝他把斯巴達的農業奴隸『黑勞士』的性質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些出來，因爲它和周代農民的相似，這正是我想更多地知道一點的東西。

『黑勞士』頗類似農奴，但是，是可以任意屠殺的。王先生的文章裡面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斯巴達政府對於亡了國的「黑勞士」自然可以加以罪名，任意殺戮，甚至解放了的「黑勞士」也還遭受了殺戮。』

這就證明『蘇聯學者所作的世界史教科書常是把「黑勞士」叫作奴隸』，是有根據的。

但王先生卻信從『資產階級的學者』和『一位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史學家——約翰·莫里司』（註一）的說法——『黑勞士』是農奴，因而把這可以殺戮的一項重要性質加以開脫而這樣說：

『在中國，在封建時代，甚至半封建時代，專制的皇帝和蔣介石，地方的豪紳和惡霸地主，不是也可以找個理由或沒有理由，隨便殺人的嗎？』

用這樣的理由來否定『黑勞士』可以殺戮的性質，是不妥當的。假使這樣的邏輯可以成立，任何類型的奴隸的特徵都可以用這同樣的理由來否定了。『專制的皇帝』、『蔣介石』、『地方的豪紳』、『惡霸地主』，這些東西的任意殺人是後期歷史階段中的變例，這是不能拿來與古代社會的通例等量齊觀的。譬如人有尾巴骨比較發達而有尾痕表露到外部的，我們能以這爲例，而說長尾猿也是人麼？

『黑勞士』如果說是『農奴』，那末斯巴達的社會是封建社會了。這問題倒相當嚴重。同屬於古代社會的希臘的雅典與斯巴達，一個是奴隸社會，一個是封建社會；而同屬於古代社會比較晚些的羅馬又是奴隸社會；那末馬克思認爲古代社會即是奴隸社會及其所建立的社會發展史的程序，豈不會完全破產了嗎？

奴隸與農奴之分，斯大林的說法，的確是『最明晰、最扼要、最中肯』，但我還要加上一個『最』——是最有分寸。

『在奴隸佔有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奴隸主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一樣來買賣屠殺的奴隸』。

『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封建主對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不完全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經不能屠殺，但可以買賣的農奴。』（據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一九四一年版『列寧主義問題』第六二九頁。）

王先生（其他的先生們也同樣）從這裡看到了有『能屠殺』與『不能屠殺』的不同，但卻看脫了另外一點重要的區別，便是同一能『買賣』，而在一邊是『當作牲畜』，一邊不是。這就是我所注意到的斯大林的說法是最有分寸的地方。

這是常識問題。可以『買賣』的商品多得很，有價值高的，有價值低的。譬如有價值五十億人民幣的轟炸機，也有價值五百元人民幣的兒童玩具的紙飛機，我們總不能說轟炸機和紙飛機是同等的東西吧？但遺憾的是王先生和『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史學家』卻和『資產階級的學者』們一樣把『黑勞士』與農奴同等看待了。

以上是關於『黑勞士』，我就只想說這一點。我對於希臘沒有研究，不能多說話，希望有專門研究的人，而且最好是直接就希臘原資料去研究，沒有經

過轉手的，能够提供些具體的資料出來。

二　周代的農民也可以屠殺

至於周代，農民是不是可以任意屠殺呢？是可以任意屠殺的——特別是周初。周書裡面便有證據：

『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告訴你們這些殷國的漢子，我現在不殺你們。……你們如果聽話，天老爺會可憐你們。你們如果不聽話，你們不僅不能再耕作下去，我還要替天行道，斫你們的腦袋子。）——引自『多士篇』。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哀）。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酖）於正。我惟時（是）其教告之，我惟時（是）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你們現在還住着你們住的房子，耕着你們所耕的田地，你們爲什麼還不感恩懷德？你們公然老是在鬧亂子，心還沒有死。你們不信從天老爺的指示，竟胆敢藐視它，做些不法的行爲，企圖破壞。我要經常警告你們，我要經常鎭壓你們，把你們抓來關起。一次不聽，幹兩次。兩次不聽，幹三次。要是你們有的還不服從我給你們的命令，那我就要大大的屠殺！不是我周家不講人情，是你們自己作孽，想早死。）——引自『多方篇』。

請看這些在耕田棟土的『殷士』是不是可以屠殺的呢？周家之所以不屠殺他們，口頭上是說給予他們以天大恩惠，事實上是要留着他們勞動以供榨取，並不是法律上有了限制或條約上有了規定：不能殺他們，不准殺他們。所以只要他們不聽話，那就要大殺而特殺了。其實就是牛馬吧，雖然可以任意屠殺，但有牛馬者誰又肯任意屠殺呢？除非有更大的祈求，犧牲了一匹牛馬，而可以有更大的收回時，那就不會愛惜了。在這兒可以順便請周代封建社會說者注意：周代還是有殺殉制的，而且在春秋年間都還在用人爲祭牲。（註二）

以上是周家對殷人所說的話，對於周人自己呢也在這樣說：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如果有人來報告，「有一大堆人在喝酒」，你不要放鬆！通統給我捉回來，我要斫他們的腦袋子！）——引自『酒誥篇』。

這『羣飲』的『羣』雖然沒有明言是農夫，但在周初文王都還親自耕田看牛羊（註三），酒誥裡周公教康叔也要他『純其藝黍稷』，足見這些人也還是農夫。即使是兵吧，在古工農兵是不分質的，即所謂『寓兵於農』。有事時被堅執銳是兵，無事時耕田種地便是農。只要飲一下酒便要殺，足見這些人的身份究竟是什麼了。

孟子書裡面有這樣一段故事：

『鄒與魯鬨（局部衝突）。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恨）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將近）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要鄒穆公行『仁政』，即是說要把人當成人。以前所行的呢是不仁之政，便是不把人當成人。年辰壞的時候，老百姓餓死多少，逃跑多少，是不算數的。年辰好的時候呢是拚命榨取。那時要打死幾個，殺死幾個，當然也不算數。請看這位鄒穆公問話的口氣吧。他不是問的他的『民』「殺不該殺，而是愁的『殺不完，怎麼辦』？戰國時代都已經將近中葉了，在鄒國這樣的小國（等於今天一個縣吧），『民』的身分都還是這樣！這能說是『不能屠殺』的農奴嗎？當然，奴隸統治從這故事裡看來也是很鬆弛了。這正是歷史發展的成果。

三　『當作牲畜來買賣』

再說到買賣。周代的人民是可以買賣的，而且同牛馬一樣買賣。周禮地官質人有左列的職掌：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請注意序次是由賤而貴。）

周禮雖然是有問題的書，但那問題是在劉歆把一些後代的成份和自己的意識滲雜進了大量的原始資料裡面而加以改編（註四）。質人這項資料，我認爲就是原始資料。即使是後代成份吧，也好，因爲後代如果都還是這樣，周代也就可想而知了。根據漢書王莽傳，秦代是有這同樣的情形的：

『秦爲無道，……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闌），制於民臣，顓

（專）斷其命』。

這就剛剛符合於斯大林所說的『當作牲畜一樣來買賣屠殺』。秦代都還是這樣，周代不是可想而知嗎？西周不是更可想而知嗎？

西周孝王時的一個青銅器『舀鼎』，我眞不知道引用過多少次，但周代封建社會說者都始終不加理會。那裡敘到人口販賣，實物交易時五個人抵『一匹馬加一束絲』，用雜貨幣交易時一個人僅值二十鋝，合五銖錢四十六文。

這表明人價多賤！人價既賤於馬價，僅及五分之一的光景，馬都可以任意屠殺，難道這更賤的人還不可以任意屠殺嗎？

漢朝的人價也依然賤於馬價。史記貨殖列傳裡有些資料：

『……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此亦比千乘之家』。

『僮』是秦漢時代的奴隸名稱，以『手指』計算很有意思。司馬駰引漢書音義云『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一人兩手共十指，『手指千』便是一百個人。一牛四足，『千足』便是二百五十條牛。『馬蹄躈千』的意思不大好解，舊時有兩種解法。司馬貞『索隱』引：

『小顏云：躈，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二百匹。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躈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躈謂九竅，通四三而成一馬（此句原文如此，似有脫誤），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註五）。』

這位顧胤要比小顏細心得多。所謂『上文』是貨殖列傳的『上文』，有著另一項的比例：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馬二百蹄』與『牛蹄角千』、『千足羊』、『千足彘』是等價的東西。即是五十匹馬等於一百六十六條牛（強），等於二百五十條羊，等於二百五十條猪。有這些資產中的任一項的有產者，他的收入是等於一位千戶侯（食俸一千家的侯爵）的收入。（從這裡可以看出有馬一匹等於食俸二十戶；那些有產者就是所謂『素封之家』，沒有封侯也等於封侯。）綜合兩項比例，可知二百五十條牛略等於七十六匹馬（弱）。『馬蹄躈千』既與二百五十條牛相等，故必須是四蹄加九竅爲十三，以十三除千，才等於七十六（強）。小顏是錯了。顧胤有見及此，是他的心細而且聰明處。那末一個人的價值是等於二匹牛，〇•七六匹馬。即是一個人抵不上一匹馬，要三個人才與兩匹馬約略相等。

『羊彘千雙』，照兩項比例算來都算不出個所以然，大概是有錯字，因無關宏旨，在這裡也就不必多作糾纏了。

漢朝的奴隸價格都還不及馬價貴，無怪乎漢朝有奴隸的人也就有『專殺之威』了（見漢書食貨志董仲舒疏）。

在漢朝開始正式禁止奴隸販賣的是王莽，而開始正式廢除專殺之威的是漢光武劉秀。他們兩人的號召都是根據孝經上孔子的一句話『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值得注意的。

『姦虐之民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背）天倫，繆（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王莽傳，始建國元年—公元九年）

『（建武）十二年（公元三六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後漢書、光武帝紀）

這兩位先生，王莽與劉秀，大抵是在漢代把奴隸制的殘餘，基本上根斷了的人。但王莽還不大澈底，他廢止了一下奴隸買賣，不久又恢復了（『後三歲，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買賣』），而且變本加厲。（註六）結果王莽終因農民暴動而垮台，劉秀卻因緣時會而成爲一個時代的革新者了（註七）。

認眞說，如果把西漢作爲奴隸制的末期（有的朋友是這樣主張），那比起把西周作爲封建制的初期來，倒還要更有根據一點。

但我是把西漢定爲封建制的初期的。因爲從全面來看問題時，這樣要妥當一點。秦漢的『僮』大抵是用於工商業的（註八），在封建制度下的主要生產，特別在我們中國，事實上卻是農業。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自春秋中葉以後，不平衡地，波動地，逐漸地在轉變，由完全爲人所有的地位轉變爲不完全的爲人所有。故我們可以說，漢代的主要的生產方式已經不是奴隸生產了。

再從意識形態上來說，西漢初年崇尚黃老，黃老學說事實上就是自足自滿的小地主階級的思想。到了漢武帝則尊孔子，崇六經，才把大地主階級的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搬上廟堂，社會不僅在基礎上起了變化，連上層建築都全然改觀了。

社會歷史由前一階段進展到後一階段，絕不是刀切斧斷的，特別在過渡時期，它總不免有一些矛盾的錯綜。要緊的是要掌握著那確切的生產主流的方

式，不能看見一隻燕子飛來了，便以爲天下都是春天，或偶爾有一隻燕子被人關在籠子裡過冬，便以爲秋天始終沒有到來。

四　從發展上來看問題

王先生的文章寫得很輕鬆而帶些譏刺，他以爲周代是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之爭，『不同的地方怕只是個名詞』。但在我看來，問題倒並不是那麼輕鬆的，不是什麼個把名詞的不同。周代究竟是封建社會還是奴隸社會，實在還須得費點工夫來研究。我固然『特別』得一點，但要進行中國古代史料的蒐集、批判和解釋，從而引導出結論來，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抑不是株守成說，以一個『自然』的字面便可以輕鬆地了結的。

周代社會裏面有沒有農奴成份呢？有。正是這種成份的出現而且逐漸發展，所以才使周代社會到後來起了質變。那起初就是一些得到王長者賜人賜地的大小臣工，就和彝族社會的管家娃子（或稱『百姓娃子』）那樣。那種人有了一定量的土地而且可以有一定量的奴隸。它自已可以參加生產，也可以專靠奴隸來生產。這種奴隸的奴隸是所謂『役人之役』，在彝族社會裡面是所謂『三灘娃子』，也就是娃子的娃子。靠着榨取奴隸的剩餘勞動，榨取一個人是可以養活幾個人的，所謂『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禮記王制），便是證據。這裡當然也要看土地的肥瘠、工具的利鈍、種籽的良莠，肥料的多寡、天時的好壞等等條件而定，但一個人的生產量是可以供養好幾個人的。因此，我們在研究古代社會制度上，在査成分的時候，這層關係也須得注意。即使是農奴性質的成分好像比較多，而這些農奴成分假如專靠着『三灘娃子』在生產的話，那怕這些農奴成分的家裡都有九個人，而所使用的『三灘娃子』都只有一個人，這也依然是奴隸生產。周詩裡面所表現的情形有好些就是這樣。例如七月篇裡的左列幾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工。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這開頭兩句的兩個『我』字，便是類似農奴身分的人，那『農夫』在這兒就是『三灘娃子』。它並不是在說：『啊，我們農夫們，我們的收成完畢了』，而是在說：『啊，我的農夫們，我的收成完畢了』。因爲下文有兩個『爾』字（你們），那就指的是農夫們了。

社會是在發展的，社會的成分也是在發展的，而發展的原因當然也就是由於有內部矛盾的階級鬥爭。周代的一部發展史，明白地表示着：天子倒楣了，一部分的諸侯起來；諸侯倒楣了，一部分的卿大夫起來；卿大夫倒楣了，一部分的陪臣起來；陪臣起來了，難道他們的娃子不會跟着一道提高其身份嗎？而且在這上下層鬥爭之間，下層的新興勢力是經常採用着各種優遇的條件來爭取人民的。有名的陳成子用大量貸出而以小量收入，把齊國公室的人民爭取過去了（見左傳昭公三年），終於奪取了齊國的統治權，這個故事我在『十批判書』裡面已經提到過（見當版本第六十五頁），這裡不再重複。這裡且從淮南子人間訓中徵引關於白公勝的一段故事，也可以補充我在『十批判書』中論白公勝處的缺漏（見第八十一頁）。

『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鍵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納），而（爾）乃論之，似不宜也。」

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

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西（註九），司馬子期。』

這位白公勝和世俗相反地使用着大斗小稱，同陳成子一樣，目的不用說也就在爭取人民。可惜白公勝是功到垂成而失敗了。不然，楚國的公室，也就會如齊國的換姓、晉國的三分，發生了變革的。在階級鬥爭當中，新興的勢力在盡力爭取人民，而從人民方面來說，也就是參加了革命。這樣人民自然也就得到了解放的機會而在秦漢之際終於起了質變。但這些情形在春秋末年以前是沒有的。這正是歷史發展的成果，我們不能把它倒懸過來。

我覺得王先生似乎也不大習慣於從發展上來看問題。例如他說：我『發現了周代的「奴隸」是「有充分的身體自由」的』，而在『周代的』下邊加上一個括弧括着『殷代的也如此吧？』又例如他說：『周代的農業生產者耕種着貴族們的土地，向他們交納力役地租或實物地租』，而在下邊也加上一個括弧括着『特別是晚周』。周初至晚周有八百年，再加上殷代有一千多年了。這一千多年的歷史發展究竟跑到那兒去了呢？我還是要重複一遍在『關於周代社會的商討』裡說過的一句話：

『我們是以辯證唯物主義來研究歷史的人，要從全面來看問題，從發展來看問題，才能够得到正當的結論。』

（一九五一年七月八日）

（註一）這位英國學者，他的底細我不十分清楚。我希望王先生或其它的朋友們詳細地調查一下，僅僅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還不好絕對信賴。譬如我們中國也有不少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就不能保證每一個人的說法都絕對可靠。

（註二）左傳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註三）尙書無逸篇『文王卑服，卽康（糠）功田功』，又楚辭天問篇『伯昌何衰？秉鞭作牧。』

（註四）關於周禮，我曾經寫過一篇『周官質疑』（收在『金文叢考』裡面），可供參考。

（註五）『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亦十有三』，是老子道德經裡面的話。顧胤這人也有點迂腐，他發覺了四蹄加九竅而爲十三這個數目，卻要引一句老子的話來作佐證，未免有點滑稽。

（註六）王莽的『德政』可參看漢書食貨志及王莽傳，現在舉兩條在下邊，都是在始建國元年禁止買賣奴婢之後的事。

（1）『私鑄作泉布（泉布卽貨幣）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反對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兪衆，及伍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食貨志，天鳳年間）

（2）『關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王莽傳，地皇二年）

（註七）劉秀的革新措施可參考後漢書、光武帝紀，現在也摘錄幾條在後邊：

（1）建武六年十一月丁卯詔：『王莽時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

（2）七年五月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留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3）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已見前。

（4）同年八月癸亥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民』。

（5）同年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6）十二年三月癸酉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人』。

（7）十三年十二月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人，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

（註八）秦呂不韋有家僮萬人，係用以經營貿易。漢、西蜀的卓氏有僮千人，程鄭數百人，皆用以鑄鐵。又漢書張安世傳，言『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維，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霍光）。』

（註九）原書誤作『令尹子椒』，今據左傳等書改正。子椒係楚懷王時令尹，與時代不符。淮南子書中，像這樣錯誤的地方頗多，足見當時著書的人不很謹嚴。書中也有妄作聰明而鬧出笑話的例子。例如『氾論訓』裡面有『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的一句話，這本來是襲用韓非子難一篇的『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但韓非子的『樓翟』是樓鼻與翟強二人的略稱，故稱『兩用』，事詳戰國策魏策三。那時候在魏是襄王，在秦是武王，後於吳起之死已七十多年。淮南門下的『學者』妄作聰明，誤以『樓翟』爲一人，又看到有『亡西河』事便把吳起加進去，這樣簡直是大鬧笑話了。因此，我聯想到我們引用並非絕對權威的外國學者的著作時，也應該有特別愼重的必要。我們要對讀者負責：沒有作過縝密的檢查，不好就抱着一個絕對信仰的態度。

補記：『黑勞士』與莫里司

王毓銓先生提出了『一位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史學家，約翰·莫里司』主張斯巴達的『黑勞士』是農奴，不是奴隸的說法，我有點詫異，曾經向陶孟和先生請教；承蒙陶先生的協助，算把這個問題弄出了一個眉目。

陶先生是託中國科學院社會研究所的汪敬虞先生查考。汪先生經過查考之後，仍同意『黑勞士』是奴隸。汪先生所查考的結果，我把它抄錄在下邊：

『Helots（「黑勞士」）是希臘奴隸的一種，這種奴隸有下列幾點特徵：

一、他們原來是聚居在一處的氏族（Helots的名稱是由於在Laconia有一個地方叫Helos而來），由於斯巴達的征服，全體降爲奴隸。

二、他們不屬於奴隸主個人，而屬於奴隸主全體（States Slaves）。因爲不屬於個人，所以個別奴隸主不能自由處置他們（如殺、賣等）

，但在戰爭時他們就被勒令充當戰卒與奴隸主的衞士。

三、他們不是家內奴隸，而主要是生產奴隸。他們附着於個別奴隸主的土地上從事耕種，向奴隸主繳納一定的土地生產物。

因爲個別奴隸主不能自由買賣或殺戮他們，因爲他們是附着於土地、向奴隸主繳納一定的土地生產物，所以被誤認爲農奴。這是不妥當的。其實他們是奴隸主整個階級的財產，他們的生殺大權是握在整個奴隸主階級的手中。Ephors『埃弗爾司』（奴隸主統治的一種機構）可以隨時殺死他們，勒令他們充當戰卒。他們雖附着於土地，但並不佔有生產工具。這和農奴基本上是有區別的。

在西洋古代奴隸社會中，和斯巴達的 Helots（「黑勞士」）形態相似的，有Thessaly（塞沙里）的Penestate（「不納斯它德」），Sicily（西西里）的 Cyllyrii（「西里黎」）Crete（克雷特）的 Clarotaye（「克拉羅提」），以及 Heraclea（赫拉克列亞）的 Mariandyni（「馬良迭尼」）等。』

以上論點，汪先生主要是根據大英百科全書及劍橋大學的『古代史』。至於莫里司的論文『奴隸與農奴』（『現代季刊』三卷三號，一九四八年夏），其中爲王先生所根據的，也只有左列一兩句：

『奴隸生產在希臘是並不普遍的。在斯巴達、塞沙里、克雷特和許多其他地區，統治階級從臣服的異域人民的强迫勞動中抽歛財富，那些人民是有小塊土地自耕而食的，與其說是奴隸制，無寧是農奴制的形態』。

這位莫里司先生是一位中學教員，他的這篇文章，我讀了一遍，是很成問題的東西。他一開始就把斯大林的話作爲疑問的對象：

『人類社會是怎樣發展的那個最簡單最出名的公式，在斯大林的「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裡面可以找到：歷史上既知的生產關係的五種主要型式，原始共產、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作者說，一般的經驗告訴我們：要說明怎樣由奴隸制轉化爲封建制，比說明封建制轉化爲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轉化爲社會主義，還要困難。這個問題，還在迷霧中，沒有闡明。

但作者是不是闡明了呢？不！他的目的並不是在闡明，而是在想取消這種分別。他說：『馬克思的各種公式是不一定正確的』。因此他引用了一些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來想証明馬克思的見解本沒有十分確定，又把希臘羅馬的歷史作了一番概述，也沒有把奴隸和農奴之分說出一個所以然，而只輕鬆地說『穀物耕種用奴隸是沒有成功的』，而穀物耕種又是古代社會的主要生產，言外之意就是否認奴隸社會的存在。

最有趣味的是，他說『馬克思是把階級社會的時期作爲一個整體的單一的時代來看的。階級社會在他的意思是文明而有歷史的介於野蠻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時期』。這樣一來就顯得在這個時期中再來分劃階段是多事的。頂多只好像馬克思那樣把這『六千年』的長時期分爲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階段。（其實這只是在行文的便利上這樣簡化了的，五階段是馬克思自己的明確劃分，在此不必縷述。）

文章是寫得含含混混的，主要的目的是想拿馬克思和恩格斯來打斯大林，更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歷史發展還原成一片渾沌。這是一篇非馬克思主義乃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雖然也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的話，那正是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王毓銓先生把這樣的文章拿來作爲自己立說的根據，恐怕並沒有仔細地把文章的內容檢點清楚吧？王先生在發出疑問：爲什麼同是馬克思主義者而見解不同？這是很尋常的事。有眞的馬克思主義者，有假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眞的之中也有半瓶水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從本質上來看問題，問題是很多的，問題的『有問題』與『沒有問題』也會恰得其反。

我要引毛主席『改造我們的學習』裡的一句話來請大家（包含我國的學者在內）注意：

『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七月十四日）

訂　正

本刊上期「關於周代社會的商討」一文，第三十三頁上欄第二十一行「稻草人」應爲「茅草人」。第三十四頁上欄第十六行「曾孫乘止」應爲「曾孫來止」。又，第三十七頁下欄末尾「補註」中「據西京雜記卷六」應爲「據西京雜記卷下」。特此訂正。

從「義田」看蘇南農村的封建勢力

潘光旦
全慰天

一

蘇南農村的封建勢力有不少的特點，我們已經介紹了不止一個（『蘇南封建勢力的幾個特點』，五月二十五日，新察觀二卷十期；『蘇南農村兩種租佃制度的分析』，六月八日，進步日報）。我們也曾說到，這些特點是和帝國主義的侵入或多或少有些關係的。我們在本文中所要介紹的是又一個特點，而這特點卻是純封建性的，土生土長的。

一個居留滋長在同一地方的父系氏族，出了個把有地位、有權力、因而也有錢財的人，買上一大堆田地，租佃給氏族以外的人耕種，把租米的收入，長期的、有計劃的賙濟、貼補、以至獎勵本族的人——這種田叫義田，而所以管理義田與掌握租米分配的制度，叫做義莊。有義莊的人家必有義田，否則沒有東西供支配；有義田的人家也必有義莊，否則沒有執行支配的機構。以前文獻中，這兩個名詞雖然通用，事實上是有分別的。

義莊制度與階級矛盾是分不開的。就氏族內部說，存在着貧富的矛盾，貴賤的矛盾。而在氏族中的地主和氏族外的佃農之間，更存在着不可調和的階級對立，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對立。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爲了要對付氏族以外更大的對立，就不能不設法緩和氏族以內貧富懸殊、勢位高下的矛盾。義莊制度於是乎就產生了。緩和了氏族內的階級矛盾，來應付氏族外的階級對立，是極自然的一種發展。

一樣想緩和階級矛盾，又何以必須從氏族關係的羣體出發，而不從其它關係的羣體出發呢？答覆是：氏族在中國歷史裡，直至近代爲止，是最有力的羣體，其所形成的意識形態，也是最牢不可破的一套。這是封建社會的必然現象。所以凡屬有所作爲，就會很自然的掉進它的窠臼。而一經掉進，也就拔不出來。但祇靠意識形態是不夠的，氏族中人，如果祇憑口頭呼籲、文字宣傳、以至於家譜祠堂一類文物的黏綴，來申說氏族中人既如何如何的一本同源，便應如何如何的相親相愛，彼此的距離還是會越來越遠，而矛盾越來越尖銳的。換言之，上層建築之下，總須有一些經濟條件做基礎。義田就是最腳踏實地的這樣一個基礎了。義莊制度的所以用氏族血親羣體做單位，而義莊之「義」所被的範圍，不會大於這樣一個羣體，這是一個初步的說明，下文自將有比較詳細的討論。

二

用經濟施惠的方法來緩和氏族內部的矛盾，手段自不限於義田一種。在義田興起以前，就有以臨時散施私人財物做手段的。

在我國歷史上，氏族公社的破滅，土地的由公社轉入私家，且從此得以買賣，大概到戰國後期、秦代統一以前，便已成爲一個普遍的事實。從此以後，氏族的結構雖存在，卻只是一種沒有了經濟基礎的軀殼。氏族中人，由於四方轉徙，實際的距離加大，可以不必說；而聚居在同一地區的族人，由於經濟與政治地位的分化，情感的距離以至於矛盾也自一天比一天增加。在這種形勢之下，氏族中偶然有崛起的人，受了舊的意識形態的支配，想減少距離，消除矛盾，間或特別表示慷慨，把剝削得來的私人的財物，分散給同族的人以至族外的親友。這些人有不少是大地主，更多的是地主而兼官僚或退休的官僚，所以所分散的財物，除了大量的地租以外，又有經常的官俸以及君王的賞賚。歷史上最有名的一例是春秋時代齊國的晏嬰（晏子春秋，卷六）。自漢以後，見於史傳的例子也不少。兩漢有疏廣、朱邑二人。東漢有韋彪、宣秉、郭伋、廉范、梁竦、劉般、童仲玉、折像、荀恁、种暠、荀淑、等十一人。三國有荀彧、溫恢、田疇、全琮、等四人。晉有汜騰、魏舒二人。南北朝有劉懷愼、崔慰祖、褚炫、陸瓊、房景遠、蔡佑、等六人。隋有柳謇之一人。唐有王珪、李大亮、蕭瑀、唐璿、竇濤、楊元炎、徐璡、崔沔、徐岱、畢誠、等十人。北宋有曹彬、李沆、宋白、吳元扆、劉燮、韓

贊、胥偃、葛宮、王沿、趙良規、韓崎、范仲淹、等十二人。南宋有趙汝愚、姚希得二人。金有完顏昻一人。元有耶律楚材、虞汲二人。明有朱厚熜一人。前後共有五十四人。清代未及查看，大概有也不會多的，因爲南宋以降，沒有一朝有過很多的例子。自漢迄明的五十四個例子中，除童仲玉見後漢書的童恢傳、全琮見三國志本傳注引江表傳、房景遠見魏書房法壽傳、范仲淹見其全集中所附『言行拾遺事錄』卷二、吳元扆見宋史吳延祚傳、朱厚熜見明史朱佑樘傳外，餘均見有關各史書的本傳。

不過此種散財贍族的辦法，是沒有多大效用的。施散的舉動往往只是一次，散光了就拉到。即或不止一次，『出錢施主』一死，也就完了。族人把接受到的財物一次或短期內消耗以後，依然面對着長期的匱乏。氏族內部的矛盾，也是依然存在，依然要發展下去。

爲了使贍給的辦法得以持續，使氏族內的階級矛盾，在比較久遠的將來，不至於更趨惡化，因而有利於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便有人想到了義田的辦法。

三

上文五十四個散財贍族的例子，雖分佈在自漢迄明的全部歷史裡，北宋及北宋以前要佔到四十八例，而南宋及以後只有六例。這是有意義的。文獻上的記載自然並不完全，我們的涉獵也自有限，一起五十多個例子本來也沒有多大統計的價值。但在『尊祖、敬宗、收族』的封建文化傳統始終維持的形勢之下，散財贍族的『義舉』，靖康南渡以後，會突然的不見於記載，或少見於記載，或不受作史家的注意而失於記載，總還有些費解。我們肯定：南渡以後，念念不忘宗法的氏族組織是存在的，贍族的需要也是存在的。我們也肯定：自南宋以迄明代，以至於直至最近，氏族之中決不可能是家給戶足，再不需要同族的贍顧。然則南宋以後，這需要又如何滿足的呢？

滿足這需要的方法就是義田。義田至少滿足了這需要的一部分。義田的設置，恰好是在北宋時代開始的。不過，從散財的臨時辦法到義田的持久辦法，中間還有過一種過渡的措施。見於文獻的至少有如下的一個例子。北宋吳處厚說到宋初宰相饒陽（河北）人李昉，家法甚嚴，『凡子孫在京守官者，俸錢皆不得私用，與饒陽莊課併輸宅庫，月均給之；故孤遺房分，皆獲沾濟』（青箱雜記，卷一）。這顯而易見是一種比較經久的措施。贍族的經費來源，俸錢而外，也有莊課，就是田租。此種田租所從出的田地又顯然不屬於饒陽李氏的闔族，而屬於李昉自己，至多也只屬於李昉自己所屬的一房。換言之，李昉所屬的房分，見到族中其它房分的孤寒，念祖宗一本之誼，號召本房做官的子孫，把俸錢拿出來，和本房的田租，合成一注，然後逐月分配給本房與其它房分的族人，特別是孤寒的房分，以達到緩和族內階級矛盾的目的。這種做法比臨時散財，可一而不可再的辦法有效得多了，但還不是義田的辦法。

義田的辦法與名稱創始於北宋中葉的范仲淹（公元九八九—一〇五二）。上文提到范仲淹也曾經向同族施散財物，所散的是絹三千疋；這一定是創設義田以前的事。義田創設於宋仁宗皇祐元年（一〇四九），見南宋時樓鑰所編的年譜。據說，當時范家子弟勸他造些房子，蓋個花園，好[illegible]老，他不答應，並且說，『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於是就辦了義田。次年，仲淹續修家譜，自己在序裡說：『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范文正公集補編卷一，又，范氏家乘）；當時仲淹『告諸子書』中也有同樣的話。宋史本傳自然也說到這件事：『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宋史，卷三百十四）。

最早關於范氏義莊的文獻是立莊約一年以後范仲淹自己手訂的『初定規矩』十三條（范文正公集，『義莊規矩』），下文將另有討論。後人追叙建立原委，最早的是北宋英宗神宗年間的錢公輔；公輔所寫的一篇『義田記』，是以前凡屬讀過『古文觀止』的人都熟悉的。記裡說：『范文正公，蘇人也。……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廓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者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綽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褒賢集，卷三，文正公集後附）。

義田之外，又有所謂義宅，即用田租所入的一部分來維持的一所容納族人居住的大房子。仲淹自己說：『又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永依庇』。『義宅』的名詞則初見於哲宗元符元年（一〇九八）仲淹子純仁等所續定的『規矩』。又有義學，當然也是用田租來辦理的。這在仲淹初設義田時，可能就有了，可能是後來添置的；最初列入『規矩』，則是神宗熙寧六年（一〇七三）的事。不過元代牟巘作『義學記』，說，『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

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以教，教養咸備『（褒賢記卷四，文正公後附），可見義學是開始就有的了。義田、義宅、義學，合起來就成爲一個整個的制度，就是義莊。存放租米的所謂義倉，也初見於元符元年續訂的『規矩』，後來只稱爲廒房，是義莊房屋的一部分，是有了義田後必有的一部分設備，不能與義宅義學並提。

緩和氏族內部階級矛盾的義田與義莊的制度，就是這樣開始的。對於氏族內部的孤寒，『教養咸備』雖不可必，但其不安與憤懣的情緒，多少總是平靜一些了。

四

范氏以後，設義田的氏族就漸漸的多起來了。到了清代，在經濟力量比較雄厚，而官紳階級比較發達的地區，有如蘇南，更成爲一種風氣。對於這些，我們自無庸逐一介紹。但我們就閱覽所及，知道自范氏而後，一直到明代末年，設置義田的氏族，共得二十五例。（原稿此處有附表，從省）這像前文散財的例子一樣，當然也是無法完全的。二十五例中，以時代論，北宋二，南宋五，元二，明十六。以省區論，蘇南十例，最多，浙江五，江西四，山東，河南，河北，湖南，福建，廣東，各一。從范氏初創到明末，六百年間，義田制度的傳播，至少有到九個省區，不能說不廣。但比較最發達的還是蘇南；其次是鄰近的浙江江西。蘇南的所以最稱發達，顯然是由於范氏起了核心作用。范氏的義田，不但創立得最早，並且維持得最久，田畝最多（詳下文），影響自是最大。別的氏族設置義田，往往要提到范氏的先例，往往說明是仿照『文正遺意』，例如元代元城（河北）的蓋氏，和明代吉水（江西）的張氏。又如南宋臨江的向子諲，曾知平江府（蘇州），退休還家，便很容易的把『文正遺意』帶回到江西去。

到了清代，尤其是從十九世紀起，蘇南的氏族義田更加發展起來，遠超過了其它的省區以上。浙江算是比較多一些，浙東有鄞縣徐氏、吳氏（徐時棟，甬東吳氏義莊碑記，載盛康，清經世文續編，卷六七），蕭山陳氏（王宗炎，陳氏義田記，同上編卷），慈溪陳氏（陳康祺，燕下鄉脞錄，卷六）；浙江有石門蔡氏（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五）。安徽有一例，廬江章氏（章學誠，廬江章氏義莊記，載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五八）。江西也一例，新城陳氏（陳康祺，同前錄卷）。一起只有七列。其它省區的例子如是其少，我們查看的文獻有限，不免是一個原因，但總數決不會多，和下文要說的蘇南不能相比，大概是一個事實。

我們是有些另外的根據說這句話的。上文說，明代以前，江西有過四家義田，南北宋有三家，明有一家；後來大概都衰歇了。清雍正年間的宰輔有一個是江西高安人朱軾；他與族人通信，說到他很欽慕范仲淹的作風，但所慕的只是仲淹散絹三千疋一事。信中又說到曾在族中倡捐祭田學田，自己也曾捐金百兩，來購置學田。信中最後歸結到勸族人勤儉自力，富餘的族人應當『隨分周卹』；始終沒有隻字說到義田或義莊（與族人書，賀氏清經世文編，卷五八）。以朱軾的地位（清代諡文正公的八人之一），而所能效力於同族的不過如此，其它可想而知。又，乾隆初年，陳宏謀任江西巡撫，曾揭示一道檄文，勸江西人民設立『宗祠社倉』，（賀長齡，同上編卷）。宏謀作此建議，足見江西當時沒有人家設置義田，或雖有而極少，沒有能引起他的注意。上文所提的新城陳氏一例，是乾隆年間設置的，大概是在宏謀建議後，可能得力於檄文的暗示，正未可知（宏謀於乾隆六年到江西，八年離任）。別的省區更不必說了。

蘇南的情況卻大不相同。我們這次到蘇南，特別訪問了范氏義莊，到過天平山范氏一部分義田的所在地，和佃種范氏義田的貧農也談過話，在蘇州城裡來往，也注意到了不少別家的義莊房屋；北歸前後，也查看了一些關於義莊的文獻，有如方志、家譜，以及近時的一些調查報告。如下文所列，吳縣有義田的氏族多至六十四家，常熟更多至九十家。我們不能不承認，義田義莊的制度是蘇南封建勢力的一大特點，值得予以詳細論述。

五

我們在蘇南特別訪問了吳縣、常熟、吳江三縣；三縣的鄉間我們也都到了。我們姑且就吳縣、常熟兩縣在義田方面的情形詳細說一說。事實上，有義田的氏族之多，義田的總面積之廣，在蘇南全區，也以這兩縣爲首屈一指。

吳縣有義田義莊的氏族多至六十四家。一九三五年曹允源等所編纂的吳縣志（卷三一）裡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附表，省）這六十四家義莊，共佔義田的土地七八〇六七畝。其中創立於第十一世紀的一例，就是范氏的，十六世紀一例，十七世紀三例，十八世紀十例，十九世紀四十三例，二十世紀五例。若不是因爲辛亥革命，這種有組織的封建剝削制度恐怕還要發展下去。第十九世紀是這制度擴張得最多的一個時期，但在五十與六十年代裡，有過一個間斷，這自然是和太平天國革命有關；但太平天國失敗以後，地主捲土重來，變本加厲，所以

自七十年代直至世紀末葉，設置的例子特別多，要佔到全世紀的三分之二。有的更發達到一個程度，一家可以設立不止一個莊，如盛氏拙園義莊（在武進）之外，又有留園義莊；或由總莊分出支莊，如俞氏，續女義莊之外又有咏方支莊，又如張氏，松陰義莊而外又分而爲崇本支莊；都是在這年代以內發展出來的。更有乍設乍廢的，如常熟胡氏。

氏族義田和普通私家田產不同，一經設置，是輕易不會廢除的。義田是闔族的財產，非經公議，不能轉移分毫，主管人如有偷售等情事，以不孝論。由於同樣的理由，田畝的數量是只可以增加，不可以減少的。政治上大的動亂當然可以影響到它，但動亂一停，封建勢力又穩定下來，它也就恢復了。

儘管如此，我們所得關於義田畝數的資料，是不完全可靠的，以至於很不可靠的。即如范氏，初創時是一千多畝；一六二五年，添一千畝；一七二九年，又添一千畝；一七四四年，又加上一百畝；合起來，應當是三千多畝。但見於蘇州府志（同治重修本）與吳縣志（一九三五）的最後畝數是五千三百多畝。其實還不止此數。早在道光年間（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同邑王鎏作『義田說』，說『余嘗詢諸范宗，文正義田，今已增至八千餘畝』（葉耀元編，洞庭王氏家譜，卷二下，一九一一年）。而我們在這一次訪問中，聽說范氏義田的總畝數當在二萬以上，比方志所載高出四倍。又如在洞庭東山的翁氏，根據最近土地改革初期的一個調查報告，太湖裡的洞庭東山區（舊亦屬吳縣），即有十個義莊，翁氏義莊即其中之一，吳縣志說它有義田五二〇畝，而土改初期的調查則發現它有九五一畝，可能是十多年間添置了，可能是地方志採訪時畝數不可靠。總之，一家義田，究有多少，恐怕誰也說不太清礎，包括管理義田的『主奉』『主計』人員在內。理由是很簡單的。（一）以前中國的田畝，很少經過清丈；田畝的大小，也沒有一定標準。（二）一家有一家的自私，爲了減少向政府納糧的數量，地主們申報田產，往往以多報少，普通的大地主如此，義田的大地主也如此。（三）一房或一人有一房一人的自私，以至於舞弊，管理義田的人，於田畝實數，如對同族人作清楚的交代，便不好上下其手了。在我們所見到的范氏家乘（乾隆十一年，四十册）裡，義莊賬目不清的歷代官司賬，就佔了很大一部分的篇幅。從這裡已經多少可以看出義莊之『義』究竟包含一些什麼內容了。

無論如何，吳縣一縣之中，六十多個氏族，於私人田地而外，又侵佔了八萬畝以至將近十萬畝的田地，平均每族一五〇〇畝以上，總是一個非同小可的現象。

常熟的情形與吳縣的很相像。茲照上文吳縣例，根據清末（一九〇五）刊行的常昭合志稿（卷十七）所採訪的資料及其它零星記錄，我們求得常熟一縣的氏族義田義莊共九十例（附表，省）。其中設立或題旌年份未詳者五例；義田畝數未詳者六例；已廢者一例，就是胡氏廷鎏義莊。時代上最早的嚴文靖公義莊，見於明人筆記，疑亦已廢，否則志稿上大概不至於失載。題旌時年份大約就是創立的年份，至少遲得有限，如歸氏義莊於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六月創立，並疏請題旌，十月即奉旨，准其建坊旌表。九十例中，除第十六第十八兩世紀各得一例、二十世紀五例、未詳四例外，其餘七十九例，全部是十九世紀以內設立的。十九世紀後半，除了太平天國革命期間及後來若干年以外，差每年有人設立義田，亦見封建地主階級捲土重來的那一股頑強的力量。

常熟的義莊義田，比起吳縣來，發展雖較遲緩，卻大有後來居上的趨勢。除田數未詳的六例及已經廢置的兩例外，其餘八十二例合估作爲義田的田畝六三七〇四，每一例約得八〇〇畝不足。其實總額決不止此，志稿把各家田畝的畸零數都省略了，例如歸氏的義田是一〇四二點六五九畝，而志稿只寫上『一千畝有奇』。無論把畸零數算上與否，六萬四千畝的義田總額總是很可觀的了。常熟一縣的耕地總額是一百七十五萬畝左右，六萬四千畝便是這總額的百分之三點七。我們在『誰說「江南無封建」？』一文裡說到常熟一縣，百分之五點六的人口是地主，而這些地主佔有總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六十五點四。如今把這百分之三點七的義田總額加上，可知地主所佔耕地總面積要高到百分之六十九點一，竟和土地所有權最集中的省區，四川，沒有多大分別。這一個小小的加法題目是必須做的，因爲土改把義田列作『公堂田』的一種，其實名爲『公堂』，實同私有，義田的租佃關係和私人田地的租佃關係是完全一樣的，剝削的程度也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一人一家之私成爲一族之私罷了。這在下文自將另有討論。有一點似乎值得在此加以說明。看了常熟義田的情形，可知當初一個氏族動議設立義莊，要向政府備案，或請准題旌，至少必須具備義田五百畝，否則大概辦是可以辦的，但政府不加准許，也就是不予保護。關於這一點的法令根據，我們想一定是有的，但還沒有能查考出來。

蘇南其它的縣份，有義田的氏族就比較少得多了。無錫與武進也還很有一些例子。舊的蘇州府屬以內，崐山縣有五例，吳江縣有一例（一八七四

年，蘇州府志，卷二十四，吳江一例亦見一八九九年，蔡丙圻的黎里續志，卷二），嘉定縣（淸代屬太倉州，今屬松江專區）有兩例（一九一〇年，黃世祚，嘉定縣續志，卷二）。我們中間的一人的家鄉，寶山縣，似乎連一例都沒有，至少從小沒有聽見過。義田制度，無疑的是蘇南農村封建勢力的一個特點，但它的散佈是不平均的，我們可以說吳縣常熟是個核心，好比打靶子，這兩縣是子彈所集中的正鵠，四圍便見得疎疎落落了。但四圍雖少，比起其它省區來，已經見得很密集了。

六

其次，我們要說一說義莊究屬做些什麼事，即，義田的田租是怎樣派用處的。大體是我們已經知道的。就是，把田租來贍給同族的人。不過所謂同族，指的是那些人？族的範圍有大小，究有多大？凡屬範圍以內的人，是不是人人有分，以至有分量相同的分？如果分別厚薄，是在什麼條件之下分別的？這些問題還需要加以答覆。

義田贍族，大抵可以分廣狹兩種，或有限制與無限制的兩種。所謂兩種，又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從『族』字來看，一從『贍』字來看。從『族』字來看，族有大小，義莊設置條規，可以把贍的對象限制在同宗五服之內，即同高祖的族人與其妻室，那就是狹的一種；超出了這限度，就成爲廣的了。從『贍』字來看，日常生活需要，包括衣、食、住，和人生大事，有如教育、婚姻、喪葬，全部在照顧之列，而且是沒有選擇的照顧，那就是廣的一種；如在這許多項目上只照顧族中貧弱的分子，就成狹的了。

范仲淹最初創立義田的時候，贍顧範圍的廣狹是如何的呢？就『族』字論，其範圍是狹的；就『贍』字論，却是廣的。仲淹在『續家譜序』（范集補編，卷一）裡自己說到，『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麗水府君即仲淹高祖，可知凡屬同高祖的族人都在接受月給之列，計當時不過九十多人（錢公輔，義田記）。但後來的範圍一定是推廣了。宋南渡後紹興年間（一一五〇前後），散亡之餘，還有到二千人（錢氏義田記後范直方附記，范集褒賢集，卷三）；一直到最近被徵收爲止，凡屬麗水府君的子孫，只要在蘇州一帶住家，大概全都是贍給的對象。

不過，就『贍』字論，範圍開頭就是很廣。見於宋皇祐二年（一〇五〇）『初定規矩』的，有食米、衣疋、嫁與再嫁，娶與再娶，喪葬，等項目。族人而外，鄉里、外姻、親戚也有一些濟助，也在『初定規矩』之中。到熙寧六年（一〇七三）續定規矩，又添上兩項：考試旅費和塾師束修。到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又添一項，就是所謂義宅，連『居住』都照顧到了。其實這一項是在初創時便已有的，上文不已引過仲淹自己的話『又理祖第……』云云麼？可能到元符年間，族中又添蓋了一些房子，於是『義宅』之稱，才見於『規矩』。凡屬規矩所載的項目，族人個個有分，而且同等的有分，不分貧富強弱。范氏義田要比別家的義田特別多，這大概是主要的原因，贍顧的方面既廣，田地的面積也就不得不廣了。

其實這種一視同仁或同『義』的辦法極不妥當。周急濟貧，是有意義的，繼富，便毫無意義；養成遊惰依賴的習慣，更有極壞的意義。所以後來的義田，似乎全都採取有條件的贍給的規定。關於義田的議論，亦都主張以濟貧爲原則。南宋新淦郭氏置義田，說明『周貧族人』（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二）。鄞縣樓氏設義田，目的也是『以活宗族之不給者』（陸心源，宋史翼，引劉宰撰樓璹墓志）。明末，陳仁錫設陳氏義莊，自爲記，說『設極貧、次貧二則，核實均贍；設向善、力學、守節三規，歲舉優給』（吳縣志卷三一，註引）。淸中葉，王罃『義田說』一文更直接評論范仲淹說：『文正義田，計口給食，其弊將使子孫安於偷惰。故方靈臯先生（方苞）以爲未善。當周其惸獨者，厚其有志務本業者，而游惰者不與；寓勸懲於周卹之中，此又經畫義田之要道』（葉耀元編，洞庭王氏家譜，卷二下）。王氏後來自己也設義田，大概是照此原則辦理的。徐時棟作『甬東吳氏義莊碑記』，說，『其心力足以自用，而無慮乎飢寒也，吾置之；其不能，則給之』。又說，『斷之以義，則莫如鰥、寡、孤、獨、罷癃、廢疾』；如其不斷之以義，不設限制，則『生齒繁而其道窮，窮則弊叢起，而爭訟搶奪之禍作』（盛康，淸經世文續編，卷六七）。王宗炎也說，『游惰無業者不得與』，要使族人中的『賢者以受粟爲媿，其不賢者以不與於饒爲恥』（陳氏義田記，同上編，卷）。但不加限制的例外還是有的，明代理學家湛若水所設的義田（湛銑，湛氏小宗義田記），便是一例；明末，又一理學家陳龍正爲其前輩所設的義田訂立規矩，也是一般性的（家矩，合族篇）。淸代盛康所立的留園義莊，也是一例，下文當更有說明。更有居間的一類，即衣食周給以匱乏者爲限，而婚姻喪葬教育的補助則人人有分，例如吳縣吳氏繼志義莊。

回到『族』字一方面，大抵最初不離把範圍限於五服之內，但後來勢必終於不可能。范仲淹規定

以『寵水府君』的子孫爲限，因爲他自己恰好是這位府君的玄孫，再下一輩，便勢必有關係在五服以外的族人接受月給了。湛若水把設立的義田稱爲『小宗義田』，並且說明，贍給所及，只限於『五世之子孫』，此五世者，不知從誰算起，大概從他自己算起；但無論從誰算起，一到第六世，便停止不給了麼？那當然是不可能，除非突然把義田撤除。明末吳縣人吳之良設繼志義莊，自爲記，也說，『公諸五服之親，傳子及孫，而各以五服爲率。……凡吾五世，咸得與焉；我子若孫，不得而私焉，不得而擅廣焉』（吳縣志，卷三一，註引）。清人盛康（盛宣懷之父，清經世文續編編者）設了兩個義莊，贍族範圍大的一個叫拙園義莊，在武進，田租所入『普及於一族之人，而以周卹窮乏爲主』；贍族範圍小的一個叫留園義莊，則『以我爲始……凡吾之子若孫，若曾孫玄孫，以至仍孫雲孫，而推之於無窮，不論貧富皆與焉』。盛氏自己又很得意的說：『自吾今日觀之，似涉於私；在子子孫孫世守之，則仍大公而無私』（兪樾，盛氏留園義莊記，吳縣志，卷三一，註引）。這話一半是說對了，留園義莊所贍給的對象範圍，開始小，後來終不免於一代一代的擴大。一半却沒有說對，子孫雖玄仍雲，世代嬗遞，至於無窮，理論與願望上不難如此，社會進步的實際需要又如何呢？設莊後不及七十年，留園已經是近乎一個令人憑弔的廢墟，不到八十年，它所控制的義田已經成爲土地改革的對象，還給了人民！即在盛氏的子孫看來，這種的大公無私，比起他們祖宗所瞭解的『大公無私』來，該有一些分別！

義莊必有條規，條規必列濟助項目，項目最多與最具備的大概要推元和（今吳縣）的潘氏和長洲（今亦吳縣）的彭氏。彭氏的義莊創立（約一七五〇）雖早於潘氏七八十年，訂立正式的條規，（一八七六）則後於潘氏約三十年，而是以潘氏做範本的。我們不妨把兩家的條規所列的濟助項目，介紹與分析一下，有了這兩家，其餘也就可以概括了。濟助項目大致可以分爲如下的四類。

第一類是屬於基本生活的，如食、衣、住。凡屬極貧、失業、廢疾、或老而無依的族人，兩家都規定有長期或臨時的救濟錢米。關於衣，潘氏對貧老族人，有六十歲起加給冬衣的規定。住，兩家都沒有，這是和范氏不同的；范氏的所謂義宅，大概也只是初期設置過，後來便行不通了。所以後起的義莊，對於這方面都不作安排，不獨潘彭兩氏爲然。

第二類是屬於婚姻狀況一方面的。嫁女、娶婦、以至於再娶，凡屬貧乏的都有濟助。再娶，彭氏是有的，潘氏的規定不很清楚。再嫁一項，僅見於范氏，後來的各家全都沒有。這當然是指媳婦的再嫁，而不是本族已嫁女的再嫁，本族嫁出之女再嫁與否，本族當然管不着。范仲淹自己的母親謝氏，再嫁過朱氏；兒子純禮，因病成廢，仲淹又作主把媳婦再嫁給自己的學生王陶；北宋，以至南宋以前，再嫁是不太受禮教的拘束的；所以在仲淹看來，設此一項，是很應該的。後世貞操觀念變本加厲，才把改嫁看作可恥，所以范氏子孫在義莊規矩的有關項下添上『謂次女』三字的小註，弄得完全不通。范氏子孫不識祖宗的用心，猶且如此，其它後來氏族的未能免俗，而不設再嫁一項，自可想而知了。貞操觀念畸形發展以後，貞女寡婦大受重視，成爲贍給的對象；這在潘彭兩家自都有規定，濟貧之中，又兼寓獎勸之意。嫁出之女寡而貧，在彭氏有贍給，潘氏則無。族人貧者無子而納妾，潘氏有濟助，彭氏則無。鰥夫而窮，當然也在接受賙濟之列，這是兩家相同的，但鰥、寡、貞一路所得到的濟助都是屬於基本生活性質的，那便和第一類的項目交叉了。應當屬於下文第三類的孤（幼無父母）與獨（老而無子），也是如此。

第三類是關於教育的項目。窮苦的族人產育子女，在彭氏有賙濟，潘氏沒有。孤，上面已說過，但彭氏多一附項，即凡屬肯出力撫孤的別房的族人，不分貧富，可以得一些津貼；潘氏也沒有這一項。彭氏的莊規後於潘氏，吸取了潘氏經驗之後，又添上了一些，確乎是更見得周到了。族中貧苦子弟有志讀書，在迷信讀書萬能的封建時代，尤其是以出所謂科甲以至魏科人物最多而著稱的潘彭兩氏，自不會不特別照顧。進莊塾（即族中義學，與武訓所設立的又有不同）讀書，自是照顧的第一步。逢時逢節有獎助，文具書籍免費發給，是第二部。文會、課（做八股文競賽），有吃有喝，文章好的，還有花紅（一筆錢），是第三步。各級考試送路費，是第四步。考試取中了有賀錢，是第五步。出到此種花紅、程儀，以至賀錢，族人大家沾到光彩，便不問領錢的人的有力無力，一律照給了。這一段莊規十足表示了封建勢力下的獎勵方式。還有和封建的文化教育有關的一項，就是，族中孝弟貞節的事例，如果本人本房無力呈報，無力自己表揚（樹匾建坊之類），義莊也可以出資辦理。

第四類是關於死亡的項目了。這是比較簡單的，不外喪、葬、墓地三事。族人貧乏的都可以領到一部分喪費、葬費、以及族墓的一角。族墓是專爲此等自己買不起墳地的人設的，近乎一般的義塚，怕是無法講求風水與穴道的。這在許多氏族的義莊，都照顧到了，潘彭兩氏，自非例外。（未完）

資產階級租稅轉嫁理論批判

[redacted]

租稅轉嫁是資本主義財政中的一個重要現象。爲了認識資本主義財政的階級剝削的本質，對資本主義的財政制度作一正確的、科學的評價，揭露租稅轉嫁問題的眞象，實爲最重要的事情。但因爲各種謬誤的租稅轉嫁理論，將這一問題的眞象，弄得十分混淆，在着手分析此問題之前，必須先對各派資產階級的租稅轉嫁理論，作一次總的清算。

本文以資本主義社會爲範圍，其他各種社會制度下的租稅轉嫁現象，都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一　租稅轉嫁的意義及其各種方式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納稅人往往不是租稅的眞正負担者；納稅之後，租稅負担常可通過各種方式，轉讓給別人。這類現象，總名之爲轉嫁。

轉嫁的現象，可在生產過程中出現，可在流通過程中出現，也可在剩餘價値的分配過程中出現。分別討論如下：

（一）生產過程中出現的轉嫁現象　例如國家對某一企業徵稅，徵稅的結果，減少了該企業的利潤，資本家爲彌補此項損失計，往往用減低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强度、改良生產技術等辦法，以減低生產成本，由此增加的利潤，不但抵補了課稅的損失，而且會遠超過課稅數額。資產階級的財政學者，稱這種情形爲「消轉」（Transformation），實際上「消轉」的結果，並不是稅收負担的轉化，而是剝削率的加强；資本家固然由此增加了絕對及相對剩餘價値，但全部的租稅負担（甚至超過租稅負担以上的損失）却由此轉嫁到工資勞動者的身上。

（二）流通過程中出現的轉嫁現象　在商品的流通過程中，納稅人利用提高售價（賣者）或降低買價（買者）的辦法，將課稅負担轉讓給交易的對方，這類轉嫁現象，都是發生於價格變動之際，資產階級的財政學者，祇抓住這一點，便把租稅的轉嫁現象完全看作是一種價格現象，這是十分錯誤的。

（三）分配過程中所出現的轉嫁現象　租稅轉嫁現象，也可在剩餘價値的分配過程中出現：例如國家對地租徵稅，地主提高地租以轉嫁給佃戶；對房租徵稅，房主轉嫁負担給住戶；對利息所得課稅，債權人提高利率等。

資產階級的財政學者，由於對商品的本質毫無認識，致把各種財產使用權（如貨幣的借貸，房地產租用等），都看作商品，因而把剩餘價値分配過程中所發生的轉嫁現象，與流通過程中所發生的轉嫁現象混淆一起。結果便在「等價交換」，「自由契約行爲」等外衣下，把租稅轉嫁的階級本質掩蔽了起來。

實際上，不論轉嫁現象採取何種形式，也不論它是發生在何種過程之中，結果都會引起租稅負担的轉移（不是租稅負担的消滅或「轉化」爲利益），而且通例都是把統治階級的納稅負担轉讓給被統治階級。因爲這一共同點，所以本文用轉嫁一詞，概括在各種情形下所發生的租稅負担的轉移現象，而不像資產階級財政學者那樣，只把由價格變動所引起的租稅負担的轉移，叫做轉嫁。

二　古典學派的租稅轉嫁理論

在重農學派以前，租稅轉嫁問題雖已討論了百餘年，但多半是一些零星片斷的意見；到重農學派，租稅轉嫁問題纔開始被當作經濟學說的一個構成部分，才成爲一種系統嚴密的學說。

重農學派把農業看作社會物質財富的唯一來源，認爲只有農業能產生「純生產物」（Produitnet）——即減除各項成本以後的剩餘，其餘工商各業，只能改換既存財富的形式或位置，並不能創造新的財富。因此，除從事農業的人口而外，社會上的其餘各階級，都是不生產階級。

由這種學說出發，重農學派就機械地認爲租稅只能由純生產物取得，而純生產物則爲地主以地租的方式所據有，因此，國家只有徵收土地單一稅（對地租徵課），纔是對社會最爲有利。如向地主以外的其他各階級徵稅，最終都會轉嫁給地主階級。結果，其他階級多了納稅的痲煩，國家並不能取得較多的收

入，地主則除負担和土地單一稅一樣多的稅額而外，還要負担更多的徵收費用（因徵收多種租稅較僅徵土地單一稅費用更大），對整個社會都是有害無利的。

由此可知，重農學派的主張，是超現實、超階級的，這樣的經濟理論，是不能成立的，因而，重農學派對租稅轉嫁現象的分析，也完全陷於錯誤的。

亞丹・斯密的租稅轉嫁理論，主要是建立在下列三點認識上的：

第一、租稅必須出自剩餘或純所得，如果課稅及於生產成本，必然轉嫁。

第二、課稅不能觸及平均利潤（但他不曾採用平均利潤一名詞）及平均利息水準，如因課稅的結果，使一部分利潤或利息降低到平均水準以下，必然發生轉嫁。

第三、工資等於工人的最低生活費用，因此，課於工人的租稅，必然轉嫁。

基於這樣的認識，亞丹・斯密就認爲：

第一、工資稅、利潤稅及商品稅，都是可以轉嫁的。

第二、地租稅不能轉嫁。

第三、社會上眞正負担租稅的，只有地主階級，富裕消費者以及在一定條件下（資本不易輸出時）的債權人。僱主及工資勞動者，都是不負稅的。

亞丹・斯密氏在他的經濟學說的基礎上，建立起租稅轉嫁的理論，雖比重農學派顯得完整一些，但因他始終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對社會各階級之間的眞實關係，不能有正確的認識，所以他的租稅轉嫁學說，也就犯了很多根本上的錯誤。其中最重大的，是他關於消費者負稅的主張。消費者包括社會上的各個階級和階層，他們的所得，也有各種來源。租稅轉嫁給消費者之後，轉嫁的現象並不見得馬上中止，往往還會因消費者所屬的階級，發生再度轉嫁的情形。比如消費者爲地主，倘若因租稅的轉嫁而減少了地主的收入，地主必然要增收地租，將租稅負担再轉嫁出去。即以亞氏的工資勞動者不負担生活必需品課稅的主張而言，工資勞動者也是消費者，說工資勞動者不負稅，顯係與其消費者負稅的主張相矛盾。不去分析消費者所屬的階級，便武斷地認爲消費者是最後的負稅者，這實是亞丹・斯密租稅轉嫁學說的最淺薄之處。這一錯誤，爲後來的庸俗財政學者所利用，成爲他們掩飾階級矛盾的重要工具。

其次，亞氏認爲工資稅及生活必需品稅能引起工資水準的上漲，因而不會爲工資勞動者所負担，也是完全錯誤的。假定社會上沒有失業人口存在，工資的上漲，原有可能的。但在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中，經常有大量的產業預備軍存在。他們的競爭，使在業工人的工資，經常跌到勞動力價値之下，工資稅及奢侈品稅，誠然會增加工人的生活費用，但提高工資，却是不太可能的。工人只能忍受租稅的額外剝削，經常生活在半飢半飽的狀態之下，決不可能用抬高工資的辦法，將租稅負担轉嫁給僱主。

又次，亞丹・斯密認爲農業資本家會用降低地租的辦法，將課稅負担轉嫁給地主，更是荒謬絕倫。資本家不肯接受平均利潤以下的利潤，地主又豈甘於地租的降低？事實上資本主義愈發達，農業地租愈增加，農業資本家減付地租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

最後，亞氏只知道資本家可用抬高售價的辦法，將租稅負担轉嫁給消費者，而不知道資本家還可利用降低工資、加强勞動强度、延長工作時間及改進生產技術等辦法，將租稅負担轉嫁給直接生產者——工人階級。這也是亞氏學說的重大缺陷之一。

再次，來談談李嘉圖研究租稅轉嫁問題的方法。他在基本上是和亞丹・斯密相同的，他也從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個階級（工資勞動者、資本家、地主）之間的所得分配出發，將租稅分爲土地稅，利潤稅，工資稅三大類，分別研究其轉嫁的情形和方向。但他所達到的結論，則和亞丹・斯密很不相同。

在後者看來，地主是租稅的最主要的負担者，富裕消費者次之，債權人又次之，其他各階級，都不負担租稅。李嘉圖則認爲：地主只負担地租稅一種，一般利潤稅及工資稅，則都轉嫁給資本家（他所說的「生產者」），土地收穫物稅也有一部分轉嫁給資本家，所以資本家乃是社會上的最主要的負稅階級。消費者也負担一部分租稅，只有工資勞動者是完全不負稅的。

李嘉圖的租稅轉嫁學說，表面上似乎與亞丹・斯密大不相同，但在以下幾個基本論點上，二人却是完全一致的。即是：

第一，二人均認爲工資勞動者不負担任何課稅（不過斯密提得沒有李嘉圖那樣澈底）。

第二，二人都認爲消費者是一部分租稅的最後負担者。

第三，二人都認爲地租稅不能轉嫁。

第四，二人都沒有認識到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租稅轉嫁現象。

這幾點實是古典學派租稅轉嫁理論的致命傷。批判古典學派的租稅轉嫁理論，必須針對這幾點。其中三點，已於批評亞丹・斯密的學說時談到，關於地租稅的轉嫁問題，留待第四節再詳爲論述。

三　庸俗財政學者的租稅轉嫁理論

近代庸俗的租稅轉嫁學說，始於賽伊（J. B. Say），經古諾（Cournot），瓦拉（Walras），馬夏爾（A. Marshall），愛治渥斯（Edgeworth）等，至塞里格曼（E. R. A. Seligman）而集其大成。塞里格曼著「有租稅的轉嫁與歸宿」（The Shifting and Incidence of Taxation）一書，專門討論租稅轉嫁問題，集合了歷來租稅轉嫁學說中的庸俗成分，創爲十一條租稅轉嫁的「一般法則」，一向爲資產階級財政學者奉爲致條。其學說的基本論點，大致爲：

（1）把租稅轉嫁論看作價格論的一部分：塞里格曼强調指出：「租稅轉嫁問題基本上是一個價格問題」。（見該書二一九頁）他的整套學說，都是從庸俗經濟學的價格論出發，把租稅轉嫁現象完全看作買者與賣者（或用他的說法：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競爭現象。於是，租稅的負担，不歸「生產者」即歸消費者，租稅究竟是否轉嫁，以及轉嫁給誰，便完全看課稅後價格的變動情況而決定：如果商品在課稅後價格上漲，則至少會有一部分負担轉嫁給消費者；反之，如課稅使價格跌落，則課稅負担將轉嫁給生產者。至轉嫁的多少，則由價格變動的程度決定。

（2）課稅後價格的漲落以及漲落的程度，由幾種因素（即商品的性質、租稅的性質、生產條件、需求彈性等）決定，所以一種商品在課稅後價格變動愈大者，則租稅負担轉嫁愈多。

（3）將生產過程中的轉嫁現象，排出在他的學說體系之外。

塞里格曼也曾提出「消轉」的問題，但並不將此問題包括在其「一般法則」之內。排出的辦法是：第一，把消轉解釋爲「負担轉化爲利益」，因而與轉嫁區分開來。第二，說消轉是社會上最稀有的現象，因此，只在卷首輕描淡寫地提了一下，便把它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古典學派的學者，雖然由於階級立場的關係，不能眞正把握租稅轉嫁現象的正確規律，但他們能從社會各階級的所得分配關係來研究租稅轉嫁問題，在研究方法上總還有相當可取之處，而庸俗的租稅轉嫁學說，却把租稅轉嫁現象看作單純的價格問題，因而將此現象中所包含着的階級矛盾，完完全全給掩蔽起來。生產過程中的租稅轉嫁（即塞里格曼所謂「消轉」），本是各種租稅轉嫁方式中最直接、最殘酷，而且是極爲普遍的一種，但却運用了偷天換日的手法，避開這一問題的階級剝削的本質，把它說成是稀有現象，是負担轉化爲利益，藉以避開人們的注意，居心實爲可誅。此外，塞里格曼避開社會各階級之間的所得分配關係，只從商品的性質、租稅的性質、生產條件及生產成本的情形，以及需求彈性等方面來分析租稅轉嫁問題，把資本主義租稅制度中所體現着的人與人的關係，看作物與物的關係、物與人的關係、或單純技術問題，這種庸俗淺薄的商品拜物主義，尤其不值一駁。

最後，庸俗的租稅轉嫁理論，是建立在庸俗經濟學價格論的基礎上的，庸俗經濟學的價格論既然是完全錯誤的，庸俗的租稅轉嫁理論，自然也完全喪失了立足之地。不過關於庸俗價格論的批判，不屬本文的範圍，這里也就從略了。

四　資本主義社會租稅轉嫁問題的眞象

租稅轉嫁現象出現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各方面，表面上看來，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但在本質上，它也和其他財政現象一樣，無非是社會各階級之間的財政鬥爭的一部分。只有從這種見地出發，來研究租稅轉嫁問題，才能把握到它的基本規律。

資本主義社會，主要是由工資勞動者、資本家及地主三大階級構成的。工資勞動者的所得，等於其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雖然大量產業預備軍的存在，經常使勞動者的實際工資低於其必要生活資料），資本家及地主的所得，則由剩餘價值而來。資本積累的無底慾壑，使剝削階級隨時設法加强剝削率，以擴大剩餘價值在社會總生產價值中所佔的份額。資本主義的租稅制度，又給這種加强剝削率的趨勢，添了一個新的法門：各種對剩餘價值的課稅，都促使剝削階級設法將租稅負担轉嫁給被剝削階級，使被剝削階級除了原受的剝削而外，更因租稅的轉嫁而遭受額外的剝削。

各種剝削者之間，雖然都企圖將租稅負担轉嫁給對方，但因他們都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都能將轉嫁到自己身上的租稅，再行轉嫁出去。只有工資勞動者除了本身之外，一無所有，所以成了各種租稅的最終「歸宿」。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除了對勞動者的直接課稅外，其他各種租稅，差不多都是能够轉嫁的。

以下再就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各種實際租稅，分別討論它們的轉嫁現象。

所得稅的課稅對象，包括社會各階級及階層的所得，情形最爲複雜，大致說來，對工資的課稅，直接使工人的實際收入降低（對生活必需品課稅，則間

接降低工人的實際收入），在勞動力供求相應的情形下，工資水準可能因課稅而暫時趨於上升。資產階級的財政學者，便因此斷言工資稅必然會轉嫁給僱主。實則除戰爭及少數繁榮時期（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來，危機的爆發愈頻繁，時期愈延長，而繁榮時期就相對地愈短了。從一九二九年大恐慌以後，繁榮已一去不復返了。）而外，勞動力總是供過於求的，對工資的課稅，通常極難引起工資水準的上漲。因此，工資稅轉嫁給僱主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

現代工人運動的日趨高漲，工人階級覺悟的提高，大大加強了工人爲要求增加工資而鬥爭的力量，但在資產階級專政的情形之下，資本家仍可用種種方法，鎮壓及破壞工人的此種合理要求，即使工資水準能因工人鬥爭而增加到和課稅額相等的程度，資本家仍可用改良技術、提高勞動強度等辦法，使工資水準的提高，變成有名無實。因此，把工資水準的提高看作工資稅轉嫁的表現，實在是毫無根據的。

如對各企業部門的利潤所得課以差別稅率，課稅較重的各部門，實得利潤率將跌在平均利潤率之下，結果必因供求關係的變化，使這些部門的產品發生價格上漲的現象，租稅負担將由此首先轉嫁給消費者，然後再隨消費者的地位，而有轉嫁過程中止或再度轉嫁的現象。

對各部門利潤課以均一的稅率，對平均利潤率不致有所影響，因此，個別企業的差別，不致因此發生供求情況的變化。在這種情形下，租稅的轉嫁不外兩種途徑：一爲一般物價水準的上漲，一爲一般剝削率的增強。在一般物價水準上漲時，因各種商品用途不同，上漲的比率，決不可能完全一致。一般說來，越是生活必需品，上漲的比率越大。因此，因物價上漲而受害最深的，顯然還是無產階級及其他貧苦階層。剝削率的加強，不論是增加絕對剩餘價值還是增加相對剩餘價值，負担都會完全落到無產階級的身上。由此看來，庸俗財政學者所謂一般的租稅不易轉嫁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的。

資產階級的財政學者，只知有級差地租而不知有絕對地租，所以在討論地租稅的轉嫁問題時，便藉口「地租是價格上漲的結果而不是價格上漲的原因」，因而主張地租稅不能轉嫁。實際上在地租額中，都包含絕對地租的成分，對地租課稅，勢將引起絕對地租的增加，而絕對地租的上漲，却是農產品漲價的原因之一。即專就級差地租而言，對級差地租的課稅，固然不能引起農產品的漲價，但決不能因此就斷定對級差地租的課稅不能轉嫁。因爲，農業資本家的利潤固然不能低到平均利潤率以下，但農業勞動者的工資却往往可以再行降低。如果地主在繳納地租稅之後，堅持增加地租，倘農業資本家不願退佃，便只有接受新的租地條件，付出較多的地租，而用降低工資的辦法，將租稅負担轉嫁給農業勞動者，以保持自己的（平均）利潤率。在理論上，農業勞動者固然也可轉業，但在資本主義勢力侵入農村之後，大量農民破產流離，形成嚴重的過剩人口，都湧向都市，尋求職業，工業本身，也不斷製造出大量的產業預備軍，農業勞動者離開農村，別謀職業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的。在無可奈何中，只好忍受降低工資的待遇了。因此，農產品價格即便沒有上漲，地租稅仍可通過農業資本家，轉嫁給農業勞動者。

利息是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利息如果增加，平均利潤的下餘部分（歸產業資本家所佔有的），勢將因而減少。利率是否因利息所得稅而增加，以及增加多少，均看借貸資本家與產業資本家雙方的競爭力量而決定。如因課稅而引起利率的上漲，產業資本家便將提高物價或加強對勞動者的剝削，以彌補因利率上漲而損失的利潤。如課稅後利率不增，借貸資本家便會設法將資金移往國外或直接經營生產事業，這樣仍有可能因貸放資金的供給減少而引起利率的上升。因此，利息稅轉嫁的可能，也是相當大的。

一切消費稅的轉嫁，都可分作兩步：第一步是由價格的增漲，將稅收負担轉嫁給消費者，第二步更隨消費者的地位，決定是否會再度轉嫁。就第一步轉嫁而言，越是生活必需品，轉嫁的可能性越大，僅由此點看來，消費稅加重勞動人民的負担，已是毫無疑義的了。在第一步轉嫁之後，落在各種剝削階級身上的租稅負担，都有發生第二步轉嫁的可能。這在前面已有論述了。

各種流通稅——如印花稅、交易稅、運輸稅、登記稅等，都會增加流通費用，因而轉嫁的情形，也和消費稅相仿。

最後，談到各種財產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除臨時財產稅及遺產稅外，其餘各種財產稅，名爲財產稅，實際上都是（財產）收益稅。因此，它們的轉嫁情形，和各種對剩餘價值的課稅，並無太大的區別。

以上的分析，都是以自由競爭的存在爲前提的。但當自由競爭產生了它本身的否定，若干產業部門都已爲獨佔資本所控制時，租稅轉嫁的現象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因爲在獨佔經濟的支配之下，獨佔資本集團對內已經壓倒一切競爭者，對外則利用保護關稅，輸入限額及瓜分世界市場的條約等，阻止外來的競爭，商品的供給和價格，由此爲獨佔資本集團所一手操縱，平均利潤法則，也受着獨佔利潤法則的支配。獨佔企業在決定價格時，是以最大利潤爲目的，

國內市場的購買量，已被提到最大限度。在這種情形下，對商品或企業本身的一切課稅，就可能減少獨佔企業的利潤，而獨佔企業，爲了轉嫁租稅的負担，往往用減低生產成本，以保持最大利潤。減低成本的辦法，除擴大獨佔事業的範圍，加緊企業的合併及市場和原料產地的瓜分外，便只有加强對勞動者的剝削，以種種「合理化」的辦法，榨取更多的相對及絕對剩餘價值。因此，在獨佔企業佔支配地位的情形下，「消轉」尤其成了租稅轉嫁的最主要的方式。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租稅轉嫁問題，可以得出下面的幾個基本原則：

（1）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租稅轉嫁是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一種補充剝削方式。

（2）因此，除對工資勞動者的直接課稅外，其他各種租稅，都有大部分甚至全部會轉嫁給工資勞動者。

（3）轉嫁的方式，有時通過價格機構，有時不通過價格機構，而直接在生產過程中轉嫁給工資勞動者。

（4）在自由競爭佔支配地位的時代，上述兩種轉嫁方式都是非常普遍的，在獨佔經濟支配下，則多半採取後一種辦法，由加强對勞動者的剝削率，來轉嫁租稅負担。

以上只就資本主義社會中三大基本階級立論。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還有一些介乎這三者之間的階級和階層——例如小生產者和各種不生產勞動者。他們的存在，使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租稅轉嫁現象變得更爲複雜，但對租稅轉嫁現象的基本規律，是不會有甚麼影響的。

本刊四卷四期要目

慶祝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特輯

中國共產黨領導着國家建設　陳雲

中國人民怎樣戰勝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聶榮臻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李維漢

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紀念　徐特立

中國共產黨與民族工商業政策　千家駒

怎樣學習「實踐論」　李達

「實踐論」與民政工作　謝覺哉

「實踐論」的基本精神　華崗

關於周代社會的商討　郭沫若

武訓生平的介紹和批判　謝興堯

「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　老舍、李何林等

共產主義原理　恩格斯原著　吳恩裕譯

斯大林發表語言學著作周年

蘇聯科學院院長發表談話

斯大林發表「論馬克斯在語言學中的問題」的著作已經一年了。蘇聯科學院院長涅斯米揚諾夫於最近對塔斯社記者說：斯大林的天才著作不僅使語言學發生了眞正的革命，而且對哲學、歷史學、文學、國家學說與法學明確地指出了發展的道路。這一著作對於一切現代自然科學也極爲重要。一年來蘇聯科學院舉行了關於科學上若干關鍵問題的廣泛討論。蘇聯語言學家已遵照斯大林的學說重新組織了全部工作，高等與中等學校也修正了語文的教學計劃及課程表，已有人撰寫了關於俄語及其他語言的基本詞彙及文法構造的論文。斯大林的著作，也給文學工作者提出了許多重要任務，今年五月間關於文學問題的討論，有助於深入研究馬列主義的文學理論，研究作爲社會意識形態的文字的特徵，注意作家的文字與風格，以及散文與詩的民族性與民族形式等問題。斯大林對語言學諸問題的科學的概括，他的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關於民族的形式及語言在社會史中所起的作用的學說，使歷史學、考古學及人種學得以新的方法進行研究。斯大林的這一著作幫助了蘇聯科學家與各種知識領域中的反科學的、唯心主義的觀念鬥爭。

阿Q是一個農民的典型嗎？

蔡　儀

由於武訓和「武訓傳」的討論，使我們對中國農民的英勇鬥爭的優良傳統，有了一個比較明白的認識；而且還應該使我們對於歷史上一般的具體人物，以至於文藝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也能夠有一個比較正確的看法才好。

關於阿Q，從來認爲他是一個農民，似乎少有懷疑的。可是現在就有許多人要問：『說阿Q是一個農民，是一種農民的典型，對嗎？』

對於這樣的問題，有一位同志曾說：『我們的農民是多麼英勇、智慧、勤勞，那裡像阿Q那樣的人物呢？那裡有阿Q精神呢？說阿Q是一種農民的典型，是侮辱了我們的農民。統治階級才有阿Q精神的醜惡特徵，阿Q只能說是統治階級的典型。』

另有一位同志又說：『阿Q確實是一個農民，而阿Q精神又確實是統治階級所有的，魯迅先生不過是藉一個農民的形象，把統治階級的性格的特徵集中地表現出來罷了。所以阿Q還不能說是農民的典型。』

這兩位同志的說法，是有他們的原因的，也是非常善意的，甚至是煞費苦心的。不過未必就是對的。因爲阿Q的實際生活是一個農民，這是我們應該肯定的事實；那麼阿Q精神就要認爲是一種農民的精神，這是我們應該承認的道理。固然阿Q會在最後的一段時間成了遊民，可是阿Q精神則是早已有了的；而個別農民的性格也有爲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所歪曲的，可是又一定有它社會生活的根源。所以從實際的社會生活來考察人物的性格，是唯物的歷史觀點所要求的，也是現實主義的文學觀點所要求的。

誠然，我們的農民在抗日戰爭中，在解放戰爭中，在抗美援朝運動中，表現得非常之英勇、智慧、勤勞，跟阿Q是完全不同的；也誠然，過去那些統治階級的人物，也處處表現着阿Q精神。但是阿Q時代的農民和我們今日的農民有其本的不同之點，就是當時的農民也有種種程度不同的覺悟，我們不能因爲他們都叫做農民，就認爲都是一樣的性格。以今日的農民來說，接受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啓發了高度的革命的覺悟，也經過了嚴格的革命的鍛鍊，和辛亥革命時代的農民是不能一樣看待的。即以阿Q所處的辛亥革命時代的農民來說，有不少先進的農民，參加了革命運動，成爲革命的一個主要力量；但是也有更多的落後的農民，對革命毫無認識，甚至於毫不關心，也就不能一樣看待。

阿Q精神，在沒落的統治階級份子也顯然有的，這沒有問題；但是落後的農民，特別是辛亥革命時代的落後的農民有沒有呢？我認爲不能說是沒有，而且從阿Q精神的本質來說，倒是當時落後的農民是比較普遍的。

所謂阿Q精神，究竟是怎樣呢？它的主要特點，一句話說來，就是精神勝利法。精神勝利法是阿Q精神的基本的東西，也是特有的東西。自然阿Q性格還是如一般實際存在的人物一樣相當複雜的；然而阿Q之所以成爲典型，則是精神勝利法通過種種條件的突出而具體的表現。他的自尊自負與自輕自賤固然是精神勝利法的主要的表現條件，他的排斥異端與「投降」革命也是精神勝利法的一個相關因素，至於怒目而視的怒目主義和「在肚子裡暗暗咒駡」的腹非政策，更是精神勝利法的最主要的現象了。

這樣的阿Q精神是怎樣的一種實際的社會生活的反映呢？不用說，是由於不能取得實際的勝利，只有實行這種精神勝利法以求得心理上的安慰和滿足。爲什麼不能取得實際的勝利而只有要求這種精神的勝利呢？這基本上是由於被壓迫者的實際的社會生活，使他們的反抗的力量不强，反抗的道路不明，於是縱想反抗，而不知如何去反抗，以致不能正當的反抗，也不敢正面的反抗。

一般的說，封建社會的農民，限於個體性的自然經濟的生活條件，他們各人只注意各人自己的小塊土地和少量的土地上的所得，只關心土質的肥瘠，水源的暢竭和晴雨的合適不合適，因此，他們的實際生活，主要是憑藉自然的恩惠，而不是依靠社會的關係。他們沒有廣大的眼光，也沒有偉大的意圖，甚至於他們的窮困、痛苦也不容易明白是從那裡來的。而且他們之間的相互的交往既少，相互的關心也就不深，於是他們縱有無窮的力量，也不容易結合起來，他們對壓迫者的反抗也就特別困難了。然而實際生活的窮困和痛苦，不容他們沒有對付的方法；這方法既不能求之於實際生活裡面，那就只有求之於精神生活裡面，就是徼天信神拜菩薩的宗教迷信，就是自欺自騙以求自慰的精神勝利法。其實宗教迷信、特別是死後天堂或來生富貴的說法，也是一種精神勝利法的表現。只是宗教迷信已有了一套表現形式，成爲實際生活的一部分；而阿Q

的精神勝利法還只是一種意識活動，可是兩者的性質是相同的。那麼精神勝利法是一般的封建社會落後的農民所自然有的，普遍有的。

若是他們所受的壓迫，嚴重到了無論如何也不能生活下去時，到了他們領會只是「靠天」沒有飯吃時，到了他們不須注意土地和其收穫、而必須另謀生計時，他們的眼光就會看得更遠，他們的心思就會用得更多，他們就會覺悟起來，於是宗教迷信或精神勝利法，一方面就暴露了它是和農民的實際生活與革命要求不一致、不相稱，另一方面它就必須也可能變質，成爲他們實際鬥爭的一種力量，歷史上農民革命和宗教的密切關係，阿Q的打算「投降革命」，幻想着「白盔百甲」等，就是很好的證明。雖然這時候的精神勝利法，它的性質有了一些變化，卻還是未能完全克服的。

我們中國農民的革命鬥爭，已有了兩千年的光輝歷史，而阿Q的時代正是緊接着太平軍、捻軍、義和團等偉大的農民革命運動之後，不少的農民反抗的意識增強了，覺悟程度提高了，所以他們踴躍的參加了辛亥革命運動；但是還有許多爲封建的農村生活所限制，爲封建的禮教思想所束縛，不知道革命，或者不知道傾向革命。卽是參加了辛亥革命的農民，其中又有許多是覺悟程度不夠的，不知道貫澈民主革命的要求，進行土地改革運動，以致辛亥革命隨資產階級的軟弱、動搖、妥協而失敗。

總之，辛亥革命時代也還有落後的農民，由於農村的封建的自然經濟的限制，雖有反抗意圖，不能取得實際的勝利，只好要求精神的勝利，於是阿Q就是這種落後的農民的典型。

然而，這不是說，只是落後的農民才有這種精神勝利法。不是的，正如封建社會的宗教，是落後的農民意識的一種表現，而封建統治者也常是宗教迷信的篤信者；精神勝利法又是落後的農民意識的一種表現，同時沒落的封建統治者也是常有的。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封建統治正在崩潰的過程中，他們的頭上又加上帝國主義的種種壓迫；而對於這種壓迫，他們同樣不知道如何去反抗，同樣不能取得實際的勝利，於是就只有要求精神的勝利，割地賠欵也好，卻要自稱「天朝」；打仗完全潰退也好，卻要說是「誘敵深入」，這裡就表現着他們的阿Q精神。然而他們對於被統治者在其尚未覺醒、尚未團結成爲強大的反抗力量的時候，可以任意壓迫、宰割，得到實際的心滿意足，所以他們不要自欺自騙以求自慰的精神勝利法；他們是把總、趙太爺之流，而不是阿Q。

這又不是說，阿Q精神完全是消極的、畏縮的，毫無積極的反抗的意義，不是的。阿Q的時代究竟是在封建社會的激變過程中，阿Q自己又是失掉了土地只是「做短工」的農民，甚至於最後一段時期不得不離開農村「上城」去，所以縱然阿Q在被趙太爺打了嘴巴之後，他不敢作聲；在「假洋鬼子」揮起「哭喪棒」要打的時候，他就抽緊筋骨等着；然而他還在心裡想：「被兒子打了」，「被孫子打了」，或者「被虫豸打了」。這種想法自然是一種反抗，不過是一種虛僞的精神反抗，不是一種實際的行動的反抗；而且這種虛僞的精神反抗，妨礙了實際的行動的反抗。這是阿Q精神之所以可笑、可憐、可鄙的根源，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之所以和實際的社會生活與應有的革命要求不一致，不相稱的根源，也是落後的農民之所以不能正確的走上革命，成爲堅強的革命力量的根源。辛亥革命的失敗就表明了這一點，而魯迅先生也明顯地看到了這一點。他的要寫「阿Q正傳」，正是爲了要教育落後的農民，叫他們拋棄精神勝利法，走向實際的革命鬥爭。

相反的，若說當時的農民都是英勇、智慧、勤勞，和今天有高度覺悟的農民一樣，那倒是抹殺了歷史的事實，沒有看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重要性，更不會理解毛主席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一指示的眞正意義。若說阿Q是魯迅先生藉一個農民形象集中地表現了統治階級的性格特徵，那就又會誤解「阿Q正傳」的傑出的價值，沒有領會魯迅先生的眞正的創作精神，更不可能知道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本質的特點了。

認爲阿Q是辛亥革命時代落後的農民的典型，或者說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正常的封建社會的農民所自然有、而且普遍有的，這是不是否認了中國農民的英勇鬥爭的優良傳統呢？或者是不是至少和承認中國農民的英勇鬥爭的優良傳統相矛盾呢？我以爲不是的。我們歷史上兩千年間的農民革命的英雄事蹟，史不絕書，是我們完全明白認識的。然而歷史上有落後的農民、或者革命的農民的意識中也有落後的一面，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肯定中國農民有兩千年的英勇鬥爭的優良傳統；不過農民英勇鬥爭的優良傳統至於有兩千年之久，也顯然是由於農民意識之中有落後的一面。

當然，我國歷史上的農民究竟長期地、英勇地鬥爭過，而由於他們的英勇鬥爭，推翻了許多罪惡的封建王朝，推動了社會的向前發展；他們的這種英勇鬥爭成爲歷史的主要動力。它是歷史的主流傾向，也是歷史上中國農民的主要傾向，我們首先必須肯定它，尊重它。也正因爲我們要肯定，並且尊重中國農民的這主要一面的優良傳統，我們還必須指出他們有過另一種傾向，雖然不是主要的，卻是對於他們的革命鬥爭的發展有妨礙的，必須予以克服的，只有很好的克服了這落後的一面，才能更好的發揚那優良的傳統。事實上他們的小的缺點並不足以掩蓋他們的大的優點，而我們的肯定他們有這落後的意識狀態，也就並不是抹煞他們的優良的歷史傳統。

眞摯和高貴的藝術

——「朝鮮衛國詩選」序言

鍾敬文

幾個星期前，黎風同志把他新編成的這部「朝鮮衛國詩選」的稿子交給我看。當時我沒有即刻翻讀它。這主要固然由於自己正在忙着別的事情，但是也多少由於沒有意料到這部詩選的動人力量。起初以爲它裡面只是一些普通的宣傳鼓動的詩篇罷了。一天，我打開稿本，剛讀了三、四篇，就感到自己以前對它重視程度的不够。全部讀完之後，我不能够抑制自己的情緒，兩遍三遍地重讀了它。

過去，我們一般文化工作者，對於朝鮮這個兄弟隣邦的許多事情，實在知道得不多。自去年秋天以來，雖然這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在範圍上，在程度上，還是不够的。由於這部詩選，使我對於隣邦的一般情形和新文藝，得到了很寶貴的認識。爲着宣佈我的感受，爲着使大家更進一步理解及認識民主朝鮮的精神和藝術，我有義務在這裡說幾句話。

× ×

這裡一共集錄的不過十首詩。在數量上看是很微小的。而且這些詩都是經過翻譯的，原來的氣味和光彩多少不免有些「走動」（雖然我們十分感謝那些辛苦的翻譯者）。但是，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些很眞摯和高貴的藝術。因爲它給與我們飽含熱情和理性的光輝的現實抒寫。它使我們看到並且仇恨那些來自西半球的惡煞凶神，它使我們看到並且崇敬那些朝鮮的倔强的人民和戰士。它把我們帶入崇高和戰鬥的氣氛中，使我們的精神高擧起來。

美帝國主義者在朝鮮所演的罪惡劇，是超越一切歷史記錄的。他們毀滅城市，毀滅村莊，他們屠殺和平居民，屠殺兒童和老人，使朝鮮血流成溝，遍地荒凉。這是難以形容的逞兇！在這個詩選裡，有不少令人看了切齒的記述。讓我們隨手引用一兩節吧：

就是你，

把黑色的槍靶子牌
掛在朝鮮人民的胸前。
許許多多活槍靶……
革命的血紅的心，
在槍靶牌子後面跳躍，
你瞄準了槍靶，
不使一個子彈從旁邊穿過。

就是你，
用手槍瞄準了
哈哈嘻笑的小孩，
他們跳過來拿了你的糖果，
還來不及看一眼，
就臥倒在血泊裡。

（「不許干涉朝鮮」）

這兩節詩，沒有一些藻飾的描寫，而且說的是一些「小事情」，但是，單憑這些，我們已經可以感覺到那些自號「文明」的美國生番，實際上是怎樣兇殘了。「你想播種死亡，你要到處製造沙漠，你決定使用馬鈴薯甲虫來拯救自己。你的漆黑的靈魂，是一切瘟疫與細菌的窩藏。」這種指責是沒有什麼「詩的誇張」的。

毀滅和屠殺，是接近死亡的帝國主義者的僅有的法寶。他們以爲一使用起它來，「敵人」就會身不自主，顫巍巍地跪下求饒。但是事實却違反了他們這種「美好的」願望，它只有喚起朝鮮人民普遍而强烈的憤怒和仇恨。

瞧瞧而臉！
在敵人的轟炸下，
在火燒的城市裡，
把這個國家的人民的面龐瞧瞧！
不是在天上，
而是在人們的眼睛裡，
青色電光在迸火，
正像飛箭般犀利的眉毛，
憤怒之色充溢的額頭呀！

（「寫在火燒的城市裡」）

這是何等痛苦而又剛健的表情！今天的朝鮮人民，不但把「眼淚忘得乾乾淨淨」，也不僅用「無限的憎恨的火焰」去把敵人的「屍體燒盡」。美帝國主義者狂暴的毀滅和屠殺，把朝鮮愛自由、愛祖國的人民和戰士教育得更加勇敢、更加勤勞、更加團結、更加聰明靈巧了。

救護隊員們遽然站起來了，
帶鐵鏟的男人，
拿鶴嘴的女人，
青年復舊隊和女盟救護隊的隊員們，
爲了營救生命，
爲了搶救人民生產，
猛然站起來了呀！

（「寫在火燒的城市裡」）

朝鮮的人民不但在救護和復舊等工作上奮力，他們更踴躍地加入鋼與血的戰鬥。他們或者「朝向釜山、馬山，朝向南邊挺進又挺進」，或者「在敵人的火力點之前，和手榴彈一道英勇地爲祖國犧牲」。他們即使不幸被逮捕了，在行刑的時候，也會「毫不畏懼地向着絞台走去」。真的，正像詩人所歌詠：

全世界都已看到——
在朝鮮英雄無算；
在朝鮮，我們有馬洛特索夫，
在朝鮮，我們有克拉斯諾頓好漢，
丹娘也參加到游擊隊去復仇。
被號召和列寧格勒人一樣去戰鬥——
對我們，這便是最高的榮譽！

（「走向新的勝利」）

這是一切愛自由、愛和平的人士所關心和鼓掌的事情，但是在華爾街的喝血巷鬪和他們的鷹犬的心裡，却是不容易瞭解的。因爲他們所預料的（同時也是期望的），只是「朝鮮由於恐怖，必然放下武器」。不瞭解，還是小事，最使他們頭痛的，却是他們播種的災難，將由自己去收穫。聽啊！

在我們神聖的土地上，
你們所投擲的炸彈，
已經引起了不能撲滅的火焰，
美國人啊，將要燒到你自己了。

（「不能撲滅的火焰」）

朝鮮的人民，今天正在受着空前的浩叔。他們正在作着極其艱苦的鬥爭。但是，他們是樂觀的。浩规並不能使他們屈服，苦鬥也只有使他們更加堅強而充滿自信。他們知道敵人的命運，他們更瞭然看到自己民族的前途。光明，終歸是他們的。自由，終歸是他們的。因爲他們不但站在公理與正義方面，而且萬衆一心地在進行着英勇堅毅的戰鬥。

我知道，城市會重新建起，
每寸土地都會恢復。
……………
勝利的日子會帶來喜悅！

（「一座城市」）

一切善良人士同樣相信，正直和忠勇的朝鮮人民，是一定能爭得美麗的明天的

。美帝國主義者，儘管狡猾，儘管橫蠻，儘管握有那些銳利的武器，但是歷史卻判定了他們的死刑，不只是少數人的死刑，而是一個階級的死刑，一種社會制度的死刑。要用剿滅英勇人民來解救自己的沒落，要挽着人類前進的大河使它倒流，美帝啊，這是何等痴愚的妄想和徒勞的行動！

在這十篇詩裡，詩人們有力地唱出一個民族的災難，他的戰鬥與前途。這是民主朝鮮的忠實的聲音。這是他的控訴書，他的英雄紀錄。這種民主的和戰鬥的藝術的標本，對於今天全世界愛自由與民主的人士，必然要喚起他們的高貴靈感，喚起他們對於朝鮮的人民和文藝的無限尊敬。

× ×

這些詩篇，怎麼會有這種成功？它的根據在什麼地方呢？這是大大值得我們思索的。我不認識這些詩人中的那一個，也不知道這些詩人的生平和他們創作的詳細情形。但是，從今天朝鮮的政治和文藝界的一般情況看來，從這些詩裡所表現的情景和思想看來，大致上，我們是能說出這些詩人成功的秘密的。

這些詩人是和他們祖國的人民密切結合着的（至少也是跟人民站在一邊的）。朝鮮的人民有着光榮的戰鬥傳統。在一九一〇年，日本帝國主義者橫暴地吞併了朝鮮。日本帝國主義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同時也是極毒辣的帝國主義。它對於朝鮮的統治，不折不扣地是一種惡毒的統治、血腥的統治。它不但剝奪朝鮮人民一切政治和經濟的權利，連他們固有的語言和地名等也要迫令改變。但是他們並沒有屈服。三十多年中，朝鮮優秀的愛國志士和廣大人民，一步進一步地在對異族統治者進行着無情的鬥爭。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解放，固然由於蘇聯紅軍的英勇和仗義，但是朝鮮人民和民族英雄的熱血、鬥志是不能忘記的。不幸的朝鮮人民，剛剛從狼窩裡逃出來，即刻又碰上老虎。美帝國主義者和他的走狗李承晚要把南朝鮮的人民從新奴役起來。可是，跟過去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樣，朝鮮人民決不肯對美帝國主義者低頭。他們最初抗議、罷市、罷課、暴動，終至發展成如火如荼的普及各地的游擊活動。去年六月下旬，美帝國主義者悍然指揮李匪軍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後，北朝鮮的廣大人民更掀起了壯大無比的愛國熱潮。他們或踴躍參軍，或努力救護，或拚命生產。他們用堅强的行動答覆了侵略者。而南朝鮮的人民也一樣不斷用實力去打擊那些野心狼。朝鮮的人民一直在戰鬥着，而今天戰鬥得更加豪勇。

許多朝鮮的文藝工作者，在戰事一開始，就跑上了各種戰線。他們不但跟政府和人民一條心，而且實際地給人民軍及廣大人民作種種急需的服務。他們在前線工作的，有的受了傷，有的竟壯烈地犧牲了。我們過去讀西洋的文學史，常常感嘆和羡慕拜倫、裴多菲等詩人的俠義和英勇。在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時期，看到蘇聯許多文藝工作者勇敢地跟人民一起戰鬥，我們也很感動和欽佩。但是，在今天的朝鮮，像這樣的壯舉，差不多要成爲平常事情了。民主朝鮮的詩人們，由於他們跟祖國和人民很密切地結合着，因此，就能够創造出這樣真摯、深刻的詩篇，這樣噴射着正義的火焰和藝術的香氣的詩篇。

其次， 這些詩篇的作者大都是受着本國的及外國的進步文藝傳統的培育的。在朝鮮過去許多民間口頭創作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古國的人民的民主思想、愛國熱情、伶俐的智慧、和美妙的藝術才能等。他們雖然受着重重壓抑和排斥，到底却憑了他們自己創造的文藝顯示出精神上優異的性質和力量。本世紀的二十年代，是朝鮮人民新的政治、文化運動的躍進時期。由於本國現實情勢的要求，由於國際（特別是蘇聯）進步的文化藝術的刺激，在朝鮮勞動總同盟和朝鮮共產黨等民族民主革命組織成立之後，就產生了無產階級的文學運動。雖然遭受日本帝國主義者殘酷的壓迫，進行上不能够很順暢，但是到底曲曲折折地在發展着。到了八·一五解放後，朝鮮文藝界就結成廣大的統一戰線，確定了共同努力的目標。他們決心掃清帝國主義思想的毒素，反對腐朽落後的國粹主義，創造民族的大衆的新文藝。他們勇猛地爲年青的充滿希望的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建設而努力。當美帝國主義者發動了侵略北朝鮮戰事之後，進步的文藝界更加發揮着戰鬥的精神。詩人、小說家、戲劇家、電影員等都參加各種戰線，努力寫作或表演暴露敵人罪惡、表揚人民軍的英勇和人民愛國精神的作品。這個詩選裡的詩篇，正是在這樣的傳統和現實情況中產生的。它不但是朝鮮人民的忠實心聲，而且是朝鮮民主藝術傳統的優秀兒子，是今天世界光輝的進步文藝的一部份。

× ×

在爭取世界和平，反抗美國法西斯武裝侵略的戰場上，我們的人民和文化戰士正在跟民主朝鮮的人民和文化戰士並肩戰鬥着。今後兩國的廣大人民和文藝工作者，在相互的理解、友愛、尊敬和學習上，自然要更加增進吧。這個詩選，在這方面，無疑是會盡相當作用的。

一九五一、勞動節第二天鍾敬文於北京

附記——「朝鮮衛國詩選」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部刊行。

學術討論

本欄的增闢，是爲了對各種重要的學術問題，展開自由討論，和培養學術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風氣。——編者

舊意識的沉澱和死亡

謝逸華

在「新建設」三卷六期中，黃藥眠先生發表了一篇題爲「意識狀態試論」的文章，他認爲由於生活不斷的改變，舊意識被新意識所壓迫，就不斷的層積下去，日子久了，而沉澱到下意識裏去，於是黃先生認爲：『這個潛伏下去的意識並沒有死亡。』『這個下意識在這個人的意識上，還是起着若干作用的。』『將舊意識只看爲沉渣，不會死亡，還能起若干作用，而一碰到外在的環境變得有利于它時，沉渣就會泛起，舊意識又會『由潛伏情況而突然出現，形成兎起鶻落的狀態』。我以爲這是不可一概而論的。

意識有着層積狀態，這不錯，但如果以爲所有的舊意識永遠都是沉澱着，那就錯了。潛伏下去的意識，也有着暫時沒有死亡的，這不錯，但如果以爲所有的潛意識都沒有死亡，那也錯了。說下意識在某個人的意識上還起着若干作用，這很對，如果說，任何下意識都還起着若干作用，那就不對了。

一、我們看舊意識是不是都沉澱着，而形成層積狀態？人的意識是決定於他的社會存在，意識乃是存在的反映，一個人生活在特定的階級中，日子一久，就形成了一定的生活習慣和方式，而也就從這種生活習慣和方式出發，去認識世界，去改變世界，因此人的意識是階級的產物，而又轉過來爲階級服務的。

但社會存在經常是在矛盾中發展，階級鬥爭也在激烈地進行着。舊的社會和階級在矛盾中是衰落下去以至于死亡了，而新的社會和階級也在鬥爭中崛長起來，在新社會裏面，舊階級是死亡了，舊的生活方式和習慣被完全改變爲新的生活方式和習慣。這種改變，最初是漸變的，舊的生活方式，由於阻礙了新社會的發展，不斷地逐漸地被壓制下去以至不斷地被打破，但也是突變的，到某一個時候，舊的生活方式及習慣，就被完全改變爲新的生活方式和習慣。

新的生活產生了新的意識，這種新意識因爲是新生的，所以是强有力的，是不可戰勝的，舊意識由於不斷地受到這種强有力的新意識的打擊，就不斷地沉澱下去，而這沉澱下去的舊意識，有的是被冲掉了，有的由於暫時找到了掩體，或者也能偶然地層積着，甚至還偶然地有機緣重新泛起，進一步說，即使能泛起了，但在激烈的鬥爭中，由於身衰力竭，不得不成爲敗者，又不得不沉澱下來，而被冲洗掉。在意識的長河裏，一場大雨，强力的激流就可以把所有的舊渣滓冲刷得一乾二淨。因此說，舊意識的層積狀態，只是暫時的，是偶然的，而不是永久的，不是必然的，舊意識的沉澱，是漸變，舊意識的被冲刷，是突變，舊意識沉澱下來，被冲刷乾淨，它的發展過程，就是如此。

二、意識有沒有死亡？黃先生說：『潛伏下去的意識並沒有死亡，一碰到外在的環境稍稍變得有利于它，或新的意識監視不十分嚴密的時候，它就又會浮了起來，……有些意識則又因得到機會而由潛在的情況而突然出現，於是，就形成兎起鶻落的狀態。』

上面說過，意識是被社會存在所決定的，意識有沒有死亡，應先看社會存在有沒有死亡。我們知道，任何一件東西，都經歷着出生到死亡的過程，舊的死亡，新的誕生。社會存在不能例外，階級不能例外，從而，意識也不能例外。一個舊社會死亡了，舊階級死亡了，作爲舊社會階級產物的舊意識，因爲失去了生存的基礎，當然終歸不得不趨於死亡。

假如說，舊意識也有得到『由潛在的情況而突然出現，』『形成兎起鶻落的狀態』的機會，那這機會就是新舊的無限循環復歸，舊社會舊階級受新社會新階級的打擊而潛伏下去，但沒有死亡，將來又可以東山再起，取新社會新階級的地位而代之。可是，這種機會是永遠也不會有的，客觀存在是在矛盾中發展，但不是在循環復歸，舊的衰落下去，必至於死，而不能重生，新的是永遠也不會給舊的『兎起』的。舊的也無力使新的『鶻落』的，具體的例子是：比如封建社會所產生的那種『三從四德』的舊意識，到現在，可以說是死亡了。假如說它還沒有死亡，還有機會突然出現，而重登人類意識寶座，那就等於痴人說夢了。

當然，對自然之反映于人的思想中，我們不應該抽象地去理解，以爲人類意識的發展都是直線的，沒有矛盾的。一個階級以及這階級的意識，雖然是被規定於客觀存在，但總還是能動的，而不是純被動的，舊階級是衰亡了，但它總不甘心衰亡，總是力圖掙扎，舊意識也是這樣。不過，這種掙扎只是臨死前的掙扎，被捲到漩渦裏去的時候，即使抓到了偶然漂來的一株浮草，即使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是也不能逃脫死亡的，「五四」以來，就有不少的舊意識是死亡了，即是明證。

三、舊意識的作用問題，黃先生說：『下意識在這個人的意識上，還是起着若干作用的』，我認爲，對某些人說來，舊意識的確起着若干作用，甚至是很大的作用，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卻又完全不起作用了。意識對於存在，起着能動的作用，這是大家都承認的。在新舊交替的時候，和舊階級的激烈反抗新階級這一事實相照應，舊的意

識也在激烈地反抗新意識，舊意識在爲舊階級服務，它在力圖使未死的拖延死期，妄想使方生的不能出生，在這種情形之下，舊意識是起着很大的反動作用的。

因爲意識經常是落在客觀存在的後面的，社會是從舊的走到新的去了，但是意識却未能立即跟上去，舊意識仍是潛伏着，暗中在左右着人的行動，它不是改頭換面，『把舊的思想滲透到新的思想裏面去，或是把舊思想化裝成新思想』，就是幻想等待有利時機，陰謀復辟，從舊意識的復辟去達成舊階級復辟的目的。這是新社會裏舊意識的反動作用，這是我們不但要消滅舊階級，而且要消滅舊階級裏的某一些頑固份子的原因。

也有些舊意識，因受舊社會長期的薰陶，多少呈現着凝固狀態，或者說起沉澱作用呈現着層積狀態。因而對新社會的適應性就比較差，對新意識的接受就比較慢，在這種情況之下，舊意識也是起着若干壞作用的。

但舊社會轉變爲新社會不是和平漸進的，而是鬥爭的、躍進的，同樣，舊意識轉變爲新意識，也是如此。沒有進行鬥爭，舊的意識總無法沖刷盡淨而仍是潛伏着，如果經過了長期的激烈鬥爭，那麼取得了新的意識，而舊意識就完全不能起絲毫的作用了，比如有些小資產階級甚至是地主階級出身的老幹部，他們的舊意識，就不再能潛伏着和對他起什麼作用。

當然，部份舊意識，假如在新社會中仍有着歷史的作用，仍有暫時存在價值的話，那它是不會沉澱，暫時也不會死亡，而它對社會所起的是好作用，而不是壞作用，反之，就會沉澱下去而被沖刷盡淨，就會由有作用進爲無作用，而終至于死亡的。

總括來說：舊意識由於新社會的到來而失去了存在的價值，經過漸變突變，經過鬥爭，就從有作用走到無作用，從沉澱走到被沖刷，從發生必然地走到死亡，對於舊意識，我們固應注意它的潛伏、未死、和反動作用，但也應建立信心，使它起不了大作用，而必然地趨於死亡，更應該爭取和把握從舊意識到新意識的轉變及其過程。

我的意見和黃先生的意見或者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也許可以說只是一種多餘的補充，對與不對，尚請黃先生及讀者指正。

一九五一、四、二十一、於廣西南寧

關於後天獲得性和人的階級性

陳安湖

黃藥眠先生最近在「新建設」三卷六期上發表了他的創作論的一段，取名「意識狀態試論」，開頭這樣說：

「一個人，一生下來，就是在一定的社會、和一定的階級環境中長大，所以他的生活也隨着他出身的階級、階層而有所不同。據最近生物學的研究，連後天獲得性，也還是可能遺傳的。這樣說來，就是在先天的遺傳中，也包含有若干階級性了。」

米邱林和李森科的生物學說，確是證明了生物體的後天獲得性可以遺傳，現在我們已介紹得不少了。但黃先生根據這生物學說，進一步來斷言人的階級性也可以遺傳，說是「在先天的遺傳中，也包含有若干階級性。」這却不知道是甚麼道理。照這種說法，那末，所謂人的階級性，也就變成了生物體的後天獲得性，可以影響生物體的體質，並且由親體傳給子體，由先一代傳給後一代，代代相傳，無法避免，除非生物體和其所必需的生活條件發生矛盾，使這種遺傳性改變過來。如果父母是地主階級，兒女生下來，即使還沒有受到地主階級的教養和影響，純然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嬰兒，也在他的體質裡存在着地主階級的思想意識；父母是資產階級，也同樣的會使他們的嬰兒受到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遺傳，甚至嬰兒還在母體裡，就已經有階級的思想意識了。

黃先生沒有詳細地解釋階級性遺傳的道理，這在他那短短的一段文字裡，大約也是不可能的。但照我看來，人的階級性和生物的後天獲得性，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屬於不同的範疇，把它們混同起來，是不對的。劉少奇副主席在「人的階級性」一文中，這樣說過：

「人有兩種本質：一種是人的自然本質，即人的體質、聰明、健康，及本能等（比如在醫學上就有各種體質的人）；另一種是人的社會本質，即人的心理、思想、意識、觀點，習慣及其要求等。」

很顯然的，所謂獲得性，只是生物的自然本質，並非社會本質。同樣，人的階級性也只是人的社會本質，並非自然本質，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我們不能以爲：獲得性的產生和消滅與階級性有着完全一樣的過程。

在生物學上，獲得性又叫習得性，是指生物體在與其周圍環境不統一時所產生的一種變異的性質。李森科說：

「當生物體找不到它們所需要的條件，並且不得不同化在某種程度上不適合其本性的外界條件的時期，就產生着與前一世代或多或少不同的生物體或其身體底個別部分。如果身體已經變化的部分是新世代底起點，那麼，新世代按其要求及本性，將在某種程度上與前一世代不同。」「身體已經變化的部分底物質，其參加到形成生殖的有性細胞與營養細胞（Vegetative Cell）的全部過程中去的程度，將決定變化之遺傳的程度。」（見李森科著，李何、獨伊譯：「生物科學狀況」四九頁和五二頁）

從這裡，我們可以認識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後天的獲得性，是生物體的一種形狀上的變異，而且這種變異的能否遺傳，要看它是否影響到生物體的生殖的有性細胞與營養細胞，如果影響不到，還是遺傳不下來的。在這一點上，獲得性與階級性就有着絕大的差異。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階級性不同的人在體質上有着什麼不同，也沒有看見過一個從這一階級轉到別一階級的人，身體的各部分前後起了什麼變異。因爲所謂階級性，是意識形態上的事，正如劉副主席所說，是「人的心理、思想、意識、觀點、習慣及其要求等。」這些東西，無論怎樣不同或變化，也決不會影響到各種人的體質，更沒有作用於人的生殖的有

性細胞與營養細胞，因而也不能遺傳。要不然，在我們這樣的複雜的階級社會裡，就儘是一些奇形怪狀的人了。

黃先生所以說「在先天的遺傳中，也包含有若干階級性」這樣的話，就在於：第一，他忽略了——或者看不清楚人的自然本質與社會本質的根本區別；第二，他不知道人的社會階級性只是意識形態上的事，無論怎樣變化或發展，都與人的體質毫不相關。

在現在，以進化論的道理來解釋人類社會，大約誰都知道是謬誤的了。這樣的結果是把社會的本質掩蓋起來，使人們看不清社會階級的分歧，因而失去了鬥爭的方向。現在黃先生拿生物學上的道理來推論人的階級性，我覺得也不免有着這樣的毛病，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這是我讀了「意識狀態試論」後的一點感想。自然，我的意見，未必正確，希望黃先生和讀者們給我提意見。

關於「意識狀態試論」的檢討

黃藥眠

在「新建設」第三卷第六期我發表了一篇「意識狀態試論」，這一篇短文引起了好幾位讀者的批評。讀了這幾位的批評文章以後，我自己反省了一下，的確是有很多錯誤。

首先，我在文中說，『就是在先天的遺傳中也包含有若干階級性。』這是很大的錯誤，儘管我加上了『若干』字樣。因爲不論怎樣解釋這種說法，都會把我們引向到以前盧那卡爾斯基所犯的錯誤上去。尤其重要的是我這種說法，會令人覺得，階級是無法轉化的，因而把改造知識份子的意義抹煞了。

其次，我把這一個階段底論述拿來單獨發表，是很不對的，原來我的提綱比較長，而我拿到「新建設」去刊載的，只是其中的一段。在原來的提綱裏，在這一段之前，我有一段是專論階級轉化之客觀的社會基礎，和主觀的因素，最後歸結到舊階級底消滅，和舊階級意識底死亡，以至階級底消滅，和階級意識底死亡。而「新建設」所發表的這一段，我的主要的目的是用來說明一般的意識狀態和說明知識份子改造底過程爲什麼需要較長久的時間。雖然，我在原文末了兩節也會提到『經過長期生活的鍛鍊，把層積着的潛在意識和思想、意識形態統一起來使它服從思想指導』；『正確的思想……幫助作家批判自己，清洗潛伏在意識下面的前意識和下意識』，但是因爲我割去了上面肯定階級轉化和知識份子改造的可能性的前一段，而這一段單獨發表出來，於是就使這篇文章好像專門強調階級轉化底困難似的。其實，我應該先把階級底轉化，以及知識份子改造底可能性肯定下來，然後再進一步來論述到這種轉化底過程，再然後論述到舊階級和舊意識死亡之必然性，這樣邏輯上也許比較完整一些。但我沒有這樣做，我只把中間的一段挖出來發表一下。這是不妥者一。其次，我這篇文章上半截好像是泛論一般的意識狀態而下半截又好像是論述在轉形期中意識裏面矛盾底諸規律。這樣籠統的說，也是很大的缺點。因爲我沒有把階級矛盾和鬥爭比較和緩時期，和社會大變革時期分別開來談。大家都知道當社會大變革時代，人們的意識變化是很激烈的，企圖用『層積』字樣去形容這個時期的人們的意識狀態是很不够的，特別是今天，我們對人們的意識狀態決不僅是讓其跟着社會下層建築底變革而自然發展，以達到相適應的變化，不，我們對於各種人的意識狀態，是要根據一定的方針來加速它的變革的。這一點，我沒有提到。這是不妥者二。還有，就是在社會大變革時期，各個階級底意識狀態的變化亦各有不同。而我在那篇文章裏只籠統地說到由舊生活過渡到新生活，新舊意識發生激烈的矛盾而沒有指明舊生活是誰的舊生活，新生活是誰的新生活。這是不妥者三。

再其次，在我這短短的提綱式的論文裏面，整個精神都偏重於客觀的敍述和描寫，而沒有強調地指出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思想改造過程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說沒有指出意識轉變之主觀能動性。不錯，舊的思想是終於要死亡，但思想鬥爭乃正是加速新底生長和舊底死亡之有力的武器，也是暴露和發掘潛藏在意識深處的不正確的思想底武器。這一點，我沒有提到或者是提到了而沒有強調，這也是不對。

我還有一點，要附帶在這裏說明。大家都知道舊社會死亡了，舊的思想是或遲或早終要死亡。思想是客觀事物的反映，這都是不錯的。但這並不等於說，客觀事物變了，思想也就立即會變過來。思想底轉變還需要經過思想本身的規律性，這裏需要有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過程。因此，我原來的那篇短文上所說的『但這潛伏下去的意識並沒有死亡』如果改爲『……並沒有立即死亡』，和第四項所說的『他還在暗中左右人的行動』改爲『可能在一定時期內他還在暗中左右人的行動』，這樣也許大家能够同意罷。這種說明，我覺得還是必要的，因爲這正所以表明思想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並從而加強我們對於這方面的警惕。人本身也是歷史地發展的。我們看一個人當然從他今天所站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來估計，但他的過去的生活的歷程，也應該是作爲衡量一個人的重要因素。

至於形象底思惟，那就更複雜，因爲這包括對事物的感覺、表象，以及生活習慣和情趣等。（即我所說的意識狀態）要這些感覺和情趣都改變過來，那就需要更長的時間。所以除了理論認識，思想鬥爭以外，還需要生活的鍛鍊。

我原來那篇稿子，原是讀書筆記式的一種提要，因此沒有很周詳的計劃和完整的結構，有許多地方也沒有展開，而只是有一條條的要點，因此也就沒有把道理說清楚。寫好了以後，在抽屜裏放了許久，原來也並沒有想拿去發表，後來因爲一時無稿以應編者之邀，就把這個舊稿中的一段拿出去。在發出去之前，又沒有很好的看過，這是很大的不應該。最近，承各位讀者指正使得我能够很快的改正錯誤，這是要感謝大家的。

論希臘時代藝術與資本主義時代藝術

王英白

藝術是意識形態之一種，它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屬性，而這特殊的屬性，又是通過歷史的具體形態而顯現的。而我們對於某一時代，社會的藝術創作的評價，則是依據着一定的標準，這個標準在基本上來講，就是現實主義的藝術觀點。在考察某一時代，社會的藝術價值——健康的，還是腐朽的？進步的還是落後的？主要是根據這種藝術本身所具有的現實主義人民性的品質如何而評價的。同時我們也已經理解了這一點，即藝術的發展過程，就是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具體反映。一部社會發展史，既然是階級鬥爭史，那末藝術本身的發展，也就是反映了這個階級鬥爭的過程。因此從古代希臘奴隸社會起始，直到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爲止，在藝術發展史上，存在着兩種基本對立的傾向，一種是現實主義的藝術，另一種便是反現實主義的唯心主義的藝術。這與階級社會中，被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之間的鬥爭，是完全相適應的。藝術的這兩種基本對立傾向，在大希臘時代是具備着的，同樣在資本主義時代也是具備着的，如果我們說資本主義時代的藝術比希臘時代的藝術爲進步，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必得根據這兩種不同的傾向分別來談。比如說：文藝復興時期以及啓蒙主義時期的藝術，例如：拉飛爾、達文西、米蓋朗吉羅，乃至於緒丹，這些偉大藝術家的彫塑繪畫，是要比古希臘時代的藝術——彫塑繪畫，更充實些，更完美些。上昇時期的布爾喬亞階級的文學創作，例如莫里哀、拉辛、巴爾札克乃至於狄更斯諸人的著作，當然也要比古希臘時代的悲劇，喜劇以及史詩更具有普遍的深刻的現實性。這是就各個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中，現實主義藝術的發展系統而言是如此的。另外一方面就各個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中，反現實主義的藝術發展系統而言，也是如此的。中世紀神學思想所創造的「唯一的肯定的典型」，「上帝之子基督」，當然超過了柏拉圖的抽象思維觀點。而遠從古代埃及就出現了的「賊的故事」，在其發展上，也遠不及封建貴族階級的「騎士小說」，以及當代歐洲資產階級的惡棍小說，偵探文學。同樣希臘時代，代表貴族奴隸主階級的女詩人薩福的詩，無論在質上，在量上，也不會趕得上近代資產階級浪漫頹廢的詩人例如：諾娃麗斯以至於波特萊爾。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社會發展各個不同的階段中 ， 兩種對立鬥爭的藝術傾向，對其本身發展系統來講，只有相對的意義，而對於相反的傾向發展系統來講，其意義却是絕對的。若說資本主義時代藝術，比希臘時代藝術進步，那祇能是在現實主義藝術傳統的發展上，或者從反現實主義的藝術傳統的發展上來講，二者必居其一。資本主義時代反現實主義的藝術，雖然比希臘時代的更爲進步和發展，但比起古希臘時代的現實主義藝術，它反而一定是落後的。古希臘時代的現實主義藝術，雖然是一種樸素的現實主義創作，基本上是存在着濃厚的神秘彩色，但和資本主義時代的反現實主義的藝術比較起來，那仍然是豐美得多，充實得多，也就是進步得多的。

應當着重地指出：我們一般所說希臘時代藝術，是指着希臘時代藝術中屬於現實主義這一傾向的，即古代的古典藝術而言，並不包含反現實主義的唯心主義傾向的一面。同樣，當我們談到資本主義時代的藝術，主要是指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的藝術而言，也並不包含資本主義時代藝術中，屬於現實主義傾向的那一面的。因爲在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的藝術，就是佔有統治地位的藝術。希臘時代的藝術，基本上我們是肯定它現實主義的一面，資本主義時代的藝術，基本上我們是肯定它反現實主義的一面，只有根據這樣的一個認識，才可以判斷何者前進，何者落後，假若忽視這個問題而籠統地判斷說：『希臘時代藝術比資本主義時代藝術爲進步，那是與社會發展規律不合，而且也與事實不合的。』這說法是危險的，因而也是值得考慮的。

談到這裏，就不能不涉及到一個基本理論的問題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經明確地指出：物質生產雖然是藝術生產的根本決定條件，但藝術生產發展水平，却並不完全與物質生產發展水平相適應。馬克思說：『關於藝術，誰都知道，它的某些繁榮時代，並不是與社會底一般發展相適應的因而也不是與那可以說構成社會組織骨幹的社會物質基礎相適應的。例如希臘人與現代人之比較，或者莎士比亞與現代人之比較』。這就是說，儘管物質生產水平很低的時代，例如古希臘奴隸社會，却產生了極其燦爛的藝術。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儘管物質生產水平很高，却產生了庸俗惡劣的藝術。事實證明，馬克思所發現的這條科學法則，是完全正確的。在物質生產水平極爲低落的古代希臘奴隸社會，出現了流傳千載的史詩，奧德賽、伊里亞特；維娜絲、阿婆羅的彫像，還有那反映了古代人與神之間的偉大鬥爭，顯示爲古代人類自覺精神集中化身的形象「普羅美修士」。這許多不朽的藝術作品，正如高爾基所說：「都是理想和直覺 ， 思想和情感，混合在一起而創造出來的。這樣的混和，僅只在創造者直接參加創造現實的工作，參加革新生活鬥爭時方有可能」。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些舉世知名的偉大的古典藝術都是具備着一種無與倫比的優越性。

古代藝術的這種優越的品質，具體地說，究竟是怎樣的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解釋是：古代藝術的優越的品質，乃是表現在內容與形式的和諧一致 ， 感性與理性，自然與精神，主觀與客觀，都呈現出一種微妙的融合。柏林斯基指出說：『現代藝術的特質是內容的重要性超過了形式，而古代藝術的特質則是內容與形式之間，保持着一種平衡。』日丹諾夫在蘇聯音樂家會議上的演說裏，對於大衆藝術之一的音樂藝術 ， 曾經做了最好的評論，他

說：「古典音樂的特色是真實性與現實主義。是善於達到輝煌的藝術形式與深刻內容之和諧一致。把單純與平易性和最高的技巧結合起來。」這雖然是指着古典音樂藝術而言，但實質却是一般的古典藝術的品質的最深刻、明確的概括。日丹諾夫規定了古典藝術的生命是奠基在「真實性與現實主義。」這和高爾基所說：古代藝術的創造，「在自己的基礎上乃是現實主義的」說法完全相同。

當然我們也決不否認，古代的古典藝術，由於決定它的物質生產水平的限制，也自有其一定程度的缺陷。因為，這個時期人類的創造精神，還沒有發獲自然，支配自然，致受種種自然條件的束縛，因而在藝術創造活動中，經常流露着一種神秘的宿命的色彩，同時並表現為一種天真性與樸素性。但我們並不能從此得出結論說：古代藝術幼稚得不行。常任俠先生說：「希臘時代藝術，誠然有其很好成績，但也只是在那個時代所創造的成績，因為它是古典遺品，又很完美，所以我們現代便很寶重它」。這種說法，與其說是對於古典藝術的肯定，倒不如說是否定，這是一種輕率的判斷，應當加以適當的修正的。

至於資本主義時代的藝術呢？據常任俠先生說：「技巧」是進步的，「題材」也複雜得多。古希臘的彫刻「取材」多是「白色大理石」，「造形均用廓光技法」。而資本主義時代「便不止大理石一種」，「用各種材料」，「各種手法」。「至於內容意義方面，那自然是隨着社會的發展，更為進步的。」

資本主義時代藝術創作所用的「材料」，「技巧」，「手法」，比起古代藝術創作要進步，要複雜，這是事實，但我們對於藝術的評價，主要的並不是根據這些「材料」，「技巧」，「手法」，而是根據藝術本身的「內容」，「品質」，即「真實性與現實主義。」常先生不從藝術的內容品質出發，而從形式出發，這是成問題的。這種看法，恰好就是強調了現代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的藝術。單純從形式來看，古希臘的史詩和悲劇，一定是不及資本主義時代的小說和電影。隨着具體的歷史階段不同，藝術形式當然也就不同，但却不可以根據這種形式的不同來斷定何者前進，何者落後。假如主要地是從藝術的內容品質出發，而不是單純地從「材料」，「技巧」，「手法」的形式出發，去觀察物質生產水平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藝術，我們就可以看到，資本主義時代藝術的「內容和意義」，並非是隨着「社會的發展更為進步」，恰好相反，而是充滿了腐朽的，罪惡的落後性與倒退性。

是的，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也有過自己的偉大的文學藝術，這就是文藝復興時期，啓蒙主義時期，乃至於「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高爾基不止一次地公正而深刻地估計了「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的偉大成就：在藝術的敍述與描寫上達到了空前的完整與精密，在內容上充分的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與沒落的過程。但是十九世紀「批判的現實主義」作家們，例如：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人，做為自己階級的叛逆者──「資產階級的浪子」所創造的人物性格真是充滿着對立與絕望，他們只能否定，但不能有所肯定，在一種毫無出路的情況下，終於不得不再肯定他們所曾經否定的。這就證明了「批判的現實主義」偉大作家們的世界觀是存在着一種不可克服的矛盾，一種精神上的分裂──一面是傾向於現實主義，一方面則是傾向於反現實主義的唯心主義。

是希臘時代藝術進步呢？還是資本主義時代藝術進步呢？這個問題，在今天是有着一定的現實意義的。肯定古代的古典藝術的優越品質，就是意味着繼承古代社會以來的藝術的現實主義傳統，根據這個源流與基礎，革命階級建設起自己的藝術來。批判地接受藝術遺產，是建設革命的人民藝術的基本原則之一，單純的否定觀點，只能造成藝術的現實主義傳統的中斷，此外是不能有任何好處的。對於資本主義時代沒落的頹敗的藝術內容的否定，就是意味着暴露資產階級的黑暗與罪惡，使人民認識到，只有徹底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才能打斷精神統治的枷鎖，把藝術從貨幣魔力中解放出來，就是意味着勞動羣衆的解放，改變現實，改變世界。只要勞動羣衆一旦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藝術，就會和古代的古典藝術，取得一致與諧調。古代的古典藝術與現時代的革命藝術，是不能截然分開的。高度評價古典藝術，並不等於說，古典藝術就是「一切的峯頂」，但歷史證明，古典藝術直到今天，也仍然保着無與倫比的優越性。革命藝術必得從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正確地合理地分析與批判古代藝術與資本主義時代藝術，乃是文藝科學的基本任務，筆者自問，在這一方面還不過是一個學徒。以上所談，與其說是對常任俠先生的見解提出不同的看法，倒不如說是給自己找到一個學習的機會，因此我誠懇的希望能得到常任俠先生、朱光潛先生，及讀者的指教。

五一、四、一四，長春

關於「希臘時代的藝術為什麼會比資本主義時代進步」

常任俠

我在本誌第三卷第四期答復王家傑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古代藝術的起源是怎樣的，希臘時代的藝術為什麼會比資本主義時代進步。」首先引起朱光潛先生對於本問題的討論，（見第三卷第五期）他對於我第一點的答復認為是正確的，對於第二點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關於希臘時代的藝術為什麼會比資本主義時代進步這問題，我曾說，我是吸取了從事研究西方藝術的朋友的意見，未能更深入的研究問題，去作圓滿的解答，所以仍待研究西方藝術者更圓滿地去加以說明。就所見到的關於本問題的討論文字，我答復的前一點，都認為是正確的，對於後一點，以王英白先生的這一篇「論希臘時代藝術與資本主義時代藝術」，解釋得比較詳細，特別提出來作為我前說的更正。關於資本主義時代的藝術，多舉其最腐爛，最墮落的產品，對其較好的藝術成就，（下轉59頁）

辯證唯物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武器

（原載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一九五一年第二號）

蘇・楊興順著
李何譯

譯文

譯者按：毛主席實踐論在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以來，蘇聯學術界極予重視。這是蘇聯哲學碩士楊興順（老子道德經的譯者）所寫的一篇向蘇聯人介紹毛澤東思想的文章。

馬列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在消滅國內帝國主義的和封建的反動勢力中，在建設新的、獨立的、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無往不勝的思想武器。藉助這個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做到了把全國進步力量聯合在自己周圍，而取得在中國悠久歷史中開闢新紀元的、最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勝利。

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毛澤東堅定不移地循着列寧、斯大林的道路走，馬列主義成爲中國人民民族解放鬥爭的强大力量。毛澤東依靠列寧斯大林底經典著作，根據他對中國革命鬥爭經驗的科學總結，作了創造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解決中國人民底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問題的示範。一九三七年七月寫成的，發表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五零年第二十三號上的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是他以創造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明顯例子。

一

作爲毛澤東哲學著作的基礎的，是列寧的原理：『生活、實踐的觀點應是認識論的第一與基本的觀點。』（列寧全集卷十四，頁一三〇）。他把這看作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底基石。毛澤東在『實踐論』著作中，以及在所有自己實踐和理論的活動中，都是以斯大林如下指示爲指導的：『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正如離開革命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斯大林全集卷六，頁八八——八九）。

毛澤東非常深刻地揭開了列寧斯大林的實踐觀的內容，以中國革命鬥爭的具體材料鮮明地說明，實踐是眞理的標準。毛澤東着重指出，社會實踐是科學的認識產生和發展的唯一來源。毛澤東寫道：沒有實踐，沒有感性認識，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毛澤東著作中特別注意認識的最終的、主要的目的在於爲實踐服務的問題。

毛澤東寫道：『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爲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實踐論』，下同）。

毛澤東著作從這樣的問題開始，就是什麼是實踐，它的基本內容是怎樣的。在揭開實踐概念的本質時，毛澤東寫道：『首先，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在生產活動中，人們逐漸地加深自己對自然發展法則和規律性的知識。改進有目的地利用自然資源的手段和方法，『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與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

然而實踐內容不限於生產活動。社會實踐也包括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因爲人們參加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因此，毛澤東描畫社會實踐爲一切形式的社會活動的總和，其基礎是人們的生產活動。

在階級社會的條件下，在人們的社會實踐中，兩個對立的傾向——進步的和保守的——鬥爭着。

毛澤東寫道：『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反動階級力圖歪曲眞理，僞造社會歷史，以便使勞動者的覺悟模糊，而保持他們於奴隸般的馴服中。只有勞動階級、社會中的進步分子，才關心科學知識的發展。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總的發展規律的眞正科學知識，只是在馬列主義——現代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產生和

發展當中才得到的。

只有在資本主義時代，當生產力發展到高度水平，並且伴隨大工業出現了無產階級的時候，才能夠對於社會發展史作眞正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了解。

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爲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强調理論對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爲實踐服務。」認識是否眞理，即我們的思維是否正確地反映現實，不是依主觀判斷而定，而是依客觀社會實踐的結果而定。正因此，馬恩列斯學說，曾經被而且不斷地被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的實踐所證實，成爲公認的眞理。

馬克思主義科學底創造性的實質，在於它不把已作出的理論原理當作教條，而當作行動指南。在實際運用當中，在革命鬥爭過程中，這些原理精確化了，修正了，必要的時候，甚至用另外一些原理來代替它們。

毛澤東說：「……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

毛澤東指出，這是由兩個原因產生的：第一、作出這些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人們，受着科學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即受着一定歷史階段上科學和文化發展水平的限制；第二，他們受着客觀過程發展程度的限制。毛澤東寫道：「在這種情形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

馬克思主義者在提出某些理論原理時，總是向自己提出具體的任務。而爲了完成這些任務，他們必須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反之，他們在實踐中就會失敗。

然而糾正思想是很困難的。毛澤東指出，許多時候須反覆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使理論原理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才能在實踐中實現預想的目的。

在描畫這一眞理時，毛澤東引了著名的中國格言：「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

毛澤東關於思想必須在實際鬥爭的火焰中考驗和修正的原理，是從辯證唯物論的立場，對中國共產黨長期革命鬥爭經驗的理論總結。這原理的出發點是列寧的「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爲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列寧「哲學筆記」，頁一八五）。

毛澤東着重指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認識我們周圍世界的標準。

在闡述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時，毛澤東把社會實踐看作不但是眞理的標準，而且是科學知識產生和發展的來源。

他指出：「任何知識的來源，在於人的肉體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否認這個感覺，否認直接經驗，否認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

人的認識，隨着社會實踐的發展，隨着人們的生產活動的發展，而發展着。

毛澤東寫道：「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對於自然界方面，對於社會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即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論到知識的來源時，毛澤東把社會實踐分爲兩部份：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一切眞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然而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與外域的知識。」

這種間接經驗也是別人的直接經驗。如果從這經驗中得到的知識，屢次爲生活所檢驗了，那麼它們是可靠的。這樣的知識是客觀存在的事物的反映。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拿它們來武裝。因此，毛澤東在這裡，在認識論中，以及在他的其他著作中，說明了科學知識承受的可能性，說明了批判地改造先代科學家和人類所獲得的一切知識的必要性。

毛澤東在他的著作「實踐論」中，特別重視革命地改造世界的直接經驗，重視親身參加社會實踐。

毛澤東寫道：「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和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

毛澤東着重指出，馬恩列斯能够作出他們的天才的學說，主要是因爲他們親自參加了階級鬥爭，並且在實踐中檢驗了這學說的正確性。

然而有這樣的人，他們不願意了解這個眞理。他們寧肯抓住封建時代中國的古老有害的教條：「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毛澤東指出：「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裡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爲「天下第一」……」。

毛澤東尖銳地反對驕傲，要求對科學採取誠實與謙遜的態度。

他指出：『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與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與謙遜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與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

沒有社會實踐，沒有親自參加革命地改造世界，就不可能科學地認識。否認直接經驗，否認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是唯心論者——這就是毛澤東關於實踐在認識論中的作用和意義的結論。

毛澤東非常明確地說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底辯證唯物論的性質。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底唯物論的實質，在於它把社會實踐看作科學知識的來源，看作眞理的標準和人的認識發展的動力。『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開始從客觀外界得到感覺經驗。……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底辯證法的實質，在於從它的觀點看來，認識過程經常發展和加深着，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從感性認識過渡到理性認識。『通過實踐而發現眞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眞理與發展眞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的認識論底本質。眞正科學的認識，不能夠限於它的低級階段，即感性認識階段，它只包含現象的個別方面、事物的外部聯繫。只有認識的第二階段，基於感性認識的材料的論理的認識階段，才能做到揭發事物的本質和內部聯繫，揭發周圍世界的內部矛盾。

毛澤東寫道：『認識的眞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維，到達於逐步了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規律性，了解這一過程與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達於論理的認識』。在着重指出論理的認識的作用時，毛澤東引證了列寧的著名原理：『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了自然。』（列寧『哲學筆記』，頁一四六）。

從感性認識過渡到科學的抽象，從第一個、初級認識階段過渡到第二個階段，是經過跳躍而完成的。毛澤東指出，在社會實踐的發展當中，人們跟屢次重複的事物接觸，這些事物被他們感覺到，並且在他們腦子中生起了印象，因此在人的認識過程中產生跳躍，產生理解。

爲了從感覺過渡到理解，要求概括，對豐富的感性認識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

理解本身不但反映現象，事物的個別方面，它們的外部聯繫；而且揭露了事物的本質，它們的內部聯繫。

因此，理解在質上不同於感覺。然而前後兩者之間存在着辯證的統一，它們彼此不可分離，而且在實踐的基礎上聯結在一起。

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

在描畫認識過程中感性經驗和理性本源的時候，毛澤東總結說：『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其次，毛澤東着重指出，從感覺過渡到理解，從感性認識過渡到理性認識，還還沒有完成認識過程。他說，這只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半途，而且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列主義認識論中最重要的東西，是那經過實踐和科學實驗的概括而作出的思想，應該再回到實踐去，爲實踐服務，在改造世界中起着能動的、革命的作用。

毛澤東寫道：『抓着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與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

到了這階段，到了理論底實踐目的實現的階段上，認識完成了嗎？對於這問題，毛澤東給予辯證的答復：完成了又沒有完成。從實踐到理論和從理論再到實踐——認識的這一循環過程，對於客觀過程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某一具體現象說來，算是完成了。毛澤東指出，例如，如果某一工程計劃，某一科學假想，已經實施，而且達到預想的目的，那麼認識過程可以算已經完成了。然而，從物質世界發展的客觀過程看來，認識運動在這一階段上，還不能算是完結了。

客觀過程的發展是無窮的，由此，人的認識過程也是無窮的。

毛澤東指出：『根據於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於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由於這種情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從來沒有結束眞理的發現，而相反的，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眞理的新道路，經常地揭發客觀過程的新方面。

毛澤東在結語中寫道：『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

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從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出發，毛澤東作出具體的、實際的結論。他寫道：「依社會運動來說，眞正的革命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改正……，而且在於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及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與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換句話說，革命運動的指導者，依靠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應當預見事件發展的行程，不落於客觀過程發展之後，也不跑得太前而去。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革命實踐之不可分離的聯繫。

二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曾經是爲了揭發中國共產黨隊伍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擁護者的唯心論錯誤而寫的，他們曾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帶給中國革命巨大害處。同時，這著作是毛澤東創造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來揭發中國現代歷史發展規律的傑出模範。依靠他所發現的這些規律，依靠列寧——斯大林黨的豐富經驗，毛澤東作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科學的戰略與策略，這一戰略與策略曾經在幾萬萬中國人民的行動中實現了，他們取得了對國內帝國主義的和封建的反動勢力的最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勝利。

毛澤東對中國階級的特點和相互關係的分析，是他眞正科學地揭發客觀發展過程內部矛盾的顯著例子。

毛澤東還在一九三七年就指出了，中國社會是由下列各階級和社會階層組成的：地主、大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和中國無產階級。他科學地指摘了各個階級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這對於中國共產黨是特別重要的，因爲使得黨可能確定什麼集團、什麼階級在中國革命的某一階段上可以成爲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註）

毛澤東指明，中國地主階級是由大、中、小地主組成的，其中每一個都起着特殊的作用。大家都知道，由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正確政策，曾經吸引地主中個別愛國派參加了反對日本侵佔者的共同鬥爭。

中國資產階級分爲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國家的馴僕。毛澤東指出，例如，蔣介石匪幫的官僚壟斷資本，不但壓迫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而且壓迫中等資產階級。（見「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而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又受封建殘餘的束縛，所以，它們同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有矛盾……』；另一方面，『由於它們同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繫，所以，它們又沒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氣。』（毛澤東選集，哈爾濱版，頁二二一）。在鬥爭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無產階級面前表示畏縮不前。

其次，毛澤東指出，中國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是由手工業者、小商人、職員及其他組成的。

毛澤東特別注意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他們的廣大階層能够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革命力量的組織與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同書，頁二二三）。

毛澤東指明，農民是由富農、中農、貧農和僱農組成的。在舊中國，富農和地主共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十（而佔有了全國土地百分之五十——七十），中農約佔百分之二十，而貧農和僱農約佔百分之七十。毛澤東教導說，中農情緒的估計，對於中國革命是有極嚴重意義的，中農在實行土地改革之後將成爲農民的大多數。貧農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同書頁二二五）。

（未完）

（註）事實上，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澤東同志已在他的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給予中國社會各階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的分析，解決了關於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力量和同盟者的問題。本文作者因爲只看到在抗日戰爭開始時的文獻，所以這樣說。作者此處的敘述主要是根據一九三九年發表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編者

共產主義原理（下）

恩格斯原著
吳恩裕譯

十二問：工業革命後來又有一些什麼結果？

答：由於大規模工業使用了蒸汽機和其他機械發明，所以使能在很短的時期內，用很少的費用，把生產增加到幾乎無限的程度。自由競爭基本上是配合大規模生產而發生的現象，現在卻表現一種極端侵略的姿態，這主要是由於商品生產得容易。許多資本家都投身於工業，因此，很快地生產量超過了需用的數量。結果是，這些用機器製造的商品賣不出去，就發生了商業危機。工廠關門、工廠的主人破產、工人也沒有麵包了。到處都有貧困來襲。過了一些時候，過剩的生產品銷售出去了、工廠也開工了、工資也提高了、營業也逐漸比一向好轉起來了。但這種繁榮是支持不多久的。商品生產過多的現象又會發生，另一個危機又會來到，而且這危機又和前一個危機走着同一的路線。從本世紀（十九世紀）開始以來，工業的生活不斷地在繁榮時期和危機時期之間動盪着。每到五年至七年的期間，就會有同樣的危機重現，它給工人們帶來的是不可忍受的貧困，是一個大革命的沸騰，並且使現存的社會秩序遭受極大的危險。

十三問：這些有規律反覆發生的商業危機有些什麼結果？

答：第一、大規模工業雖然在它的最初發展階段，自己製造了自由競爭，可是現在它對於它所創造的自由競爭來說，卻是過於成熟了。競爭以及工業由個人資本家來經營這個一般的事實，到現在已經變成生產的桎梏了，這個桎梏是非突破不可的。如果大規模工業還是像現在這樣進行下去，就祇能用七年重現一次的混亂，來恢復它的繁榮。這種混亂是對於文明的一個威脅。它不僅把無產階級淪於貧困，同時也毀滅了一大批資產階級。所以：或者是取消大規模工業——這當然是絕對談不到的；或者就是，大規模工業需要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秩序中來進行。新的社會秩序不會容納彼此互相競爭着的個別工廠主們存在；而會把工業生產按着一個確定的計劃、根據全社會所有一切人們的需要、當做一個由整個社會來進行的事業。

第二、由於大規模工業把生產範圍大爲擴張的結果，所以它才可能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在這新的社會秩序中，必將生產出很豐富的生活必需品，使每個社會成員都有充分的自由發展他的能力；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在下面的情形下參加工作：即恰恰是現在大規模工業造成工人貧困的那些特質，在另外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中，將變爲促成消除這種痛苦和貧困的特質了。危機和商業的波動，將不會發生，因此以下就是很明顯的了：

一、大規模工業所造成的貧困，乃是由於一些和現在社會秩序不相容的條件所造成的。

二、那些能夠結束這些貧困而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的手段，現在已經存在着了。

十四問：這種新的社會秩序將採取一種什麼形式呢？

答：首先必須把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經營，從互相競爭的個人資本家手中，奪取出來，而置諸整個社會嚴密的保護之下。那就是說，把工業按着經過協議的計劃進行，並且使社會每一成員都參加工業生活。競爭是廢止了，代之而起的是聯合。既然私有財產的存在是個人資本家經營工業的必然前提，既然自由競爭是個人私有制工業的產物，那麼，私有財產就是和自由競爭以及私人佔有的工業不能分開的東西。因此，私有財產制度就必須被取消，而代之以下述辦法：一切生產工具的共用；並按着共同協議來把生產品分配給所有社會成員。一句話，即財產共有制。廢除私有財產制這句話最能簡捷、扼要地表出那個由於大規模工業的發展而必然促成的社會秩序的變革。所以，共產主義者把這句話當做他們的主要要求，是正確的。

十五問：那麼，在比較早的時期能不能廢除私有財產呢？

答：不可能。社會秩序中的每一變革、財產關係的每一次變更，從來都是由於新發現的生產力不能再在舊的財產關係下繼續正常發展下去的結果。私有財產本身也就是這樣產生的。私有財產並不是從來一直都存在的。在中世紀的末葉，採用了一種新的生產方法。這就是工場手工業制度。這種新的生產過程，與封建和行會的財產關係發生衝突，因而就創建一些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制度比較適合的新的財產關係。這樣，纔發生了所謂私有財產。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在大規模工業發展的初期，除了私有財產制度以外，旁的財產形態都是不可能的；除了那個建築在私有財產之上的社會外，別種社會也是不可能的。祇要是生產還沒有豐富到：不但能滿足整個社會成員的目前需要，而且還能供應剩餘生產物來增加社會資本，來向前發展生產力的時候，就必定會有一個控制着生產力的統治階級和一個貧苦的被壓迫階級。這些階級組成的方式如何，要看當時的生產制度到達了何種發展階段而定。中世紀是依靠農業的，因之，就有地主和農奴兩個對立的階級。在中世紀後期，城市裡有行東和學徒及職工的對立。在十七世紀的工場手工業裡有工場手工業主和工場手工業工人。十九世紀產生了大工廠主和無產階級……。顯然的，迄今以前，生產力還沒有充分地發展到足够滿足社會上一切成員需要的程度，私有財產也還沒有變成爲這些生產力的桎梏或障礙的程度。而在今天，生產力的發展已經達到了這樣高的程度：（一）資本和生產力的存在和使用，已經到了一個前所未聞的規模，而增加這些生產力的手段，也層出不窮。（二）這些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階級手裡，人民大衆則落到無產階級隊伍裡去；隨着資產階級珠寶箱中財富的累積，無產階級的情況也變得愈益貧窮不堪了。（三）這些强大的並且易於增加的生產力，對於資產階級及其私有財產來說，是過於成熟了，因之，就經常使社會陷於可怕的騷亂之中——於是，廢除私有財產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了。

十六問：用和平的方法能够廢除私有財產麼？

答：這是一件人們很可以希望的事情，並且共產主義者也是世界上最不想阻撓和平方法的人們。誰也不如共產主義者更瞭解：陰謀暴動的方法不但是無益而且實在是有害的。共產主義者很知道：革命不是主觀和隨便造成的。他們知道：在任何地方、任何時代，革命都是實際情況的產物，這些情況並不是依靠特殊的黨或階級的意志、或領導促成的。他們也認識：在每個文明國家裡，無產階級的發展都在遭受着强力的阻礙；但是那些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們却又都在盡力促成革命。倘使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最後被迫而革命，則共產主義者必將參加工人們的這個運動，並且，就像他們現在用語言來宣傳一樣，他們必將迅速地行動起來。

十七問：私有財產能一下子就廢除麼？

答：不會的。這件事情的不可能，正如不可能把生產力一下子就增大到爲建立一個生產手段的社會公有制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那遲早就要爆發的無產階級革命，祇是在逐漸地改變着現在的社會。私有財產，祇有當創造出必要數量的生產手段的時候，纔能够被廢除。

十八問：這個革命的發展過程大概是怎樣？

答：首先便會創立一個民主主義國家組織，其中包括着無產階級直接或間接的政治統治。例如在英國，無產階級佔人口的大多數，那麼，無產階級統治的方式，就可以是直接的。法國和德國的大多數人口，除無產階級外，還包括着小農及市民，那麼無產階級的統治就應該是間接的。因爲小農和市民祇是到現在才開始轉變爲無產階級，他們的政治利益纔變得愈益依靠無產階級的利益，因此，他們最後就不能不把他們的力量和無產階級的力量結合而提出聯合的要求。也許這還需要做第二次的鬥爭，不過無產階級必定還是會勝利的。

民主主義，如果不把它當做一個向私有財產直接打擊的手段，如果不把它當做保衛無產階級存在的手段，那麼，它對於無產階級便是沒有用處的。由於現存的諸關係，就必需採取下列具有絕大的重要性的措施：

（1）用累進稅、重的繼承稅、取消旁系（兄弟、侄等）繼承、强制公債，來限制私有財產。

（2）把地主、工廠主、鐵路所有者及船主的財產，一半用國營工業的競爭，一半以貨幣爲補償，逐漸地收奪回來。

（3）把一切移居在外國的人以及對大多數國民的叛逆者的財產沒收。

（4）把在國有的土地上的國有的工廠和製造廠內的無產階級的勞動力和職務組織起來，這樣就消滅了勞動者之間的競爭，而迫使殘存的工廠主所付出的工資和國家所付的工資相等。

（5）直到私有財產完全廢除爲止，社會中所有一切成員普遍和均等地都有勞動的義務。把產業的隊伍，特別是在農業裡，組織起來。

(6) 以國家資本的國有銀行去壓迫私營銀行及銀行家，而把信用制度和金融，都集中到國家手裡來。

(7) 按照全體國民所有的資本和勞動的增加速率，來儘速增加國營工廠、製造廠、鐵路和航運，開墾荒地，並改進已經墾殖的土地。

(8) 全國兒童一經脫離了母親的照顧，就使其在國立學校中免費受教育。

(9) 在國有的土地上建築大住宅，以便公民團體可以共同居住在一起，來進行工業和農業。並在這種公民團體內，把城市生活的好處和鄉村生活的好處，互相結合起來，使不致受到任何一種生活的偏頗性和壞處的影響。

(10) 拆毀一切不合衛生的住宅或住宅區。

(11) 私生子和嫡生子都享有同樣的繼承權。

(12) 把一切運輸機關集中於國家手裡。

當然，我們不能希望，把這一切措施，都同時實行。而是，實行了一個之後，接着就實行另一個的。祇要一開始就摧毀了私有財產，無產階級就必須更進一步把一切可用的資本、一切農業、一切工業、一切運輸的便利，以及一切交換的手段，都逐步愈益集中到國家手裡。那就正是上述一切措施的目的。祇要用無產階級的勞動增加了國內的生產力，那麼，這些措施就都可以實現；而集中化的結果也會有進展。最後，當一切資本、一切生產、以及一切交換都集中在國民全體手裡的時候，私有財產就不再存在了；貨幣將變成無用的東西了；而生產也會增加到這樣一個程度，人們也將改變到這樣一個程度：以致使舊的社會關係最後的殘跡，也都要消滅了。

十九問：像這樣的一個革命能夠在一個國家之內單獨發生麼？

答：不能。由於大規模工業創造了一個世界的市場，所以它已經把地球上一切國民、特別是地球上的文明人民，聯繫到這樣一個程度：使他們中之每個人都和在其他國家中發生的事件發生關係。此外，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也變得相似到這樣一個程度：即在任何地方，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爭端所在的社會階級之間的鬥爭，都已經變成的當前的主要鬥爭。所以，共產主義的革命，不會僅是一個國家內的革命；它會在一切文明國家裡都發生，至少是會同時在英、美、法、德諸國發生。在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國家裡，這個革命都要按照該國的工業生活是否已達到了高度的演進、是否已經累積了大量的財富、已否有大量的可用的生產力等等，或緩或急地發展着。在德國，這個革命將會採取最緩慢的步驟並且不易成功。英國的革命就會進行的快些和容易些。這革命會對於世界各國都有極大的影響：改變着、加速着它們的發展過程。這是一個世界革命，因此，就要以全世界為其舞臺。

二十問：私有財產被廢除的後果是什麼？

答：當社會已把生產力、運輸、交換、分配、從資本家私人手裡奪出之後，當社會已經能夠按着全社會的需要、按着它所能支配的手段，用一種井然有序的方式來管理這些事情之後，則私人佔有工業過程中的那一切不良的結果，就都會剷除了。危機是不會再發生了；增加生產在現在的社會秩序中造成了生產過剩，並且是造成苦痛的有力原因，但在未來則將不夠滿足國民的需要，因而還需要使其更為增加。那時候，生產過剩不但不會帶來貧苦，不僅能滿足社會的目前的慾望和所有一切人們的需要；它反而還要創造新的需要，並同時創造出滿足這些新的需要的手段。它會引起更大的進步，它會使進步成為真實的，而不會像從前那樣，在進步中還要使社會陷於混亂。大規模工業，祇要脫離了私有財產的束縛，就會走上一個新的發展規模，那個龐大的規模，會使現在的機器工業，相形見細；恰如現在的機器工業會使初期的工場手工業，相形見細一樣。這種鉅大的工業發展，必能供應充分的產品來滿足社會一切需要。由於私有財產的重壓和耕地過度分散的關係，農業生產，同樣，一向也受到了束縛和阻礙。所有各種各樣的科學方法和改進，必使農業有着欣欣向榮的發展，並能充分地滿足社會的需要。這樣，社會就將擁有足夠數量的產品，來使其成員間的分配達到平等和滿足。社會之分成許多不同的敵對階級，就是不必要的了。這些階級的分裂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它們還是和新社會秩序衝突的。階級的發生是由於分工；可是，像我們一向所曉得的分工，却是要完全消滅的。祇靠機械的和化學的助力，是不夠把工業和農業發展到它們所能達到的高度的。利用機械的和化學的助力，人類所發動的那個能力，也必將同樣有着發展。正如一世紀以前，當農民和手工工場裡的工人捲入了大規模工業的浪潮中時，他們不得不改變他們的習慣和風俗，變成完全不同了的人一樣，所以，當全社會已經都實行共同經營的生產以後，也就是，當生產經過一個新的演進以後，就需要全然不同的人們來進行生產了，也就會產生出不同的人了。我們不能希望現在社會裡的人們都能適合共同經營的生產方法；因為在現在，既然每一個人祇從事於一個工業部門而與所有其餘的部門絕緣，他就被那一種工業束縛住、被它

剝削了。他祇能培養一種能力而犧牲了所有其餘的能力，僅僅知道一個部門，或實際上，僅僅知道一個整個工業部門中的一部分而已。現代工業已經變得愈益不能再僱用像我們所說這樣的工人了。可是當整個社會要共同地和有目的地經營工業的時候，那就將需要具有各方面都發展了的能力的工人們、也就是需要那種能夠掌管整個生產系統的工人們了。分工已經被機器制度給破壞了；那迫使這一個人做農民，另一個人做鞋匠，第三個人做廠工，第四個人做股票投機者的分工，就將完全消滅了。當青年人受學校教育的時候，關於整個生產系統的知識，也是他們所受到的教育的一部份；並且還要按着社會需要如何，個人的嗜好如何，而由一個工業部門參加到另一個工業部門裡去。他們的發展，將不會再像今天這樣，是片面的了。由此可見，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會使人們的能力有全面培養的機會。和這種發展同時產生的便是階級消滅的現象，因爲在一個共產主義社會裡，階級是不能存在的。實在，整個社會組織就會阻止不同階級的存在。

從以上所講的一切，可以推論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也同樣的要消滅。農業和工業將會由同一個人來經營而非由社會裡兩個不同的階級來經營這一事實，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真正基礎，並且是這種社會的一個基本的特質。農業人口在鄉村中分散和工業人口在城市中的集中之對比，就表明着農業和工業都還祇達到很低的發展程度。它造成了將來發展的一個阻礙，這個阻礙到現在變得更明顯了。

下面就是取消私有財產以後的主要結果：全社會所有一切分子組成一個總聯合，共目的是爲了共同地和有目的地利用生產力；爲了擴大生產使能滿足全社會成員的需要；爲了停止那些造成用犧牲旁人的需要來滿足一個人的需要的條件；爲了完全摧毁階級及其對立；爲了用取消迄今存在的分工、用工業教育、工作的變換、用使所有的人們都參與享受共同勞動的成果，用使城市和鄉村融合鄉村和城市融合、種種的方法，來把社會所有成員的天才，都予以多方面的發展。

二十一問：共產主義的社會秩序對於家庭有什麼影響？

答：共產主義的社會秩序會使兩性的關係變成一個祇是有關兩造的純粹個人的、私人的事情；這種關係並不是社會所能干涉的。這種態度之所以成爲可能，是因爲到了那個時候，私有財產必已廢除，而子女也必由全社會來教育，因此就把那一向存在的做爲婚姻方式的兩大基石（妻依靠丈夫，子女依靠父母），給廢除了。這一點可以算是對於那些叫囂反對「共妻」的「可尊敬的」市民們的一個回答。共妻乃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個特點；這種共妻的情形，由於那共同佔有女人的賣淫辦法，而達到成熟的頂點。賣淫是以私有財產制度爲根源的：假若摧毁了私有財產，賣淫就會消滅了。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不但是絕不會創立出一個社會共有婦女的制度，反而要把這種事物的情形，予以結束。

二十二問：在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之下將怎樣處理民族問題？

答：（原缺）

二十三問：在共產主義之下將怎樣處理許多不同的宗教？

答：（原缺）

二十四問：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怎樣區別呢？

答：所謂社會主義者，可以分成三類。

第一類包括着那些封建及家長式的社會的崇拜者們。這種社會形態是已經或正在，被以下的力量所摧毁：大規模工業和國際貿易的增長；以及這兩種力量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出現。這類社會主義者主張下面這些補救現在社會病態的辦法：重新建立封建的秩序——一切即會變好，因爲在封建制度之下，是沒有這些病態存在的。他們一切的提議，都直接或間接地引到這個目標。對於這些反動的社會主義者們，不論他們對於無產階級的貧困如何同情，共產主義者必須加以攻擊，其理由如下：

（1）他們是在追求着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2）他們企圖重建貴族、行東、和工場手工業主、以及他們的附屬物專制或封建君主或官吏、兵士和僧侶等等的統治。在這個社會中固然沒有現在社會的病態，可是這也是個有其自己許多病態的社會；而且，在這個社會中，也沒有希望能夠產生一個共產主義的組織，使工人從其正在遭受着的壓迫下，解放出來；

（3）任何時候，當無產階級採取着一個革命的或共產主義的態度時，他們就暴露了他們的真正感情；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封建社會主義者就會變節與資產階級結合，而離開無產階級。

第二類包括着我們現在社會秩序的崇拜者們、包括那些擔心着做爲現在社會不可免的產與的病態，會促使這個社會毀滅的人們。因此，他們就想一方面取消現社會所產生的那些病態，另方面又努力來保護現在的社會秩序。有些這類社會主義者們，懷着這個目的，建議許多不同的福利方案，而其中的另外一些人們，則主張比較大規模的改良辦法。這些名人們藉口重新組織社會，實質上是願意保存現在社會秩序的基礎，但這就恰恰等於說他們實質上是希望把現在的事物狀態保持不變。這些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也應該被共產主義者們堅決地反對。因爲他們是跟着共產主義的敵人工作的，並且是擁護那恰好是共產主義者們所要推毀的社會秩序的。

最後，第三類是一些民主社會主義者們。這些人們採取幾項在第八問的解答中共產主義者們所主張的措施，可是他們却不把這些要求視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的暫時措施。在他們看來，這些要求就足够取消貧困和現在社會共餘一切的罪惡了。這些民主社會主義者們，有的是一些還沒有了解解放其自己的必要條件的無產者們，有的是小資產階級分子。小資產階級有許多利益，到了民主政權已經建立的時期，到了這種政權所需要的社會措施已經開始了的時期，是和無產階級相同的。因此，在嚴重時期，共產主義者即須和民主社會主義者們，造成共同運動，並至少暫時採取合作的統一戰線。但是，他們祇有在下列兩項條件下，才能這樣做：（一）民主社會主義者們並沒有替統治的資產階級服務；（二）民主社會主義者們並沒有攻擊共產主義者。可是，那是明顯的，這種共同的行動，並不排斥關於理論紛歧的討論。

二十五問：共產主義者對於現在（一八四七）其餘的政黨要採取什麼態度？

答：關於這個問題，各國的情形必然是不相同的。在英國、法國、和比利時，因爲資產階級佔最高的地位，故共產主義者在目前和許多其他民主黨派的利益是相同的。這種利益上的同一，是和今天民主主義者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的措施與共產主義者們的目的，接近到何種程度成比例的。那就是說，是和這些措施究竟能代表多少無產階級的利益、和那些措施要靠無產階級多大的支持，成正比例的。例如，英國的憲章運動者，便幾乎可說是由工人階級分子組成的，便比較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小資產階級或所謂激進派們，更接近共產主義一些。

美國採用一個民主憲法。共產黨必須和那些爲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用這個憲法來對抗資產階級的人們，結合成一個共同的運動。這就意味着：共產主義者必須和美國農民改革黨携手合作。

瑞士的激進派雖然是一個混雜的集合體，可是他們却是共產主義者的唯一能够與之聯合的人們。在這些激進派中，瓦德市和日內瓦市的激進派們是最進步的。

在德國，資產階級和專制君主之間的決定鬥爭，現在是到來了。不過，共產主義者既然非等到資產階級得到政權的時候，才對付它不可，那麽共產主義者就應該幫助資產階級儘快地攫取政權，而後再把那個政權推翻，這就是爲了共產主義的利益。因此，在反君主政府的鬥爭中，共產主義者必須要支持自由資產階級。可是共產主義者却永遠要當心警惕，可別相信資產階級所說的：當它勝利後，無論如何必將給無產階級帶來安慰，這種欺騙的保証。一個資產階級的勝利，祇能給共產主義者們帶來下面的益處：第一、能够得到種種的讓步，這些讓步會使共產主義者辯護他們原則和討論及宣傳他們思想的工作，比較容易一些；共產主義者並因此可以促成無產階級的統一，把它造成一個結實的、有組織的、戰鬥的階級。第二、共產主義者必將會完全認識到：從專制君主被推翻那一天起，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就可以說已經宣布了。自此以後，德國共產主義者的策略和政策，便和現在資產階級已經得到政權的國家中的共產黨是一致的了。

（譯者附言）四卷四期第五十九頁下欄第七行『資本家就佔了一切……』應作『資本家就佔有了一切……』；第九行『工場制度……』應作『工廠制度……』；第六十頁下欄第一行『這些關係仍然還存在着。』應作『這些關係仍然存在着。』第六十一頁上欄第一行「原缺」應作（原缺）。

關於人民民主建政

本社編輯部編
定價四千元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權最好的、基本的組織形式。必須大家正確地認識和掌握了這種制度，才能完成並鞏固人民政權的基層建設。本書內容包括有關人民民主建政的重要論著、文件和法令，是學習人民民主政制所必備的參考資料。

本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學術問答

【問】為什麽我們說武訓是為封建階級的文化服務的？對於歷史上的人物和事變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評論它們？

（開封 李宏文問）

【答】武訓雖是滿清末年一個『行乞興學』的乞丐，但仍是乞丐，乞丐在經濟上失掉了生產手段，脫離了生產活動的實踐，靠行乞來過寄生蟲的生活；在政治上，是歸屬於反動陣營的，所以乞丐的通性大都是：擁護私有制、剝削制、崇拜豪紳地主、功名富貴，服從統治，忍受壓迫，不但不革命，而且有時反革命。「武訓傳」中所描寫的武訓，對於乞丐的通性是兼而有之的。他極其奴顏婢膝之能事，並且做出非人性的行為，例如挨打一拳得二文，挨踢一腳得三文，喝髒水，吃瓦片之類。他把這樣乞得的錢存入豪紳地主之家，放債生息，還買過很多的田出佃，去剝削人民。他容易使人感到奇怪的地方，就是拿所弄的錢財去辦了「義學」。但他辦「義學」的動機，是由於他做窮小孩時得不到讀書機會，所以立志要辦「義學」收容窮小孩讀書，他辦「義學」的目的，是要使窮小子讀書可以『出人頭地』，可以『坐八抬大轎』，做大官，騎在人民的脖子上，供滿清皇帝的奴兒，他這個「義學」是交由達官貴人去辦的，義學中所『唸的書，還不是三綱五常，君臣父子嗎』？（張舉人語）。像武訓這樣行乞興學為封建階級文化服務，當然能博得統治階級的嘉獎。所以當時滿清皇朝『欽賜黃馬褂』，封為『義學正』，並給造人牌坊。後來的北洋軍閥和蔣介石也都嘉獎他，這種為反動統治階級所嘉獎的人，值得我們人民的稱讚和歌頌嗎？歷史上的人物值得我們人民稱讚和歌頌的，必須是反抗壓迫階級的革命領袖、保衛祖國的民族英雄、以及人民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思想家。像武訓那樣的人，在今天應當是在勞動中被改造的人，他是社會的寄生蟲，並不是『勞動人民』；他為封建階級及其文化服務，並不曾為人民及其文化服務。不料電影「武訓傳」的作者，把武訓其人其事捏造一番，歌頌『大哉武訓，至勇至仁』。稱讚他的『勤勞勇敢的、典型的中華民族的崇高品質』。說『要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忘我精神』，說『讓我們把武訓做榜樣』。此外還有人說『武訓這個名字應該說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董渭川語）。像這樣的稱讚和歌頌，是我們所不能承認或容忍的。否則『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像那樣的反動思想的宣傳：要我們人民學做武訓那樣興學的乞丐，好讓窮人得到讀書機會，也污衊了人民革命與人民的國家。這樣的宣傳，若果是故意的，那便是把反革命的思想偽裝為『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企圖敗壞人民革命建設的鬥志，我們必須對它做無情的鬥爭；若果是無意的，那便是做了敵人思想的俘虜，是政治學習未能改變自己的舊思想，或者思想雖然改變而對實際問題感到茫然的表現。

我們學習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主要地是要採取人民的立場，唯物的觀點與辯證的方法，去考察實際問題或評論歷史上的人物與事變。歌頌武訓其人其事的人們，雖也曾宣稱站在人民的立場，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評價了武訓這個人，卻是得出了那麼樣錯誤的結論。實際上，他們並不曾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而是站在非勞動人民（即乞丐）的立場；不曾採取唯物的觀點與辯證的方法，而是採取唯心的觀點與形而上學的方法，他們受了教育救國那種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拘泥於武訓行乞興學那種浮而上的事實，停頓於感性認識的階段，不能深入地理解武訓其人其事的本質，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階段。因此我們必須努力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學習『實踐論』的深刻的思想，展開思想戰線上的鬥爭，來澄清思想上的混亂狀態。

（李 達）

【問】墨子生長在怎樣的時代？墨子的學說包括了那些主要的內容？對於墨學我們應該抱怎樣的態度？

（太原 關維民問）

【答】墨子名翟，生於周定王初年（公元前四六八年——四五九年間——約當孔丘死後一二十年），那時，正是「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時代。他死在周安王中葉（公元前三九〇——三八二年間）。他的學說是和儒家學說對立的。在漢代以後的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裡，「廢黜百家，獨尊孔子」。只把儒家學說認為正統，而把別家的學說列為「異端」——當然，墨學也成了「異端」。墨子的學說，主要包括下面幾點：

第一，墨子是不贊成「樂以為樂」、「室以為室」（正好像我們不贊成「為教育而教育」的思想）。他的「為」，以是否「利人」而定（『利人乎，即

爲。』見「非樂篇」）。他說：『出言，則（必）不可不先「立儀」而言。』「立儀」就是要確立正確的觀點；否則，儘管你洋洋洒洒說了一大套，所得結論也許已離題千里，不切所需。他嘗說：『言有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就是說解決問題，首先要稽考已往的實例，以確定問題的內容；其次是『察衆之耳目之請』，以瞭解羣衆的需要和情緒，堅定了處理問題的立場；最後是『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非命篇」）。仔細觀察人民對執行的政策所有的反映，並考慮接受他們的意見，也就是注意「效果」。

第二：「墨子」諸篇中所說的『義』，指的就是眞理。爲追求眞理，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他嘗說：『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又說：『萬事莫貴於義』。（「貴義」篇）。眞理之所在，墨家肯『赴湯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

第三：墨子本人腳踏實地，『摩頂放踵，利天下者爲之。』（「孟子」）。『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莊子」）。當越王派公尙過以車五十乘相迎，並允許封他故吳之地五百里；墨子說：『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羣臣，（不）奚以封爲哉？抑（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糴也。鈞之（糶）糴，亦于中國耳，何必于越哉？』（「魯問」篇）。這是說明他畢生爲學，不計個人名位待遇，自願與羣臣同列。也不願當拿自己的聲望出賣，被統治者所利用。

第四：墨子論學，首重實踐力行。他指摘王公大人『虧奪民衣食之財』（「非樂」篇），他自己首先『裘褐爲衣，跂蹻爲服』。他提倡節約，反對『加費不加民利（則止）者』（「節用」篇）。他自己首先表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決心。他倡交相利、兼相愛之說，反對侵略戰爭；就不避艱辛，去求見準備侵略的諸侯君主，陳非攻之義；同時，在將被侵略的國裡，作成了預備打擊侵略者的必要佈置（「公輸」篇）。他一再明確肯定地說：『口言之，身必行之。』（「公孟」篇）。

第五：墨子說：『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善，非也……則國必治；……不得下之情……國（衆）家必亂。』（「尙同」篇）。墨子雖然也要求賢人主政，但更着重珍視羣衆的意見，他確認治亂的關鍵在于羣衆。如果失去了羣衆，脫離了羣衆，任憑你領導上主觀的如何努力，國家必亂。

第六：墨子是主張非命的。他說：『安危治亂……豈可謂有命哉？』他更指出：『王公大人，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怠乎聽獄、治政……天下必亂矣！……怠乎耕稼……紡績、織紝……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所以失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他的結論是：『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于天下，夫豈可以爲其命哉？敵以爲其力也。』（「非命」篇）

第七：墨子的兼相愛，是建築在交相利的基礎上的。愛是主觀的要求，利是客觀的條件。墨子看清了利與愛的相屬關係。他想把交利、兼愛，衝破階級間的壁壘，解決一切矛盾，以達到理想中的大同世界。這裡，他不覺流于空想。

墨子的學說，是我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精粹的一部份。我們應該繼承墨子以及許多具有唯物論因素的學者的優秀的傳統，對于它們進行批判地接受。

（梁存厚）

【問】爲什麼在自覺意志支配與領導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會存在着客觀的經濟法則？

（紹興　顧維寅問）

【答】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存在着客觀的經濟發展法則。所謂客觀存在着的經濟發展法則，也就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必然規律。

這種客觀存在的經濟發展法則，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其內容不盡相同，其表現方式也不同。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經濟法則是自發地起作用的，它表現爲一種盲目的、支配人的力量。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之下，千千萬萬個資本家把生產當作他們的私事來進行，因此，在無政府狀態的生產下，人不能支配經濟法則而必然受經濟法則的支配。例如：資本主義社會各生產部門間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分配，就不是按照自覺的計劃來進行，而是在平均利潤法則的支配之下自發的進行的。那一個企業部門的利潤率高，資本就流到那一個企業部門去，那一個企業部門的利潤率低，資本就從那一個企業部門流出來。資本在各生產部門間的流動（代表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在各生產部門間的分配），是完全在平均利潤法則的支配下自發地進行的，資本家除了盲目地服從這一經濟法則的支配以外，別無其它途徑可循。

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必然被顚覆並必然被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所替代。資產階級爲他們的階級利益所局限，執拗地拒絕承認這個眞理，因此他們就根本不能認識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法則，而只能受經濟法

則的支配。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打破了這種經濟發展法則的自發性。十月革命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代之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的蘇聯，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的手裡，而國家的領導者，又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武裝着的、洞曉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共產黨，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經濟發展法則是被人認識了的，不但被認識，而且被自覺地運用來改善人民及國家的經濟狀況的。

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經濟法則不是自發地起作用，而是被人認識並被自覺地運用的。我們同樣以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在各生產部門間的分配爲例，在社會主義國家裡，要使生產順利地進行，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也必須在各生產部門之間進行適當的分配。但這種分配決不受什麼平均利潤法則的支配，決非像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那樣自發地進行，而是國家按照統一的計劃自覺地來進行的。

社會主義經濟是自覺地發展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法則，是自覺的經濟法則。但假如把自覺的經濟法則了解爲是脫離客觀必然性，完全由人主觀地創造出來的東西，這樣的認識是不正確的。「自覺」這兩個字，並不排斥客觀必然性的存在，而正是肯定了客觀必然性的存在。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三編第二章中向我們指出：「社會的力量，在未被我們認識及處理以前，正是和自然的力量一樣，發生着盲目的、強制的、破壞的作用。可是我們一經認識了它，理解了它的活動，它的方向，它的影響，那時就靠着我們來使它更多地服從我們的意志，運用它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經濟法則也是客觀必然性的反映。問題是在於社會主義國家能認識這種客觀必然性，並且能自覺地按訂計劃來適應這種必然性。例如蘇聯的農業集體化，就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經濟法則。集體化是解決先進的社會主義大工業與落後的小農經濟之間的矛盾的唯一道路，集體化反映了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因此聯共黨的集體化政策，就是一種自覺的經濟發展法則。

當我們考察經濟法則的時候，不能把它看作是一成不變的東西。經濟發展法則，是隨着客觀物質生產基礎的改變而改變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很多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如勞動者貧困化的法則和平均利潤法則等，被根本消滅了；有些資本主義社會裡舊有的經濟法則，如價值法則等，已被改造過了；同時，並出現了許多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如國民經濟計劃化發展的法則，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法則，按勞取酬的分配法則等等。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被消滅，正是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創立的前提。社會主義既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階級壓迫，實行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就必然要使那些反映資本主義剝削關係和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經濟法則趨於消滅。我們決不能把這些經濟法則的消滅，看作是一切經濟法則的消滅。

總之，社會主義社會裡也是存在着客觀的經濟發展法則的，但那些經濟法則是被人認識了的，是被人自覺地加以運用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人不再是經濟法則的奴隸而成了經濟法則的主人。社會主義蘇聯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就是聯共黨自覺地運用經濟法則來領導蘇聯人民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具體表現。

（蔣學模）

印度大量出版
毛主席論著的譯本

毛主席的著作在印度極受歡迎，印度大城市所有書店都陳列毛主席的著作，印度出版家已以印度的各種語文和英文出版了毛主席的許多著作譯本。毛主席的著作已出了孟加拉文，印地文，烏爾都文，馬拉提文，泰米爾文，泰魯固文，馬來雅冷文以及英文版。多達四十六種，共計十七萬五千冊，其中包括毛主席所著的「實踐論」、「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書，已用英文和印度若干種語文出版，共達二萬六千冊，孟加拉文譯本已發行三版，共一萬一千冊。

（上接47頁）（例如電影哈姆雷特、巴斯特傳、居里夫人傳等）多置而不論，甚或一筆抹殺，我以爲也應該給以適當的評價。資本主義的藝術，在現今走向沒落的途徑，這是一個事實，但也曾有過繁榮時期。日丹諾夫在一九三四年對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講話中就這樣說過：「資產階級文藝的噴落和崩解，產生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和沒落，代表着一個特徵，即現今資產階級文化與資產階級文藝狀態的特徵。那個時代，即反映資本主義制度戰勝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文學，即有可能在資本主義繁榮期間產生偉大作品的時代，已是一去而永不復返了。一切都日趨委頓——主題、才力、作家、主角。」以這樣的資本主義沒落期間的藝術與古希臘繁榮期間的藝術相較，那自然是顯得更爲退步的了。關於我解答第一個問題中說「大概從猿進步到人，人便能在勞動中創造工具，由工具再進步到工藝。」承黃岳山先生指出「大概」兩字不妥，應改爲肯定的語氣，並此誌謝。

論統計學的對象及其科學基礎

——評勾適生著「統計學原理」

劉鐵華
新

中國人民當取得了全國政權以後，就必然要加强國防建設，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開始經濟建設方面的工作，以鞏固和擴大人民革命的成果。而在國家建設上逐步地有重點地實行計劃經濟，也就成爲必須解決的課題。實現計劃經濟最重要的條件和基礎之一，也就是建立統計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年多以來，統計工作獲得了巨大的成績；譬如舉行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全國規模的公營及公私合營工鑛企業普查及部分地區的農業普查，建立了和正在建立着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統一表報制度，逐步建立和加强各業務主管部門各地區的各級統計機構等。這些統計工作之所以獲得相當的成就，首先便是由於蘇聯的先進經驗與科學統計理論的指導。所以我們要想解決統計理論的問題，便應當肯定地學習和傳播建立在馬列主義基礎上的蘇維埃統計學。與此同時，自然也應當對於我國一些統計學的新著給以很大的注意。

正當這個時候，勾適生先生出版了一本「統計學原理」。由於我國統計學新著甚少，所以我們以最大的關切來注視這本大著。但我們讀過之後，認爲這本書是有嚴重理論錯誤的。不久，我們看到作楫先生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意見與荷生先生在經濟週報上的評論，接連又看了勾先生的兩篇答覆。我們覺得作楫與荷生兩先生還沒有對此書提出基本問題來深加研究，而對於任何一種科學，某些基本問題是必須首先弄清楚的。因此我們願意爲着科學進步，爲着實際統計工作的開展，利用這個機會，從一些基本問題上，提出我們的意見。

一 關於統計學研究的對象問題

當我們研究任何一門科學的時候，首先便應當回答這門科學的對象問題。

那麼統計學的對象是甚麼呢？

馬列主義統計學這樣告訴我們，這個問題可以分作兩個方面來談：第一，應當說明什麼是統計學中的研究對象（在這門科學中研究些甚麼事物和現象。）第二，應當說明什麼是統計學教程中的闡述對象。（這就是說，作爲一本統計學教程所應涉及的內容。）後者將在本文第三個問題中說明，這裡祇談研究對象問題。

列寧教導我們說：「統計應當說明由全面分析而確定的社會關係，而不是如我們這裡常常發生的那樣，把統計本身變爲目的。」（註一）這就是說，統計所要研究的，是社會經濟現象的本質，而不是爲統計而統計。

馬列主義統計學的創始者列寧、斯大林一開始就規定了「統計學是認識社會最有力的工具之一。」（註二）是進行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武器。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列寧在「布爾什維克能否維持國家政權」一文中寫道：「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困難是要在全民的規模內，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最公平和正確的核算和監督以及工人監督。」（註三）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後，列寧又指出：「社會主義就是核算。」

斯大林也發展了關於統計作用的學說，他說：「任何建設工作，任何國家工作，任何計劃工作，如果沒有正確的核算是不可想像的。但如無統計，核算也是不可想像的。無統計，核算是一步也不能前進的。」（註四）

作爲統一的國民經濟核算制度之一的統計，在蘇聯便成爲國家有計劃地領導國民經濟的重要工具，蘇聯三十年來統計學的發展和統計工作的成就都已證實了這一點。歸納以上，我們便可看出，成爲統計學所研究的不是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現象，而是這些龐雜的社會經濟底現象與過程。

所以肯定地說：「統計學乃是一種社會科學，它研究社會經濟的現象與過程，研究這些現象與過程的類型和狀態，並把它們用數字表現出來，而這些數字則是以全面分析社會經濟關係爲基礎所蒐集和研究出來的。」（註五）因

此，統計學的對象乃是社會經濟的現象與過程。它是研究和表現社會關係的，而在階級社會裡，統計學則要研究和表現階級關係。

統計學在研究這些事物和現象時，用數字來反映和說明它們。統計學的語言便是數字。但是統計學進行社會經濟現象與過程的數量記載，是爲了研究其質量的發展，特性和劃分各種社會經濟類型。所以，統計學只有根據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進行正確的分析和分類，才能用數量記載的方法，揭發社會經濟過程與現象的本質。

但是相反的，在資產階級統計學家中，便把作爲研究對象的事物現象底數量方面和質量方面孤立並對立起來。這在英國統計學家鮑萊 (A. L. Bowley)，攸爾 (G. U. Yule) 以及美國的雷葯裴等都把統計學看成是一種「計數的科學」，「計量而不較質」，是一種單純研究「統計方法」的學問。把統計的對象看作是「受多項因素交織影響的數量材料」(攸爾)，也就是所謂盲目的偶然過程的「大量現象」，因此，他們最後不得不以大數法則作爲統計學的理論基礎，而陷入煩瑣的抽象的形式數學主義。

中國從前的統計學著作，在統計學的研究對象這個問題上，并沒有脫出上述的資產階級觀點。勾先生的新著裡也有類似的說法。如：「數的現象或者說是現象的數的方面，都是數學和統計學所要研究的對象」(註六)。事實上，離開對事物的經濟分析與本質了解而單純作數量的研究，是沒有科學意義的，是不能獲有任何結果的。這裡有一段故事：據說第一次資本主義大戰時，德國的一個軍官，計算一個急待使用的防禦工事，一百人七日可完成，他便單純從「現象的數」的方面計算，企圖用七百人一日修完，但七百人擁擠起來不能工作，而且目標顯著，結果不但不能修好工事，而且全被敵方發現炸死了。這段故事也許舉得不很恰當，但至少可說明：脫離事物本身的實際內容而單從量的方面研究的危險性是如何之大。而勾先生的著作中似乎對於這些也沒有給予應有的警惕，只對數量作出抽象的公式和演算，而沒有着眼於社會經濟現象的研究與分析。

由於對統計學的研究對象有着上述的看法，所以勾先生的結論爲：「統計學在本質上是數學的應用或應用的數學，所以說，統計學是一門自然科學。」(註七) 這與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把統計學看成「數學的一分支」(如過去大學常用的教本「統計方法」著者美國密爾斯)，並無二致。並且勾先生最後倡議「統計學應列於理學院，可以讓統計學有個合理的發展」的說法，(註八) 實際上恰將使統計學窒息在形式數學主義的狹範裡，得不到應有的發展！事實上按蘇聯先進經驗恰恰相反，統計學却正列入經濟學院裡或專設爲經濟統計學院。

我們考慮，由於把統計學的對象祇看成是「現象的數」，是所謂「大量現象」(即勾著指的「統計數列」)，因此勾先生把統計學看成是一種純方法的科學，一種「普遍」的原理。好像它既適用於自然現象與過程的研究，又適用於社會經濟現象與過程的研究。(註九) 這種抽掉事物質量上的特點而作出的一些共通的統計「原理」與「方法」，我們想只能是一種毫無實際意義的抽象。

我們且舉兩個例子談談。譬如生物界的繁殖規律與人口的自然增長，便不能找出一種共同的抽象的原理來同時說明它們增長的現象與規律。

因爲生物的繁殖是自然界的現象，而人口的增長則受一定歷史條件，生產方式的影響。無產階級的人口增長與出生死亡等現象和規律既不同於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人口發展的規律更不同於社會主義社會。這兩種現象雖有表面的類似，但各具有其運動與發展的特殊法則。假使不從具體的質量方面着手而希望它們之間存在着什麼共通的「統計原理」是不可能的。

另外，日月運轉的週期變化和資本主義初期所謂「經濟循環」，所謂「週期性的經濟危機」，表面上雖然類似，但事實上二者仍然各有其運動與發展的特殊法則。因爲後者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衝突的表現。這種矛盾和衝突，最後必然爆發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而得到根本的解決。所謂「週期性」受自然規律的支配是騙人的。

這裡應該指出的，這種說法，把統計學認爲是包攬自然界和社會的一般科學是資產階級學者的論點。資產階級就慣於把對社會生產關係的注意引向抽象的數學公式和一般的共通原理方面去，慣於把自然法則移植到社會關係去。譬如將生物學法則移植到人口法則中來掩飾資本主義國家人口變動的醜陋情況，把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看成是週期性變化中的自然現象。

必須再度指出，統計學作爲一門科學來說，它是社會科學。因此也可以稱它爲社會——經濟統計學。(它與工業，貿易，人口等結合而成專業統計學，即工業統計學，貿易統計學，人口統計學，經濟統計學)，統計學也有個別的方法(如大量觀察法等)應用到自然現象與過程的研究上去，但統計學原理仍以社會經濟現象與過程爲其研究規範。

把統計學看成是可以運用到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共同方法，勾先生最有

力的根據之一便是蘇聯專家葉若夫等人合著由徐堅同志譯出的「統計學教程」上有此說法。其實此種說法正是這本書的缺點。這是蘇聯統計界早有批評(註十)，並爲葉若夫等所承認而在以後修正的了。由於勾先生沒有獲知馬列主義統計學的這些新的成就，就使它的著作在根本上錯誤了。

二　關於統計學的科學基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

統計學的科學基礎——理論基礎和方法基礎，使馬列主義統計學在原則上和資產階級統計學區別開來。

我們已經說明了統計學的研究對象不是包攬着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而是社會經濟現象和過程。現在我們進一步來研究統計學應在什麼基礎上來研究，根據什麼理論？依據什麼方法？

列寧曾不知多少次的指出：統計不能脫離政治經濟關係的本質。在批判俄國民粹派脫離社會現象的經濟本質濫用統計材料以圖證明資本主義在俄國沒有得到發展時，列寧寫到：『他們可笑地把大機器工業的發展問題列入一個製造廠——工廠統計問題之內，這個問題不僅是個統計問題，而是形態和階段的問題，這些形態和階段是某一國家的工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要經過的。只要在闡明這些形式的本質和他的特性後，用以適當的方法而蒐集起來的統計材料去證明這種或那種形態的發展才有意義。』(註十一) 在這種，列寧清楚地指出：經濟理論的分析，要先行於以統計資料爲基礎的具體分析。也就是說，依據正確的經濟理論對統計資料進行具體分析，此亦即它的理論基礎問題。(反過來，統計實踐又可以豐富與充實經濟理論，此點暫不引申)

勾先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是有待商量的。勾先生寫道：『到現在爲止，大多數的統計學著作都以機率爲統計學底基礎，我承認機率在統計學上所佔的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反對把機率當作唯一的基礎。事實上若是把機率抽掉，恐怕許多的統計著作就成了空架子了』。(註十二)在另一處又說：「機率是統計學的基礎之一」(註十三)。

勾先生已感到不能再像資產階級學者一樣，以機率作爲統計學的唯一基礎，但又未能明確指出它的基礎究竟是什麼，所以最終還是把機率當作「許多統計著作」(統計著作範圍甚廣，應分別對待，此語很含糊)的「空架子」中的基本內容了。

認眞地說，勾先生所認爲統計學的所謂理論基礎恐怕還未脫出機率。

我們應該認淸：馬列主義的統計科學中，廣大的研究領域都是用全面調查(各種普查、表報制度)或其他非全面調查(如重點法、個別示範法)來進行的，因此，許多指標的研究與計算都是與機率論沒有任何聯系的，例如計算各種產品的總生產量，商品生產量，各種指數，勞動生產率，全國人口數，牲畜數，企業數等。

我們還應該指出，資產階級統計學之所以以機率論作爲理論基礎，是由於(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限制，(二)資產階級自身利益的限制。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由於財產私有制，一切經濟現象呈現爲盲目的無政府的狀態。而資產階級庸俗的政治經濟學又不能對這些盲目自發的現象之本質和規律性有任何說明，於是從社會生活的表面現象出發，而且把社會經濟現象看成是偶然的聚積，他們便只好把數學上的機率論作爲研究人類社會，也作爲研究統計學的理論基礎了。

其次，資本主義國家的統計學是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列寧說：『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粉飾資本主義和使人們不注意階級的鴻溝』。(註十七)因此他們不關心也不願意用統計學來說明社會現象的本質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眞正規律，恰恰相反，他們利用基於機率論上的形式數學主義的，玩弄繁複數學公式的統計學來粉飾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掩蓋獨佔資本家利潤的增長，以及僞造資本主義經濟無限發展的圖畫。資產階級統計學者慣以時間數列中長期趨勢和循環變動的研究來模糊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濟危機和生產波動的事實。但勾先生却未批判地將這些問題提出來，如在該書第十二頁寫道：『處理延長數列所得到的加工的成果是各種指數，長期趨勢，季節變動，循環等等』。

以上是說到統計學(或社會經濟統計學)的理論基礎是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現在再簡單談一下它的方法論的基礎——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在統計學研究社會經濟現象上的應用。

爲統計學所研究的社會經濟現象與過程，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相聯系着的，因此，統計學要在事物的全面聯系和發展中來觀察。列寧在其未完稿「統計學與社會學」一書中寫道：『一個事實，如果是從其整體中，從其相互聯系中抽取出來的，那麼它就不僅是確鑿的，而且無條件是眞實的東西。一個事實如果不是從其相互聯系中抽出來的，如果它們是支離破碎的東西，則它們無非僅是一種玩物或較玩物更壞的東西而已。』『爲了使它們成爲一個眞實的基礎，就應該不去抽取個別事實，而是必須毫無例外地去抽取包括一切被觀察的問題有

關聯的事實的整個總體……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決定由統計學做起』（註十四）

統計學不但對大量事物進行全面的觀察，發現出在一定狀態下的典型的事物，而且還要探索和顯現新的前進的事物底萌芽。統計學是將發展視作由微小的不顯露的量變到顯露的、以飛躍的過渡方式，由某一狀態進入到另一狀態的質變。

統計學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這些觀點，乃有其特殊的大量觀察法、個別示範法，分組法，平均數和相對數法，動態指標法，指數法。其中大量觀察法，一般化指標（即平均數相對數等）及分組法是統計學中特有的基本方法。分組法則又是這些方法中的最主要的方法。統計學用這種方法將所搜集的事物科學地區分開，以構成質的同類組，並指出新的先進的事物。

勾先生好像也注意到這一點，在其自序中說：『唯物辯證法所追求的是眞理；統計學也是這樣。唯物辯證法說一切事物是互相聯系的，不斷變化着的；統計學也完全運用這些法則。』（註十五） 但在全書其他地方並沒有研究過或提到過這些問題，或看到有什麼辯證唯物論或歷史唯物論的應用，當然更沒有什麼發揮。我們覺得這也是很可惜的，因爲一個作者若把馬列主義僅僅裝璜在自己著作的序言里，那是對廣大讀者有害的。

全書沒有討論到個別示範法及最重要的分組法等，便可看出根本沒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事實上抽掉事物的一切質量而單就數字作演算的「統計學」，也根本沒有涉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可能與必要。

三　關於「統計學原理」的內容問題

正如在討論統計學研究對象時所談到的一樣，一方面應說明統計學中的研究對象，"一方面應說明統計學教程所應闡述的內容。

基於統計學的研究對象，因此作爲一本統計學教程或統計學原理，就應該闡明用以研究社會經濟現象過程的原理與方法，闡明關於國民經濟發展的數字資料的蒐集和研究的基本原理與方法。這種原理與方法是一般性的，它將應用在工業，貿易，農業上而成爲各種專業統計，如工業統計學，貿易統計學，農業統計學。但顯然的，這種一般的原理與方法決不是如勾先生著作上純數學運算的公式，而是一刻也不能與統計學所研究的對象的本質分離的。

統計研究通常分爲調查，歸納，分析三階段，因之，統計學原理就應說明如何組織計劃進行調查（如組織普查，建立表報制度）；如何進行材料的歸納和整理，利用分組法劃分材料的各種類型；以及如何進行統計分析等；而且在闡述這些問題之前，首先應說明它的方法論。所有這一切最使我們關心的實際問題，勾先生一個也沒有回答。

所有這些內容，都說明統計學原理是與統計工作的實踐密切結合而不能分離的。它指導着統計實際工作，同時又爲統計實踐所考驗、所豐富 。斯大林說：『科學的原理向來都是由實踐由經驗來考驗的。如果科學和實踐斷絕了關係，和經驗斷絕了關係，那它還算是什麼科學呢？』（註十六） 我們覺得勾先生的著作對於目前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前巨大的統計工作任務沒有給予任何解決，很爲可惜！看來它非來自統計實踐，而應用於統計實踐也就不可能。差不多是給我們這樣的印象，它好像只是從數字中來再到數字中去的數字演算！

雖然我們並不反對任何人對數理方面的鑽研和發現，但反對脫離實踐的鑽研，統計學作爲一門科學，就必須嚴格遵守理論和實踐統一的這條規則。列寧早已教導我們說：『統計學者必須是我們的實際助手，而不是煩瑣哲學家。』

因之，今天擺在我們統計科學工作者面前的，首先應虛心而認眞地學習蘇維埃——馬列主義統計學的先進理論及其統計工作的豐富經驗，並且要和資產階級的或其他一切非馬列主義的統計學作不調和的堅決鬥爭，以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統計事業。我們提出以上這些意見，希望與全國統計科學工作者本着科學和進步的精神，大家虛心地商討研究，一道爲了統計科學的進步，努力前進！

一九五一年二月於北京

（註一）列寧全集，第四版，卷三，四三三頁。

（註二）列寧全集，第四版，卷十六，四〇〇頁。

（註三）列寧全集，第四版，卷二十六，八〇頁。

（註四）斯大林全集，卷六，二一四頁。

（註五）「爲馬列主義的統計理論而鬥爭」，第一〇頁，東北統計局編。

（註六）勾著統計學原理，第七頁。

（註七、註八）均見勾著正文第七頁，自序第六頁。

（註九）勾著第十三、十四頁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大公報載勾著「統計學不是社會科學」短文。

（註十）上海大公報勾文「統計學不是社會科學」。

（註十一）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九，三二九頁。

（註十二）勾著一五四頁。

（註十三）勾著一六六頁。

（註十四）列寧全集，第四版，卷十九，三二九頁。

（註十五）勾著自序第五頁。

（註十六）列寧主義問題，第六六四頁。

歷史的歪曲

——評「豪門梁冀」（開明青年叢書）

金燦然

吳方平著　開明書店　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

這本小冊子以梁冀爲典型，搜集了一些材料，暴露封建社會中所謂豪門的罪惡。梁冀，照作者談，「是一個十足的具備了寄生的性格，位高祿厚，極盡了奢靡、暴虐的罪惡，只知玩弄權柄，剝削人民，而絲毫沒有供獻的人。」（序文頁七）拿這個人來做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給以解剖，是足以顯示出某些封建統治者的殘暴的面象的。

從序文及本文行文的口氣中可以看出，這本小冊子的寫作時間當在解放以前。作者的企圖，在於「要把這一千七八百年前的史實拉到現在來作一次歷史的現實的認識」（序文頁一二）。也就是說，在於以古喻今，要借梁冀來揭露四大家族的罪惡。解放以後，作者把舊稿作了某些修改。但是在這本小冊子中仍然存在着若干嚴重的錯誤。

第一，作者的社會發展史的概念是極其糊塗的。

作者說，「封建社會的基本的生產關係，就是階級關係，更透澈的說，就是剝削關係。」（頁一一五）這等於說了一句空話。試問，奴隸社會的生產關係難道不是階級關係與剝削關係嗎？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難道也不是階級關係與剝削關係嗎？問題不在於是階級關係與剝削關係，而在於是怎樣的階級關係與剝削關係。「在封建社會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封建主佔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佔有生產工作者。」（斯大林）

由於對封建社會生產關係缺乏正確的認識，因而產生對東漢的階級關係的錯誤的分析。

作者認爲，東漢時代一部分與外戚豪門對立的知識分子是屬於「小所有者一階層的。「對於外戚和宦官的統治集團表示反對而又擁護君主的是小所有階層出身的那些士子。」（序頁一〇）「太學生……裡面固然也有豪門子弟，還是以小所有者的階層比較多些。」（頁七三）「李固和杜喬是小所有階層中知識分子的代表。」（頁八）這個小所有者階層，照作者分析，「不會和農民一起叛亂，可是他們也不能忍受當時的暴政，在政治上，他們受豪門、宦官的排壓，在經濟上，他們受商人、地主的侵略。」（頁七三）這兒表現了作者對階級關係認識上的極大的混亂。「小所有者」階層旣擁護君主，又受商人和地主的壓迫，他們又是站在農民之上的，那麼，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所有者」呢？他們到底「所有」些什麼呢？其實作者所指的小所有者不是別人，正是地主階級裡的一部分。這個階層與豪門的區別，只是在於他們手中的土地財富少些，政治上不是當權派，喜歡唱唱淸議而已。

作者又認爲，兩漢的政權是「商人、地主的政權」（頁六）。「兩漢的政府雖然以輕商重農爲一貫政策，然而因爲政權的本質是商人地主的政權，所以商業資本依然在重稅之下不斷地累積起來。」（頁一二〇）他並且認爲，「地主階層收奪了農民的土地，商業資本又在農村中趕出了農民，造成了農村社會的離散。」（頁三一）這兒又是一個階級關係的混亂。在封建社會中，是否可能有一個商人與地主的政權呢？如果兩漢是這樣一個聯合政權，那麼，什麼人是代表商人的利益的呢？而且，爲什麼收奪了農民的土地是地主，把農民從農村趕走又是商人呢？作者的論點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在事實上是找不到根據的。封建社會的政權只能是地主專政的政權，收奪農民土地，從農村中把農民趕走的都是地主。至於商人，本身大都是地主，在政治上，也是支持地主的專政的。

第二，作者對於知識分子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作了不正確的估計。與豪門外戚作鬥爭的清議派知識分子，企圖限制一下豪門外戚的權力，在政治上實行一些改革。這在當時是有一些進步意義的。但是由於他們在鬥爭中所採取的方法只是清議，而且他們之中的某些人還是直接破壞農民起義的，這就不能不使他們的鬥爭陷於失敗。作者在不少地方對清議派的鬥爭有過高的稱頌，譽之爲「讀書人的革命精神」（頁三二），「表現了腐爛社會裡尙未腐爛的士的氣節」，「肯定了知識分子的道路」（頁七八）。並且稱頌不久即將起來的黨人爲新生的力量，「是當時在社會中的消毒素，……他們本身是健全的，有望的。」（頁一三八）雖然在其他地方作者對這些人也有一些批評，批評他們的唱高調，批評他們不澈底，但是他的批評與稱頌彷彿是兩回事，在稱頌的時候，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他把知識分子當作了推動歷史發展的主體或領導力量。

尤其不應該是，在稱頌清議派的知識分子的時候，竟把他們的反人民的行爲也當作正義的行爲來一齊稱頌了。李固在荊州刺史任內，曾經用「招誘」的辦法，壓平了境內的農民起義。張綱在廣陵太守任內，曾經用欺騙的方式，分化了農民暴動的力量，收買了農民暴動的首領。作者敍述了以上事實之後，很惋惜地說，「像李固這樣淸正的人有幾個呢？」（頁三四）「整整隔了一年，壯年的張綱在廣陵齎瘁死了。」從全書敍述的次序及行文的口氣中完全可以看出：當階級鬥爭表現爲一方面是起義的農民，另一方面是淸議派的知識分子的時候，作者是站在後一方面說話的。

第三，保留了對農民起義的反動稱謂與反動辭句。

書中在很多地方稱起義的農民爲賊、盜、匪、妖賊、流寇、海盜、江賊，稱農民的起義爲寇、掠、反叛、叛亂、打劫、人禍、匪禍，稱對農民起義的鎭壓爲撫、誘、誅、討破、討平、破斬、破平、招降、戰破。有的地方簡直也是反動史學家的口氣：「以周生、徐鳳爲首，已在打劫州縣」。（頁三一）「荊州正是盜匪蠭起的地方。」（頁三四）「傾家的人，有的挺而走險，流爲盜賊；有的向內地、向都城流亡，騷擾了鄰近的州縣，給京都一種陰暗的不安的感覺。」（頁四一）在頁四二及頁一三一中，幾乎整頁直抄舊史書，滿篇是對農民起義的汚衊詞句。書後三個附表之一的「東漢順沖質桓四世外患內亂表」中，對於農民起義也全部是歪曲的說明。

第四，無批判地堆積舊史料，有的地方成了帝王將相的家譜，有的地方甚至流於迷信。

在頁五二至五四，作者花了不少篇幅敍述劉秀的家譜。「劉秀有十一個兒子，劉莊有九個兒子，劉炟有八個兒子。」「劉炟的兒子有全、淑、萬歲是夭亡的，剩下伉、慶、肇、壽、開五個。」「六房開的子息是很興旺的，除了冀嗣給勝，德嗣給劉莊之後的老四房黨以後之外，政嗣着爵，還有十三個兄弟封做亭侯。」這一些，對於歷史的發展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要花那麼大的氣力加以考證，加以敍述呢？對於梁冀的家世，敍述得更詳細，由他高祖的高祖敍述起，足足花了十五頁的篇幅。梁冀的高祖「梁統的性格很是剛毅，又喜歡法律。」梁統的兒子梁竦「做了幾篇文章，題名七序。當時的文豪班固很稱贊他。」這與梁冀有什麼關係呢？這樣的敍述，除了顯示梁冀是出身「名門」之外有什麼作用呢？在頁九七上，甚至把與本題關係很少的耿承的家世，也做了詳細的介紹，說他的曾祖是雲台二十八將耿弇的弟弟，他的兩個兄弟也都封了什麼侯。

更無聊的，是有的地方變成了艷史。頁一〇五竟介紹了梁冀的妻子孫壽的美貌，對她的妖態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逐一加以解釋。對於梁氏姊妹，在若干地方也作了過多的介紹，不只介紹了皇太后梁妠是什麼時候死的，而且介紹了皇后梁瑩死後葬在什麼地方。

封建時代的歷史書中，記載了許多災異。有些記載是能反映一些當時的社會情況的。但是由於認識水平的限制，這些記載有很多是很無聊，而且有的是反科學的。這些記載，本書也無批判地抄錄下來。頁四〇、一三〇及附表「東漢順沖質桓四世災異表」中，記載了許多地震的情況，如「京都地震」「河東地裂」「東海朐山崩」「漢陽地拆水涌出」等等。地震是一種自然現象，與劉家統治的好壞有什麼關係呢？「災異表」中還有許多關於宮廷、皇陵的火災的記載，如「承福殿火」「德陽殿火」「承善闥內火」「茂陵寢災」「恭陵廡災」等等。這與劉家的統治有什麼關係呢？與歷史的發展有什麼關係呢？最無聊的是這樣一些記載：北地下雨「落下羊肺似的肉，有手掌大」，「太學門無故且壞一」，「五色大鳥見濟陰己氏」。對於這些含有迷信色彩的記載，作者是否相信呢？如果不相信，爲什麼又無批判地記錄下來？

這本小册子的錯誤，當然不止以上四點。我所以就這四點來加以批判，一方面是由於這是這本書中的主要錯誤，另一方面是由於這些錯誤在歷史著作中有着代表性。從精神上，不是從詞句上，掌握唯物史觀的觀點和方法；認眞地，不是隨便地，把這種觀點和方法運用來研究和分析中國的歷史，對於我們是一個嚴肅的任務。

學術文摘

文摘這一欄，主要是爲了節省讀者的時間，摘錄的部分，只能包括各篇論文的要點和結論，以便讀者瞭解全文的大意。——編者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

陳伯達

一 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最傑出的代表

毛澤東同志對於中國革命的最偉大的功勞，便是他正確地和生動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解決了中國革命中一系列的問題。他在中國和東方的條件下，推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科學的發展，因而指導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

三十年來，毛澤東同志不斷地和黨外的各種反動思潮及黨內的各種機會主義，作了不調和的鬥爭。毛澤東同志在這一連串的鬥爭中，表現出他是傳播和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說的偉大能手。他所進行的這一連串的鬥爭，壯大了和鞏固了中國共產黨。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特點。毛澤東同志從來不把他所從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和羣衆的革命運動分離開來。他隨時隨地聯系着中國革命的實踐，『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去考察、吸引和集中中國革命各種實踐的經驗。

二 近代中國是東方許多矛盾的焦點

近百年以來，特別是十九世紀末年以來，在東方，中國曾經是許多矛盾的焦點。主要地說來，其一是各帝國主義相互間激烈爭奪的焦點，又其一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鬥爭的焦點。

中國工人階級形成其特出的戰鬥性，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它身受幾重殘酷的壓迫，即外國的帝國主義、本國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迫；第二，它是很集中的。這些原因，就使得處在革命中的中國工人階級形成了很強大的戰鬥力，形成了自己堅強的政黨——共產黨，并成爲中國各革命階級的領袖。

當然，不可能設想，革命在這個曾經成爲各帝國主義爭奪焦點和在年代上有很長久的封建制度的大國，是能夠輕易取得勝利的。中國革命的進行是極其殘酷、複雜而曲折的。這樣，就極大地鍛鍊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極大地鍛鍊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而這種豐富的革命經驗，也就又變成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非常寶貴的財富；這種豐富的革命經驗，也就不可免地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

中國這種豐富的革命經驗，就是集中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上面，集中表現爲毛澤東思想。

三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把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看成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

根據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毛澤東同志從來不把中國革命當成孤立的問題去看待，而是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全局去看待它，從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全局去看待它。

這是因爲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是社會主義已在蘇聯首先勝利的時代，是馬克思主義的新時代即列寧主義的時代。這是因爲中國的革命首先就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

毛澤東同志引述了斯大林的文章，并根據了中國革命長期再積累的經驗，重新提出并詳細論述了中國革命基本方向——也即中國革命基本路線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說明了：『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四 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衆的革命

毛澤東同志根據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引起的世界歷史的根本變化，以及中國近代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所引起的中國歷史的根本變化，指出了在這種變化之前的中國革命爲舊民主主義的革命，即在資產階級領導下的民主主義革命；在這種變化之後的中國革命爲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即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民主主義革命。

毛澤東同志從黨建立後的第一個革命時期內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起，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一直堅持列寧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學說。

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爲

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

毛澤東同志把這個革命，規定爲下列簡單明確的公式：『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的人民大衆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毛澤東同志把反官僚資本這個新東西加進到這個公式裏面去，就成爲這樣的公式：『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和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毛澤東同志認爲這就是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

在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這個公式裏面所說的人民大衆，主要的就是指農民。這個革命是以工農聯盟爲基礎、但包括一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人們的革命。

五　從農村的革命根據地到全國的革命勝利

大家知道：中國革命是經過了長期艱苦的鬥爭，是經過了不斷地奪取一個陣地又一個陣地，而後取得勝利的。從一九二七年以後，這種陣地的奪取並不是從大城市開始的，而是從農村開始的。從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把自己的工作重點移到農村，在農村聚集力量，用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這是毛澤東同志堅持的工作路線。事實早已證明：這個路線完全勝利了，因爲它是正確的路線，唯一正確的路線。

這個路線是根據於最堅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情況的科學分析。

毛澤東同志在軍事上的偉大貢獻之一，乃是在中國革命長期發展的過程中，把中國革命的游擊戰爭提到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來理解它。

毛澤東同志在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上，極其生動地、極其光輝地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並步步地和勝利地證明了這辯證法。

六　又聯合又鬥爭的廣泛統一戰線

顯然，否認中國革命有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在一定條件下的必要性，這乃是很錯誤的。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一定歷史條件中，有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可能性。

當然，在這種統一戰線中，必須不致模糊無產階級自己的獨立面目，必須絕對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無產階級必須在統一戰線中樹立自己的領導地位。這種原則也是列寧斯大林所已規定了的。

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特別是根據共產黨和國民黨進行過統一戰線的經驗，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這些觀點，並形成了一套關於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完整的正確的政策。

毛澤東同志把中國共產黨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策，特別是如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對於國民黨大資產階級的政策，叫作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其所以需要又聯合又鬥爭，原因就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二重性。

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可能性，是聯合的政策；對於它的動搖性和妥協性，是批評的政策，也即是另一種鬥爭形式的批評政策。

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毛澤東同志還指出了革命勝利後，在經濟上和民族資產階級進行統一戰線的必要性。

當然，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明的：在經濟上的統一戰線，也必須有又聯合又鬥爭兩方面的政策。我們對於資產階級的發展工業生產的積極性，是聯合的政策；而對於資產階級的投機操縱和破壞政府法令與經濟計劃的行爲，則又是鬥爭的政策。

七　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問題

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他說：『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於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與急性病。』

從全部革命運動的發展看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是爲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建立社會主義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

爲什麼會有這種轉變和過渡的可能呢？從階級來說，這就是由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從黨來說，這就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混淆民主革命的階段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乃是完全錯誤的。但另一方面，這絕不是說，在民主革命階段中，不能夠包括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東西，如果這樣想，當然也是完全錯誤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在政治上有關於社會主義因素方面的，主要的是什麼呢？這就是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權機關中的領導地位，在人民軍隊中的領導地位。這是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所已經規定了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在經濟上有關於社會主義因素方面的，主要的是什麼呢？這就是沒收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企業歸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這『就使人民共和國據有國家的經濟命脈，成爲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共同綱領也把這點明白規定了。

不錯，我們要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還是需要相當的時間的。但是我們這個前提已經有了。我們這個道路已經打開了。這還需要種種準備和鬥爭的過程，但是我們的前進是完全可靠的。

八　黨的建設問題

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過程，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日益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

毛澤東同志經常說到：如果沒有一個列寧斯大林式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黨，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同志完全認爲：我們的黨要真正能夠完全勝任担負一系列偉大歷史的任務，要真正能夠把中國人民從一

個勝利引到又一個勝利，首先就必須在黨內形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鞏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領導。

毛澤東同志對於黨的問題所給的很突出的貢獻之一，便是指出了這兩種從不同的兩極表現出來而又可以合流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並由此指出了克服這兩種主觀主義的正確方向。

把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和不斷地研究羣衆的經驗結合起來，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的領導。

怎樣能夠不斷地把羣衆的意見和羣衆的經驗集中起來而又到羣衆中去呢？這就是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指導原理。

我們二十年來的黨史，就是這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領導和那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領導兩方面鬥爭的歷史，又正是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戰勝錯誤領導、從而克服革命的挫折和困難，終於把革命引到偉大勝利的歷史。

這種正確領導在思想上反對主觀主義，在政治上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是和那在組織上反對宗派主義的鬥爭相聯系的。

舉起了這個反宗派的旗幟，團結了全黨，又發展了黨和羣衆的正確關係，便是毛澤東同志對於黨的問題所給的很突出的又一個貢獻。

毛澤東同志對於黨的問題所給的很突出的第二個貢獻，就是提出了一種適合於我們黨內鬥爭的運動形式，即整風運動的形式，學習運動的形式。

人們都能夠看出：整風運動極大規模地而又極深刻地改變了我們黨的面貌：其一，是我們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水平因此很大的提高了，其二，是我們黨在中央委員會和毛澤東同志的週圍達到了從來所沒有的大團結。

這就是說，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我們的黨已經是能夠勝任擔負一切歷史任務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黨。

九　結束語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一個近五萬萬人口大國中的勝利。這個革命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又一次偉大的革命，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內所舉行的另一種典型的大革命。

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在思想上和理論上集中地表現出中國這一個典型的革命，集中地表現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個革命中的極其生動的力量。

毛澤東思想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東方的發展。這個東方革命的集中的經驗，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有重大的意義的。就世界的鬥爭全局來說，這個意義是具普遍性的意義。

（「人民週報」第二十七、二十八期）

反對數理邏輯中的唯心主義

В П 屠曼利諾夫、Л Е 邁斯特洛夫

數理邏輯在現代唯心主義者們把它表現的形狀下，依其方法不過是馬赫主義及其最新的形形色色在數學及邏輯中的出現。

唯心主義的曲解把數理邏輯引入無內容的思想的死巷。有「關係邏輯」的形形色色，依其唯心主義的表現（羅素、懷特黑德等）把一切現象約化成「純粹關係」，沒有這些關係的物質持有者；唯心主義者們企圖從邏輯思惟中奪去一切對象內容，把邏輯的對象看作沒有任何持有的「純粹」關係，看作超經驗的思惟「創造」。他們把邏輯看作「演算」，看作依照確定的形式規則而施行的計算技巧，由邏輯的公理演繹地推導。他們宣稱演繹方法是唯一科學的，把邏輯思惟徹底地由經驗、由實踐割裂開。

現代數學的唯心主義者們企圖證明數學方法可用來代替一切其餘的科學方法，數學是無所不包的科學、一切科學的科學，而數理邏輯是一般科學的方法論。表現得最淸楚的，是塔爾斯基，他宣稱現代邏輯是數理邏輯，「邏輯可以正確地看作一切其他科學的基礎」，「並不假定任意以前的學科」，「凡演繹理論必是數學的部門」。

恩格斯在其天才的著作「反杜林論」中指出：凡想由數學公理以至某門科學自己的公理推出某門科學的內容的企圖是毫無根據的。

讚揚演繹法，以及分科學爲演繹的與歸納的，都是一樣不科學的。

沒有一門眞正的科學只應用演繹法，或只應用歸納法。每種科學應用兩種方法。這對數學也是如此，儘管在其中演繹法起着很大的作用。數學推廣的過程，以及數學在技術上的應用，都不能只建立在單獨演繹之上。

馬克思主義對數理邏輯的態度，並不是全盤否定它。問題不是要「取消」數理邏輯，而是要剔去其中反動的傾向以及反映敵對我們的階級的意識形態的種種曲解。

首先，應當堅決地清除那種把數理邏輯當爲最一般的科學方法論的僭妄。其次，應當同樣堅決地清除掉把數學看作「科學的科學」的僭妄。第三，應當去棄對於數學及其理論基礎的片面演繹的及先天公理的觀點。第四，應當解決數理邏輯是否實在是邏輯，它在邏輯中起着怎樣的作用。第五，應當堅決地克服那種「觀念」，認爲數學是「特殊」的科學，只有形式邏輯才適用於它。

（關肇直譯，「科學通報」二卷六期）

本刊歡迎：投稿、批評、訂閱

黨與文藝

荃麟

黨與文藝的關係——也就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對於文學藝術的關係——是革命文藝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決定它的思想內容，藝術態度和社會影響的基本條件。

黨的文學的原則，列寧指出是：『文學事業必須成為總的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的一部分』。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是發展列寧關於文學的黨性原則底另一個最重要的貢獻。這個座談會的目的，如他在引言中開宗明義所指出的，『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他首先提出的，就是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共產黨員還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

黨與文藝的關係，基本上就是表現在文藝與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的關係上。『藝術是屬於人民的，它應該深深地在廣大勞動羣眾中生起根來；它應該為羣眾所瞭解，並被他們所愛戴』。（列寧）因此最好的文學藝術，必然是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的文學藝術。最高度表現着人民性的是什麼呢？這除了領導人民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思想以及它的綱領和政策以外，是不可能有更高的東西的。文藝的黨性就是作為文藝人民性的最高表現。

三十年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過程，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是說明黨與文藝的關係底最好一個例證。這個文藝運動，一開始就是在十月革命的號召之下，在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之下成長起來的。三十年來，它始終是黨的革命事業，也即是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的一個有力組成部分。它經歷過各個革命時期，始終堅持着新民主主義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方向。它的最主要的功績之一，就是在每個革命時期中，即使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歲月中，它把黨的思想和黨的政策通過各種藝術形式和方法傳播到廣大的人民中間，教育和團結了他們，吸引他們大量湧入到革命戰線上來；另一個主要的功績，就是它從開始就提出了大眾化的方向。到了現在，數以萬計的工農兵文藝團體已經在他們自己陣地上展開廣泛的文藝活動。

我們的文藝是怎樣獲得了這些輝煌的成績的呢？怎樣取得這強大的創造力量呢？這不可能有別的解釋，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文藝運動是在黨的直接領導之下和廣大人民的鬥爭密切結合的，它的創作活動和理論活動主要是以馬列主義的科學思想為基礎，並且以黨的政策為依據的。

在述及三十年來黨與文藝的關係時，我們還必須提到魯迅。魯迅是『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最偉大與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魯迅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是魯迅的文藝方向和黨的文藝方向是一致的，從魯迅身上，反映出來中國勞動人民最優秀、最寶貴的品質和最堅定的性格，這是屬於無產階級的。在最後十年中，他的作品中所顯示出的那種高度的思想原則性，完全是馬列主義的。因此，必須肯定：魯迅的文學事業就是黨的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我們不容把它分割開來。

三十年來中國新文藝的光榮傳統，是值得我們驕傲的。主要的一點，是由於這個文藝是屬於人民，服務於人民的。這是決定文藝的人民性的基本條件。我們將怎樣使文藝更好地服務於工農兵呢？即是說，我們將怎樣給予他們以更多更好的東西呢？這些東西不僅要為他們所瞭解、所喜歡，並且要教育他們，鼓舞他們對階級和人民的革命事業有更高信心。這就不能不要求把我們的創作思想提高到黨的水平上，黨的政策水平上來。

堅持布爾什維克偉大的思想性原則，是保證文藝創造力量發展的一個主要條件。這也就是革命文藝區別於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文藝的一個基本不同點。

根據目前的情況，我們將怎樣來展開為加強文藝黨性的鬥爭呢？這個問題是應該由文藝界的黨與非黨同志作為一個中心問題來討論的我在這裡只簡單地提供兩點意見：

第一，文藝的黨性必須在深入的思想鬥爭實踐中得到鍛鍊和發展。這種思想鬥爭的主要方法就是自我批評。

我覺得，我們應該從這次『武訓傳』的討論開始，建立起這種自我批評的良好基礎。在各個文學藝術部門有計劃有組織地把理論學習和思想鬥爭結合起來，明確地具體地找出那些是我們文藝上最有害的非黨思想和不良傾向，那些是應該發揚的、堅持的優點。

第二，加強文藝的黨性，應該要求作家和藝術家深入羣眾鬥爭的實踐中去。

我們許多人中間，有的缺乏實際鬥爭經驗，有的缺乏對現實概括的能力，因此，常常使我們在思想上不能突破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圈子，這種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反映到創作上，就是公式主義和自然主義。公式主義和自然主義的作品是顯示不出思想性的，也可以叫作是無思想性的作品。許多作家常常被這樣的問題苦惱着。毛主席的「實踐論」，在這個問題上，天才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的原理，給予我們以那樣明晰和通俗的分析。「實踐論」的發表，對於整個思想界是個偉大的勝利，而對於文藝工作者，尤其有迫切的需要。認真研究這本著作，並且和自己的創作方法聯系起來研究，這對我們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在實踐的基礎上，鍛鍊我們的思考能力，應該作為我們學習上的一個重要問題。

最後，學習黨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因為黨的政策就是從實踐的基礎上提高為理論原則而又轉過來為指導實踐的東西。

有領導地展開文藝界的自我批評，號召作家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鬥爭實踐，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和黨的政策——我以為是為加強文藝黨性，純潔文藝的思想而鬥爭的主要任務。

（「文藝報」四卷五期）

國內期刊重要學術論文索引

（一九五一年一——六月）

本刊資料室

題目	作者	登載刊物	卷期數
哲學			
實踐論	毛澤東	新華月報	三・三
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	眞理報編輯部	新華月報	三・三
「實踐論」開闢了我們學術革命的思想道路	人民日報社論	新華月報	三・五
毛澤東同志發展了眞理論	艾思奇	新華月報	三・五
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	伏爾科夫	和平民主報	七四
「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	李 達	新建設	三・五
「實踐論」解說	李 達	新建設	三・六—四・三
「實踐論」的認識	王亞南	新建設	三・六
「實踐論」——馬列主義底發展與中國哲學傳統問題的解決	馮友蘭	新建設	三・六
「實踐論」——中國思想史（知行關係）的科學總結	侯外廬	新建設	三・六
從西方哲學認識論的批判來學習「實踐論」	北大哲學系	新建設	四・一
偉大歷史工程底偉大哲理	何思敬	新建設	四・二
「實踐論」的意義及其基本觀點	沈志遠	新建設	四・三
「實踐論」解釋	沈志遠	展 望	七・一三—一八
韓非思想探微	楊榮國	新建設	三・四
實用主義批判	陳元暉	新建設	三・六
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定義	Д・И・戚斯諾科夫	新建設	四・二
美國資產階級「實用主義」哲學批判	亞歷山大洛夫	時 代	三四七
辨証唯物論在現實問題上的具體運用	馬 特	新中華	十四・二
史學			
「實踐論」是歷史教學底最高依據	侯外廬	教育通訊	六・二
學習「實踐論」——一個史學工作者的體會	楊向奎	文史哲	一・一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	胡 繩	學 習	三・十一
論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地位	華 崗	新建設	三・五
關於編寫與講授本國史的指導原則	尚 鉞	新建設	三・五—六
論中國父權社會對於母權的抑制	潘光旦	新建設	三・五
奴隸社會意識形態的研究	周谷城	新建設	三・五
姓與氏	丁 山	新建設	三・六
「五四」——中國人民歷史的轉捩點	陶孟和	●新建設	四・三
五四運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的地位	葉蠖生	新建設	四・二
關於「中國通史簡編」	范文瀾	新建設	四・二
愛國主義與歷史科學	榮孟源	新建設	四・三
馬克思論第一次與第二次鴉片戰爭	胡寄馨	新中華	十四・五
中國歷史學的開創者司馬遷	翦伯贊	中國青年	五七
蘇聯歷史教育法——思想戰線的戰鬥領域	余元盦譯	歷史教學	一・一—二
斯大林對史學的新指導	趙儷生	歷史教學	一・四
推進愛國主義歷史教育的幾個具體問題	周一良	歷史教學	一・五
黃尤考	陳家康	歷史教學	一・六
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	嵇文甫	新史學通訊	一・二
經濟			
「實踐論」——政治經濟學的道路	郭大力	新建設	四・一
由「實踐論」說到經濟工作	王學文	人民週報	八
「實踐論」與經濟學及經濟工作	沈志遠	經濟周報	十二・十五
「實踐論」與統計學	楊堅白	學習生活	一・五
論關於經濟危機的理論與歷史的書籍中存在的嚴重錯誤	阿・亞歷克塞也夫等	新華月報	三・五
駁地主階級的謬論	千家駒	學 習	三・十二
論土地改革與農業社會化	千家駒	學 習	四・三
城鄉交流是發展工農業生產的重要環節	何 均	學 習	四・三
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形式及其作用	狄超白	學 習	四・四

論人民經濟的價值法則	許滌新	新建設	三·四
人民租稅綜論	周伯棣	新建設	三·五
剩餘價值說與馬列主義經濟學	王 台	新建設	三·五
凱恩斯主義批判	陶大鏞	新建設	三·六
人民經濟的借貸關係、利息	許滌新	新建設	四·三
從現金管理到貨幣管理	周伯棣	新建設	四·三
經濟核算制的理論與實踐	林士章	新中華	十四·三
社會主義國內商業的理論分析	譚崇台	新中華	十四·五
廣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發凡	王亞南	新中華	十四·五六
由資本主義財政學到社會主義財政學	吳丞華	新中華	十四·六
貫澈在廣義政治經濟學中的諸基本原則	王亞南	新中華	十四·十·十一
過渡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	朱劍農	新中華	十四·十二
擴大再生產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法則	A·威肯節夫	計劃經濟	二四
統計學是認識社會的有力武器	T·卡茲洛夫	計劃經濟	二四
商品流轉中未加利用的後備力量	穆拉甸柴夫	計劃經濟	二四
社會主義經濟的結算制度與國家銀行的業務	H·格羅德爾	計劃經濟	二五—二六
論編製國民經濟平衡表	索色利	計劃經濟	二六
蘇聯商業財務與財務計劃	奧布洛瓦英基	計劃經濟	二七
關於統計與計劃、業務的關係問題	林里夫	統計工作	三·一
從現金管理到貨幣管理	譚進文	經濟周報	十二·四
反對資產階級指數論中的數學形式主義	范 滌	經濟周報	十二·六
論如何在我國建立經濟核算制	張 揚	經濟周報	十二·十九
貨幣的階級性	畢松聲	經濟周報	十二·十九
對土產品規格和價格問題的研究	吳大琨	經濟周報	十二·二三
駁斥為美國獨佔家擴張對外貿易而服務的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	A·福魯姆金	經濟導報	二一四
蘇聯的基本建設投資	章景瑞	中國金融	一·四
「貨幣管理」的理論分析	蔣福堂	新經濟	十三
論新統計工作	黃克鏞	新經濟	二三
論貨幣管理與企業核算	芸 植	新經濟	二三
開展銀行與企業的業務合同	鄭洪林	上海工商	二·十三
關於勞動保險的幾個問題	施復亮	上海工商	二·十七
政 治			
關於兩種制度和平共存的問題	宦 鄉	學 習	三·七
蘇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鄧 諾	學 習	三·七
加强人民的革命專政	吳 江	學 習	三·八
關於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鄧 拓	學 習	三·九
介紹「共產黨宣言」	柯柏年	學 習	三·九—十二
論權威	恩格斯	學 習	四·一
人民民主建政	謝覺哉	新建設	三·五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	宦 鄉	新建設	四·一
從方法論上看列寧對盧森堡民族理論的批判	李 琪	新建設	四·三
堅決鎮壓反革命的道理	張奚若	人民週報	二十
眞正的人民民主	杜 德	新華月報	三·六
法 律			
「實踐論」在新法學建設中的體會	李建釗	新中華	十四·六
「實踐論」與新法學	中國新法學研究會	新建設	四·二、三
從犯罪分類上談肅清舊刑法觀點	王紀新	新建設	三·五
對資產階級法學反動本質的批判	蘇H·Г·蘇達里可夫	新建設	四·一、二
資本主義國家檢察制度的批判	陳啓育	新中華	十四·六
國際私法底階級性和鬥爭性	陳朝璧	學習彙報	二
新民主主義經濟構造與法律	薛 鋼	學習彙報	二
一夫一妻制的產生和發展	洪光裕	學習彙報	二
法律起源之探索	楊 堪	學習彙報	二
教育·學習			
實踐論，全面廣義的教育指導原理	侯外廬	教師月報	一
學習「實踐論」整頓我們的學風	人民教育社論	人民教育	二·三
關於「實踐論」和學習方法的一些問題	艾思奇	學 習	四·四
論思想改造問題	艾思奇	學 習	三·七
學習，才能前進	鄭 昌	學 習	三·九
大學課程「中國語文概論」的一個教學總結	黎錦熙	新建設	四·二
檢討我的「舊教育批判」	董渭川	新中華	十四·十一
人的新品質的培養與美育教育	向錦江	新中華	十四·十二
蘇聯共產黨底政治教育制度	張仲實	中蘇友好	三·一

談談理論與實際聯系的學習方法	吳江	中國青年	五八
性格與性格的培養	Л·E·色利索娃	人民教育	二·四
評「活教育」的基本原則	張凌光	人民教育	二·六
初等教育在人的智力與品德發展上的作用	M·A·達尼洛夫	人民教育	二·六
美國教育批判	曹孚	新教育	二·五—三·一
人民教師對教育應有的基本認識	張[illegible]	教師月報	三·
談愛國主義的語文教學	李賡田	教師月報	四·
教育學的對象	葉希波夫 岡查洛夫	東北教育	五·二
馬爾學說對蘇聯小學語文教學的危害	C·M·萊保曼保夫	教育通訊	六·一
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和目標	麥丁斯基	益友	三·六
不足爲訓的武訓	賈霽	文藝報	四·一
試談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	楊耳	文藝報	四·二
爲什麼歌頌武訓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表現?	胡繩	學習	四·四
從武訓傳的討論裡應該學到些什麼	鄭昌	學習	四·四
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	楊耳	學習	四·五
駁對於武訓和「武訓傳」的種種歌頌	何其芳	學習	四·五
武訓到底是爲誰服務的?	鮑昌	人民週報	二五
關於武訓的幾種錯誤觀點	儀白施	中國青年	六七
「武訓精神」批判	董純才	東北教育	五·四
武訓其人其事	劉興堯	人民週報	二三

語文·文藝

「實踐論」與文藝創作	何其芳	人民文學	三·五
實踐——生活的實踐與寫作的實踐	許傑	文藝新地	三·
「實踐論」與革命文藝工作者	周文	文藝報	三·十一
「實踐論」與文藝工作	李廣田	文藝報	四·一
由「實踐論」談建立翻譯理論的問題	羅書肆	翻譯通報	二·四
「實踐論」與翻譯工作	于靜純	翻譯通報	二·五
不是單純的寫作問題	洪禹	文藝報	四·一
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爲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	人民日報社論	人民週報	二四
語法、修辭講話	呂叔湘 朱德熙	人民週報	二四—二六
語言學家的新任務	季羨林	新建設	三·四
爭取語文的純潔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	文藝報	三·十二
文藝家是民族共同語的促進者	邢公畹	文藝報	三·十二
談幾個形容詞連用的解釋	周文	文藝報	四·五
關於口語和文章裏的新詞新語	呂叔湘	文藝報	四·五
關於方言文學的幾個問題	楊堤	文藝報	四·五
國語語法綱要	趙元任	新建設	四·一—三
關於漢字的字音跟字形	林漢達	新建設	四·一
寫話	葉聖陶	新觀察	二·一
新舊文字與聲調	殷煥先	文史哲	一·一
文學批評與藝術技巧	蘇「文學報」	新華月報	三·三
論藝術家和他的世界觀	杜布洛留勃夫	新華月報	三·三
論作家的勞動	法捷耶夫	新華月報	三·六
關於處理中國文學遺產	馮至	新華月報	四·一
關於梁山伯祝英臺故事	何其芳	新華月報	四·一
作家與生活	伊·愛倫堡	新華月報	四·二
目前文藝創作上的幾個問題	沈雁冰	新華月報	四·二
作文研究	周文	學習	四·三
意識狀態試論	黃藥眠	新建設	三·六
五四時代新文學所受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李何林	新建設	四·二
五四運動和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	孫伏園	新建設	四·二
從認識古典美術發揚愛國主義	常任俠	新建設	四·三
幫助你研究理論的文學作品	魏爾霍夫采夫	時代	三四五
怎樣閱讀文藝作品	王亞平	新中華	十四·一
一九二八——三〇年的革命文學運動試論	丁易	新中華	十四·一
文學與文學批評	V·尼科拉耶夫	新中華	十四·六
列寧的反映論與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藝術	卡特爾什契可夫	翻譯	四·三
論詩的「秘密」	蘇·特隆柯夫斯基	人民文學	四·一
對於新詩的意見	雪峯	人民詩歌	二·一
把詩創作提高一步	勞辛	人民詩歌	二·一

談歌詞創作中的幾個問題	章 枚	人民詩歌	二·一
音節與韻律	許 傑	人民詩歌	二·二
創作隨感	雪 峯	文藝新地	一—二
爲愛國主義的人民新戲曲而奮鬥	田 漢	人民戲劇	二·六
關於接受遺產	王朝聞	人民戲劇	二·六
蘇聯戲劇創作問題與青年劇作家	H·包哥廷	人民戲劇	三·一
怎樣克服表演上的公式化傾向	舒 強	人民戲劇	三·二
略談歷史劇的問題	伊 兵	戲曲報	四·四
略論小說	蘇·奧也索夫	天津文藝	一·四
談談作品的思想性	日 木	文 藝	十四
論舞臺的現實性與客觀的眞實性	蔡 田	文 藝	十六—十七
談現階段美術創作上的問題	朱克可	文 藝	十六—十七
談戲曲改革的重點問題	馬彥祥	新戲曲	一·六
戲曲的歷史眞實與現實影響	馬少波	新戲曲	二·一
舊劇改革運動中的歷史劇問題	楊紹萱	新戲曲	二·二
文藝思想和創作	張 庚	文藝報	三·八—九
關心和注意的方面	張天翼	文藝報	三·九
多寫些精彩多樣的短篇小說	波列伏依	文藝報	三·十一
生活的眞實與藝術的眞實	蕭 殷	文藝報	三·十二
在宣傳鼓動工作中如何運用藝術文學	佛、馬特洛索夫	文藝報	四·一—五
中國短篇白話小說的發展與藝術上的特點	孫楷第	文藝報	四·三
堅決貫澈毛澤東文藝路線	周 揚	文藝報	四·五
黨與文藝	荃 麟	文藝報	四·五
論神話故事的史實面	黃芝崗	北京文藝	一·五
散文並不散	老 舍	北京文藝	二·一
論白蛇傳神話及其反抗性	李岳南	北京文藝	二·一
劇本的結構和對話	胡丹沸	北京文藝	二·一
改造思想情感與學習寫作	郭良夫	北京文藝	二·二
抗美援朝的音樂活動與創作問題	方 明	詩歌與散文	二·五
新文學的方向	擬 夢	詩歌與散文	二·六
文學的階級性	青 野	詩歌與散文	二·六
社會主義哲學對音樂的影響	蘇、摩伊孫可	人民音樂	二·三
克服「一般化」的傾向不能從形式出發	王朝聞	人民週報	三
白居易的思想和藝術	游國恩	人民週報	七
論譯文中的歐化語	羅書肆	翻譯通報	二·五
爭取蘇維埃音樂的新的高漲	T·赫連尼科夫	中蘇友好	三·六
論兒童文學的特殊性	特·考爾聶奇克	中蘇友好	三·九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在中國	焦菊隱	中蘇友好	三·九
論電影藝術的黨性	阿·茹契科夫	中蘇友好	三·十
我們怎樣讀古代文藝作品	熊白施	中國青年	六三
從敦煌藝術看中國的民族藝術風格及其發展特點	常書鴻	藝術生活	三·
新舊對聯的批判及其創作諸問題	袁荆·李子瑛	藝術生活	三·

一般自然科學

從實踐論看醫學和病理學	孫紹謙	科學通報	二·五
一個氣象工作者學習實踐論的心得	顧震潮	科學通報	二·五
「實踐論」和農業科學的改造	張慶泰	東北農業	二五
把毛澤東思想貫澈到農業科學理論與實踐中去	張慶泰	新華月報	三·六
數學是我國人民所擅長的學科	華羅庚	新華月報	四·一
資產階級優生學批判	方宗熙	新建設	四·一
組織療法	蘇·費拉托夫	人民週報	七
生物科學中的目的論批判	黃厚哲	新中華	十四·四
斯大林和米邱林的農業生物學	李森科	新中華	十四·十
中國古代的科學創造	錢偉長	中國青年	五七
巴夫羅夫的條件反射的理論對於學習的關係	朱 洗	學 藝	二十·六
論威廉士的農業學說	李森科	科學通報	二·一
資產階級科學與無產階級科學	德桑蒂等	科學通報	二·二
中國古代在天文學上的偉大貢獻	竺可楨	科學通報	二·三
植物化石鑑定地層時代的價值	斯行健	科學通報	二·三
關於生命在大地上起源的科學與宗教	奧巴林	科學通報	二·四
關於生活物質的學說	勒柏辛斯卡婭	科學通報	二·四
中國過去在氣象學上的成就	竺可楨	科學通報	二·六
反對數理邏輯中的唯心主義	屠蔓利諾夫等	科學通報	二·六
三分角問題	華羅庚	科學通報	二·六
威廉士關於土壤和土壤肥力底學說	維林斯基	東北農業	二七

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周刊

世界知識

本刊爲國內唯一歷史悠久的國際時事周刊，以普及國際知識爲目的。它幫助讀者了解當前的國際形勢，加强抗美援朝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宣傳教育。

本刊文字力求通俗，盡量發揮題材的多樣性，每期除論文外，還有生動的通訊和札記，並且多插圖表和漫畫，內容生動活潑。

每册一、六〇〇元

預・定・價・目

訂閱處：全國各地新華書店、郵局

全　年：（五十期）八〇、〇〇〇元

半　年：（廿五期）四〇、〇〇〇元

三個月：（十二期）一九、二〇〇元

新書

戰後蘇聯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

施芝禪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經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但是在戰爭結束之後，蘇聯立刻實行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的新五年計劃，大力從事和平的建設。在極短的時期內，蘇聯經濟不僅恢復了戰前的水準，而且大大超過了戰前的水準。新五年計劃的超額完成，使蘇聯更進一步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大道。這種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祇有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上才能完成。本書係輯譯有關蘇聯五年計劃各種文件而成，是瞭解和研究蘇聯經濟建設偉大成就的一本極重要的參考書。

每册五、五〇〇元

蘇聯反對戰爭

陳定民譯　六、五〇〇元

華爾街的統治

朱彤著　四、五〇〇元

世界知識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新建設 月刊

第四卷・第五期

負責人　費青

編輯委員（以姓名筆劃爲序）

千家駒　向達　*沈志遠
*吳晗　狄超白　李廣田
金岳霖　范文瀾　*胡繩
袁翰青　孫曉邨　*陶大鏞
*費青　費孝通　*張志讓
*傅彬然　聞家駟　雷潔瓊
樊弘　*鄭昕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儲安平
鍾濟九　*謝覺哉　嚴景耀

（有*者，爲常務編輯委員）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定價每册四千元

訂閱：

三個月三期　一萬二千元
半年六期　二萬四千元
全年十二期　四萬八千元
平寄郵費免收　掛號郵費另加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新字第一二一九號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本刊預定處：各地新華書店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册四千元